炎黄春秋

第 4 期
2015年

《准则》：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器

张思之：我当律师的一段经历

怀念本刊顾问曾彦修

王蒙：我目睹的中华民国

德意志大学的兴衰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目　录

春秋笔

1 《准则》：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器 …………蔡　霞
7 华国锋谈史传写作 …………李海文
12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历史共鸣 …………王彬彬
14 上海档案里的“反革命” …………袁　凌

怀人篇

21 深切怀念本刊顾问曾彦修先生 …………李　锐、杜导正、何　方、张惠卿、杜　高

求实篇

26 有关鲁迅争论我见 …………曾彦修
33 冤案是怎样酿成的 …………尹曙生
39 关于巴金《没有神》的一点考释 …………陈丹晨

访谈录

42 我当律师的一段经历 ………… 张思之 口述　孙国栋 整理
48 “长治号”起义的前因后果 …… 周　克 口述　顾训中 整理

亲历记

52 我目睹的中华民国 …………王　蒙
59 六十五年前一次盛会 …………袁　鹰
61 我参与处理“揪刘火线” …………华方治
64 我所接触的江青 …………张国男

往事录

69 从《邓小平论文艺》到《邓小平论文学艺术》 …………阎　纲
72 陈修良访苏记 …………冯　翔
75 昔日清华不唯权 …………金富军

人物志

77 宪法学者张君劢 …………智效民

一家言

81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求解 …………秦　晓

品书斋

82 评《王力反思录》 …………阎长贵 王广宇

故纸堆

88 郭小川致吴庆彤信 …………郭小川

海外事

89 德意志大学的兴衰 …………丁　东

编读窗

93 读者来信摘登 …………王智仁 等

顾　问（参加社委会）
杜润生　李　锐　何　方　曾彦修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王海光　方　宁　方　实
卢跃刚　冯其庸　曲润海　江　平
苏双碧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大同　李冰封　李步云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吴　象　吴明瑜
沈志华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北英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陆　德
陈　敏　邵燕祥　金冲及　周瑞金
赵德润　胡德华　胡冀燕　钟沛璋
保育钧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贾磊磊　钱理群　徐小岩　凌　云
高　放　高尚全　郭道晖　资中筠
展　江　陶斯亮　萧蔚彬　章诒和
董　健　韩　钢　鲁　谆　雷　颐
魏久明

社委会　杜导正（主任）　杨继绳（常务副主任）
徐庆全（副主任）　李　晨　胡竞成

总编辑　杨继绳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王彦君　冯立三　丁　东
网络主编　王海印

社　长　杜导正
副社长　杨继绳（常务）　徐庆全　李　晨
秘书长　杜明明

总经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行部主任　孔　屏
办公室主任　王海印

本刊创刊人：杜导正

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l@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10元　全年定价　120元

本期：终审　徐庆全　　执行主编　冯立三　　校对　乐　彤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准则》：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器

○　蔡　霞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1980年2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今年是35周年。《准则》是党为了纠正文革错误，恢复优良传统而颁布的重要规章，近年来已经很少提起。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中共正把治标和治本相结合，走向制度治党。2014年，中组部对以往的党内规章做了清理，保留了今天依然适用的规章，其中最重要的规章之一就是《准则》。今天重提《准则》，依照《准则》规范党内政治关系，重构党内政治生态，无疑十分重要。

一、制定《准则》是中共党内反思文革的政治成果

《准则》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大转折中的党心所向的产物。当时胡耀邦组织起草了这个文件。起因，要从1977年11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说起。这次会议是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会议，内容最初确定为研究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经济工作。11月12日，陈云发言，提出要解决好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等历史遗留问题，引起强烈反响。与会者普遍认为，要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就必须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深刻反思党的经验教训。会议中老干部纷纷发言，痛陈党内民主被破坏，党内政治关系不正常，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胡耀邦说：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根本教训是党的生活不正常。[注1]畅所欲言的民主讨论，成为会议氛围的基调。随着形势变化，邓小平放弃了原来的讲稿，写了一个新的讲话提纲，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强调：“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民主是解放思想的主要条件”。叶剑英在闭幕会上说：我们决不要再上林彪“四人帮”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我们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要在全党全国造成深厚的民主空气。会议结束后，胡耀邦继续思考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问题。据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回忆，一天胡耀邦把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人员召集到中组部大楼，与《组工通讯》编辑部人员一起开会。胡耀邦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高层深刻反思文革教训，叶帅郑重地提出要认真解决党内生活不正常的问题。我们要先搞个文件，经中央讨论通过后，再写出一系列的文章。在胡耀邦主持下，那天会议讨论党内政治生活究竟应有哪几条基本原则。会后，胡耀邦组织起草了12条《准则》的草稿，并建议将草稿列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中

心议题。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邓颖超称赞说："这个12条《准则》很好，是耀邦和中组部同志为我们全会做了一项很好的准备工作，是我们今后工作的有力武器。"[注2]

1979年1月4日到1月22日，中纪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修改，通过了《准则》草案，报送党中央。1979年3月，中央将草案发至县团级讨论，征求意见。后来，在各地报来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定稿，先后12次易稿。胡德平回忆，当时父亲利用晚上时间亲自动手修改《准则》草案。1980年1月，《准则》草案经中纪委第二次会议再次修改充实，提请中央审议通过。中纪委会议还把《准则》作为重要党规在全党贯彻、各级纪检委协助各级党委监督执行《准则》，列为1980年度党的纪检工作基本任务之一。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准则》，于当年3月公布。接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了一批评论和对老革命家的访问文章，阐述《准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注3]

尽管不少机构制定了执行《准则》的具体措施，但真正落实阻力依旧很大。为此，中纪委于1980年11月召开了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发表了《搞好党风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又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就党内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等问题做了严肃的批判。在首都各界庆祝中共建党60周年的集会上，胡耀邦再次强调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问题。胡耀邦身体力行，以民主精神民主作风开展工作，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直抒己见，不怕得罪人，也"不怕与党内老革命家意见相左"，[注4]在干部工作中，他坚持公道正派，从当组织部部长到辞去党的总书记的9年多时间里，"没有私自提拔或调动过任何一名干部"。[注5]

80年代前中期，中共党内高层提倡"四不"（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三宽"（宽松、宽厚、宽容），把分歧摆到桌面上谈，以团结包容的态度进行平等、民主的探讨，党内激发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活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解放思想，敢于探索，大胆创新，开创改革发展的大好局面。李锐曾记录1984年1月胡耀邦和他的谈话，胡耀邦提到4个方面的工作有了纲，其中之一是有了《准则》，党的建设有了纲，耀邦为此感到欣慰。[注6]

当然，80年代党内各种思想争论一直不断。中期以后，党内政治关系状况出现复杂变化，党内问题的处理开始偏离《准则》，政治生活中的不良惯性重又抬头。此后，《准则》逐渐被淡忘，束之高阁，未能在党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天某些党组织内，关系扭曲变质，政治生态恶化，滋生严重的腐败，这和淡忘、丢弃、背离《准则》有直接关系。假如耀邦还在，必定痛心疾首。

二、《准则》对于中共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为什么《准则》的执行出现反复？在相当程度上，这与中共对党内政治关系缺乏清晰、理性认识有很大关系。

一个政党不可缺少党章，党章规定党员条件、党员权利义务、党的组织架构和根本组织制度。组织架构和制度规定的实质是对党内权力和权利这两种力量资源的配置。因而，党内组织关系的背后是党内政治关系。党章既型塑党内组织关系，也型塑党内政治关系，而中共党内以往侧重在组织意义上理解和执行党章，忽略了党章内含的党内政治关系规定。《准则》则主要对党内政治关系加以明确的规范和指导，是党章的重要补充。

作为党章的重要补充，《准则》具体规范党内政治关系，将党内民主原则贯穿于党内政治生活，对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的行为做出基本规定。《准则》共12条，涵盖了党内政治关系的5个方面：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少数与多数的关系；下级组织与上级组织的关系；全党各个党组织和党员与党中央的关系；党的领袖与全党的关系。

《准则》中有的内容是针对文革时期党内问题而言，带有鲜明的历史印记，今天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但是，这并不影响《准则》关于发展党内民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维护党的政治关系纯洁性、推动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基本思想的正确性，贯彻《准则》对于保障从严治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重要的党规制度，它在党内制度体系中的位阶仅低于党章。

由于对党内政治关系和组织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缺乏清晰的思想和理论认识，因而在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理论误区，长期片面强调组织关系、强调集中原则，逐渐淡化、虚化党内民主原则。由中共的执政领导体制决定，国家权力和党内权力合为一体，各级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以“党的领导”为名义，可以调动手里掌控的国家权力资源，实现个人意志。当国家法律不健全、宪法权威不够，难以切实保障包括党员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基本政治权利时，将国家权力，甚至专政手段运用到党内，权力的掌控者就可能变成操控任何一个党员生死命运的绝对强势者。扭曲了的党内政治关系很容易使党的组织制度规定流于形式，使体现权力意志的党内潜规则实际支配党内生活，使少数人能够以“组织”的名义，将民主集中制异化为限制党员权利、控制和驱动党员的工具。

从大跃进到文革的惨痛历史表明，在执政条件下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不仅祸害党自身，最终祸害国家，祸害社会，国家付出停滞倒退的代价，社会则用数千万人的生命为执政党的失误埋单。正因为有着这样沉重的教训，恢复和重建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成为1978年年底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绝大多数老干部的共同要求。

近年反腐败揭露出来的大量恶性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可以说，从1921年中共成立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这20多年腐败发生范围之广、贪腐数值之大。这表明党内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官员腐败普遍发生，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而当发生“窝案”、“串案”、大面积、塌方式的腐败，则反映出这些地方党内政治生态的严重恶化，乃至党组织本身的政治腐败和溃烂变质。党内的同志关系有的变成“主子和家臣”的人身依附关系，像薄熙来和王立军。有的变成主仆关系，不少地方党员干部把党的书记称作“老板”。党内的团结合作关系，变成了以私利为纽带的“结帮抱团”的江湖关系，像以周永康、令计划为首的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把公务职权变成相互交换、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像政法系统某些腐败官员甘做权力掌控者看家护院。不一而足。而一些贪腐官员之所以能边腐败边被提拔，重要原因之一是党内政治关系不正常，干部选人用人权力控制在少数主要领导人手里，他们将权力变成为自己的私器，编织自己的人脉网络，相互庇护，狼狈为奸，形成团伙，盘踞在党组织内部，结成党内的黑帮恶势力，排挤打击党内正直力量。

党内政治关系的扭曲严重腐蚀党员的思想。一些人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政治心态相当畸形。在一些党组织内，某些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党的宗旨、路线、政策、纪律，不是群众利益，而是领导干部个人的喜好厌恶。一些人对领导阿谀奉承、欺下瞒上、说谎成性；对组织阳奉阴违，对制度选择性执行；一些党组织内歪风盛行、正不压邪。

党内腐败不仅仅是官员的经济贪腐和生活奢靡，更深层的是在党内扭曲的政治关系下权力私有化的政治腐败，成为某些地方权力意志恣肆妄为、权力活动乱象丛生、权力失控和权力失序并存，产生塌方式腐败的土壤。反腐败斗争，需要“打苍蝇”“抓老虎”，但最重要的是“填粪坑”，改变大量滋生贪腐官员的制度环境。因此，重申《准则》，改变被扭曲了的党内政治关系，才能重构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

党内政治关系的江湖化、帮会化，使得有些人过去为私利而上下勾连，现在则为反腐败斗争中能逃避过关而抱团结伙；党内政治关系的江湖化、帮会化，还严重损害了党内同志之间的政治信任和人格尊重，一些人凡事只信自己和少数人，不信任党组织，不信任法治。由此，他们对反腐败抱着“此一时彼一时”的想法，消极应付，怠工不作为。所有这些，都会涣散党心、涣散组织，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削弱党的行动力、执行力。只有用《准则》规范党内关系，扭转党内政治生态恶化的态势，才能逐渐恢复党内的政治信任，加强党内的团结合作，推动党内关系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三、以《准则》为指导，构建正常的党内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

殷鉴不远，来者可追。根据这些年党内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以《准则》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规范以下几个关系，特别紧迫。

1. 正确处理全党各个组织和中央的关系

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组织上保证集中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反对个人崇拜、正确对待党的领袖，这3个方面是正确处理这一关系的最主要精神。

《准则》申明："思想路线是党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必须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各部门、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对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采取对抗、消极抵制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是党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准则》中不容含糊的基本思想。《准则》重申："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每个党员都要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准则》指出，全党服从中央，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首要条件，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准则》严肃批评："任何部门、任何下级组织和党员，对党的决定采取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公开地或者变相地进行抵制，以至擅自推翻，都是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

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与正确对待党的领袖毫不矛盾。汲取文革前和文革中党的严重教训，《准则》特别指出了，"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地歌功颂德"。

2. 正确理解"党的领导"，处理好党员个人与领导的关系

长期以来，在一些地区、部门、单位里，"谁代表党组织？谁代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事实上模糊不清。不少人习惯性地把党组织与党的书记画等号，把"一把手"看作是党的化身，只要是书记说的，都看作是"党的指示"。于是，党的领导人格化，服从党的领导原则常常变成服从主要领导干部。比如，司法领域加强党的领导曾经具体表现为坚决执行主管政法委的周永康的指示。再比如，一些地方报纸是否突出报道当地党政"一把手"，常常被看作媒体是否维护党的领导、与党保持一致的问题。所以，季建业、杨卫泽未被查处前，南京市各媒体总是在头版突出位置报道这两个人。同样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

"党的领导"不能等同于大大小小的"一把手"领导。所谓个人服从组织，决不是指党员服从书记，而是指党员个体意志（包括党的书记）服从党组织的整体意志。而党组织的整体意志是在党内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不允许党员发表意见参加讨论，则书记很容易凭借掌握党内权力而用个人意志来冒充组织决定，并以组织的名义驱使党员服从和执行。

由此，"党的领导"在全党即是全党各级组织服从和贯彻执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及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政策和大政方针；在本级党组织范围内，"党的领导"则以本级党代表大会和党委会形成的共同意志——决议和决定来体现，党的书记必须服从本级党代表大会决议和党委会决定。如果超出决议决定的范围，党的"一把手"的意见只能是个人意见，而决不能冠以"党的领导"名义。

在党员和领导干部个人的关系上，只能是正常的同志关系，《准则》指出："严禁以派划线，严禁利用职权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私人势力。共产党员应该忠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原则，不应该效忠于某个人。任何人不得把党的干部当作私有财产，不得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

在工作中处理好党员个人和领导的关系，《准则》强调："所有的党员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战友，党的领导干部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不能以为自己讲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别人都得服从，更不能摆官架子，动辄训人，骂人。""要坚决反对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看领导脸色说话办事，拿原则做交易，投机钻营……"，作为党员个人，"不可看领导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报喜不报忧，更不许可弄虚作假，骗取信任、荣誉和奖励。不准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名义纵容、暗示、诱使、命令或强迫下级说假话。"

3. 正确处理好书记和委员会的关系

书记和委员会的关系是党内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党委常委会是实际权力中心，党委书记是实际的权力掌控人，很容

易以党的领导名义，操控公共资源实施个人意图。而如果出现负面后果，则又难以做到准确的实质性的责任追究，甚至不惜损害党和政府的声誉去为个人承担责任。由此，必须正确处理好书记和委员会的关系，坚持和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切实提高党委会的集体领导权威。

书记和党委会究竟是什么关系？毛泽东曾经比喻书记是“班长”，党委成员就成了“一班人”，于是党内习惯性把领导集体叫成“领导班子”。这种比喻和叫法，恰恰破坏了书记和委员会的正常关系，不知不觉地把组织内部的委员会制转换成了行政性的科层制，结果书记成了委员们的领导。《准则》指出：“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

党的集体领导最重要的体现是集体决策，但在一些党组织内部，书记在决策中往往施加很强烈的个人影响，使集体决策流于表面。针对这个情况，《准则》指出：“党委会讨论重大问题，要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中发生了分歧，既要认真考虑少数人的意见，又不可议而不决，耽误工作。”在党委工作中，《准则》也明确指出：“在分工负责中，书记或第一书记担负着组织党委的活动和处理日常工作的主要责任。不应借口集体领导而降低和抹杀书记或第一书记在党委会中的主要作用”，“各个领导成员之间，要相互支持、互相谅解、善于合作。大家都要自觉地维护党委集体领导的威信。”

要切实处理好书记和党委会成员的关系，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和有效执行，把党委会内部的主要决策权力转移到全委会，使全委会逐步成为决策中心，提升组织的集体权威，以遏制书记在组织中过重的分量。

4. 处理好少数和多数的关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是处理党内政治关系的基本问题之一。党内不同意见分两类：一类是思想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一类是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当今的中国社会处在急剧的历史性变化过程中，执政党遇到大量极为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如何处理，需要激发全党的创造力，集中全党智慧。党内存在不同意见很正常，但在一些党组织内部，少数主要领导干部容不得不同意见，往往用“维护团结稳定”的名义打压不同意见。

在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上，《准则》强调：“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也可以向各级党组织直至中央做口头或书面的报告。党组织应当欢迎党员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并且鼓励党员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和主张。”

对于思想理论认识上的分歧，《准则》强调通过民主讨论求得共识，而不能简单压制。《准则》指出：“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党内在思想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方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做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准则》强调：“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被反党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准则》强调：“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对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妄加反革命的罪名，乱用专政手段，进行残酷迫害，这是严重违法的罪行，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另一类党内不同意见，是工作中的分歧。对于这类问题，《准则》更多的是严格要求领导干部。《准则》指出：“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而进行从容讨论的气氛”，“要纠正一部分领导干部中缺乏民主精神，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的家长作风。”《准则》严肃指出：“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

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对同志挟嫌报复、打击陷害，用‘穿小鞋’‘装材料’的办法和任意加上‘反党’‘反领导’‘恶毒攻击’‘犯路线错误’等罪名整人，是违反党内民主制度和违反革命道德品质的行为。”

5. 调整党内权力结构，保障《准则》有效执行

《准则》制定容易，执行难。回过头来看，《准则》没有能持续贯彻，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权力结构不支撑《准则》的权威性，二是缺乏一套健全的可操作的制度保障《准则》的执行。

尽管《准则》总结和反思了文革及其之前党内生活中的经验教训，但还没深刻认识到权力结构不合理是党内政治关系扭曲、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根本原因，因而制定和贯彻《准则》时，侧重于强调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实际上，要真正有效贯彻执行《准则》，必须构建合理的权力结构。

党内权力架构的本质是高度集权。国家和党内的关键要害权力通常掌握在个人手里，而个人意志对权力运作影响甚大，在某些时候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尽管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但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制度，什么样的权力架构才能维护和保障正常的党内关系。同时，中共党内对强势权力和强势领袖有着惯性的依赖，不自觉地延续着强人政治。80年代中共两任总书记都在非正常程序下被更换，这就有悖于《准则》。主要领导人强势代替《准则》权威，不仅使《准则》容易被淡忘，束之高阁，而且对后来党的运作产生消极影响。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刻意把自己塑造成权力强势人物，越来越多地凭借个人权威和能力推进各项工作，于是才出现党内贪腐官员不少是能干人，他们“一边干事一边犯事”，目无法纪，为所欲为，有恃无恐。因而，要真正执行《准则》，必须依据分权制衡原则，对党内权力结构做出改革，克服个人权力过大的负面作用。

有效执行《准则》，还必须制定一系列可操作性制度。一般来说，“制度就是行为规则，并由此而成为引导人们行动的手段”，“制度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它们为社会交往提供一种确定的结构”。[注7]从制度体系看，党纪党规建设需要分成两大系列：一个系列是用以调整党内政治关系，发展党内民主，控制党内权力，清除人身依附关系，形成正常的党内关系；一个系列用于规范组织关系，达到组织集中，保障行动统一。由此，以《准则》为龙头，制定一系列具体操作条例。比如，党员行使权利保护、党员进行权利申诉的操作规程，党委会会议操作规程，党内重大问题充分讨论的场合、时机、方式等操作型规定，党内有序竞争、党代表质询操作规定，党代表发挥作用具体规定，党代表大会开会程序，等等，以实际可操作性具体制度来保障贯彻《准则》。

注释：

注1　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第22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注2　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第454页，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注3　徐庆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之后》，《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注4、注5　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第456页，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注6　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于《怀念胡耀邦》第285页，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

注7　[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第114、115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丁　东）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合订本为简装（上、下册）两册，定价140元。另：

2011年合订本为简装一册，定价110元。

2012年合订本为简装（上、下册）两册，定价120元。

2013年合订本为简装（上、下册）两册，定价120元。

免付邮资，数量不多，欲购从速。

咨询电话：010-68532048、68539058

邮寄地址：见本杂志目录页。

华国锋谈史传写作

○ 李海文

“不能听风，要真实记录这段历史。不要突出个人，要写出集体领导。”

——华国锋谈本书写作的原则

一、“这段历史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华国锋，曾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简历如下：1958年当选湖南省副省长，1959年任湖南省书记处书记。文革初期受到冲击，1967年起先后担任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九大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5月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同年11月当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1年1月调国务院，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列席政治局会议。1973年十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1976年2月担任国务院代总理，4月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0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12月中共中央同意他主动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说“这段历史是很重要的”，主要是指他1971年至1980年在中央、国务院工作的10年，特别是主政中共中央的5年时间。

华国锋因粉碎“四人帮”而名留青史。正如2008年9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华国锋生平》中所说：“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做出的重要贡献。”

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顺利粉碎“四人帮”后，众望所归，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在中国只有他同时兼任这3个职务。那时他只有55岁，正当壮年，精力过人，比1949年的毛泽东小1岁。所不同的是，毛泽东一直在位，直到逝世，而华国锋只在位5年即辞职。对辞职他这样说：“党内再斗争，老百姓遭殃。我坚决辞掉一切职务。事先和叶帅说了。有的说我傻瓜。有的说我太老实。我没有后悔。”注1

毛泽东评价他是老实人。然而正是这个少言寡语的老实人，领导中国平稳过渡，正如上述《华国锋生平》所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理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很大成绩。”“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1979年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胜利完成，全党的工作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注2继续了毛泽东、周恩来开创的开放、引进政策，并开始改革。

1997年年底他终于决定写回忆录，请我帮助整理。2002年11月，他看了我写的第一、二、三章11万字后，决定由他的口气改为第三人称的口气。

经过几年努力，到2007年8月底终于完成第一稿。

2007年11月他给中共中央写信，希望在有生之年将这段历史留下来。中央很快批了，中办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召集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进行深入研究，形成初步意见，令计划主任带中办秘书局局长向华国锋汇报、沟通，经中央批准成立以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的华国锋资料整理小组，中央很快批复同意。经华国锋推荐，我是小组成员之一。

华国锋说："我给中央写的信，希望整理工作资料，特别是在中央工作这段时间。毛主席那段历史已写了，现在这段历史还在发展。不少人劝我写作。我想找熟悉的同志，把这段历史搞好。这段历史也是党史中很重要的一段。中央重视这件事，我很感谢。"

这就是这本书的缘起和写作背景。

二、"不要突出个人，要写出集体领导。"——这本书的立足点是什么？

1976年粉碎"四人帮"是10年文革的必然结果，他1985年、1997年两次向我系统地回顾历史都是从1966年文革爆发开始谈起。但是，本书篇幅有限，作者个人精力所限，仅从1966年文革爆发写到1977年年底为止。这本书要回答3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毛泽东主席选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第二，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四人帮"的罪行与错误；第三，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及组织实施过程，包括解决全国各省市领导班子，一直到1977年年底。因华国锋是主角，简单介绍他的历史，1955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以来与毛泽东的交往，这也是毛泽东主席对他考察的过程。重点写了他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工作的前6年，只完成他交给的一半的任务。感到欣慰的是在华国锋逝世后，2009年2月经中央批准，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了一个《华国锋传》写作小组，该小组将会完成写这10年历史的全部任务。

2008年2月27日，华国锋接见资料整理小组的成员时说："中央批示了怎么办？不是写我个人的历史而是我到中央后10年的历史，是中央的历史。""我们粉碎'四人帮'，我担任主席后，是十分强调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搞好，必须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好，事情就办得好。党中央集中到玉泉山上住，稳定措施都是集体讨论的。我的讲话都是经过政治局集体讨论。写这段历史要强调中央集体的作用，不是个人的作用，这段过程最重要，不要突出个人，要突出集体。现在中央这个班子不错。咱们写历史不要突出个人，写集体。"

他的这个思想是一贯的。遵照这个思想，本书的立足点在于：尽量写出历史大背景下的时代脉络，当时的环境、语境，写出毛泽东、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中央、国务院，写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及高级干部的思想变化、表现，也写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尽量写出领导与群众各个方面的情况。遵照他的要求，"不要突出个人，要写出集体领导。"写出中央集体领导及群众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作用，而不是华国锋个人传记。所以书的题目原是《真相——1976年》，后接受出版社的建议改为《历史转折中的华国锋》。

三、"要去伪存真，说事实，真实非常重要。""要摆事实，讲道理，有根有据。"——华国锋的历史作用的再认识

1962年10月，毛泽东回到湖南要见胡耀邦、华国锋两人，胡耀邦因感冒没有去。华国锋见到主席，反映了"现在人瘦了，地瘦了，牛瘦了"。事后，胡耀邦说我没有想好怎么同主席谈，华国锋连说："应该去，应该去。"[注3]他的意思是应该让毛主席了解真实情况。"真实非常重要。"

2008年2月27日，他在接见资料整理小组的成员时说："我们写历史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事实检验。不能听风。真实地记录下来。不能听某某权威下了定论。力求真实，跟风不成。写历史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事实检验。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后来还是搞回来。"

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贯穿他的一生。1989年下半年范硕为写《叶剑英在1976年》曾联系采访华国锋，未果。我与范硕相熟，知道了此事。一次闲聊中，我问："伯伯，您为什么不见他们？"他说："我见了，谈了，他们也不能按照我说的写。

而大家知道采访过我。这样就将历史搞乱了。”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党、为历史负责的精神，他的睿智，令人肃然起敬。

1989年1月出版的《李先念文选》，收入1977年1月李先念在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门汇报会上的讲话《积极抓好发展国民经济工作》，文中说：“去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同时对关于粉碎“四人帮”问题专门做了注释，即157条注释。注释写道：“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的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得到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10月6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这一措施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欢呼与坚决支持。”

1945年在关头，后排左起：张雨、××、伍玉（尹尚之）、李莉、李海文、洪涛；前排左起：李海渊、华国锋

《李先念文选》明确指出：“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比1980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了一步。李先念的秘书见到华国锋的秘书特意告诉书中的这个内容及这条注释。

但是，注释有一个错误，将华国锋到李先念家的时间由9月11日推迟为9月21日。后来有一次华国锋碰到李先念，他说：“我说去找你是9月11日，不是21日。”李先念说那是一个秘书回忆的。注4 过了3年，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逝世，享年83岁。

经多次联系，2000年3月30日、5月30日华国锋两次见了《李先念传》编记组，谈了他与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交往。第二年，《李先念传》编记组根据华国锋的回忆，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档案室核对有关档案（即李先念在1980年政治局会议上回忆这段历史的讲话），纠正了注释的错误。专门写文章《一则重要考订——有关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两个关键时间》发表在2001年《文献与研究》第三期。此时离1976年已是25年，离《李先念文选》的发表已过了12年。

历史如同不停的钟摆，不论向左向右摆，总要回到它的原点。历史总要恢复它的真实。历史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经得起事实检验。

四、“写历史，写真实历史，很难很难，特别是当代历史。”——本书写作的意义所在

华国锋说：“写历史，写真实历史，很难很难，特别是当代历史。史官跟着皇帝走，司马迁写《史记》，汉武帝一章没有传下来。”注5

华国锋在位5年，从来没有宣传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因为他认为功劳首先是毛泽东主席的，是毛主席多次批评“四人帮”，为他提供了思想武器。他认为功劳是周恩来总理及许多老同志的，是他们坚持不懈的斗争，使干部、群众看清了“四人帮”的本质。他认为功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有全党、全国人民的支持，才能有稳定的政局。

多少年来，只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一句：“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文中将华国锋摆在最前面，可是，什么是重要作用？是谁第一个提出的对“四人帮”进行隔离

审查？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如何组织实施的？华国锋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一直未能展开研究。

他叮嘱写作工作，注意保密，不张扬，埋头苦干。

报纸、电视、电台越是不报道他的活动，人民就越想知道事实的真相，历史工作者就越想研究。不仅九大、十大、十一大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辞去一切职务后，在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公道自在人心。

写当代史很难，追根溯源，上下求索，在研究中还当代史一份真实，更难。但是，这样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其价值所在，不仅还原历史的真实，更在于给当下、给未来提供史的借鉴，以利于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经验，以便于实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乃至千千万万英烈的强国理想。

五、“写出我的特点”注6——如何写好这本书

华国锋的特点是什么？毛泽东说他是老实人。厚重少文。毛泽东在决定华国锋当代总理时说：“国锋同志我很了解他，他厚道老实，能关心群众，能调查研究，能团结同志。他担任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现在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又有中央工作经验，他担任总理是能胜任的。”华国锋谦和，自认为水平低。毛主席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注7

叶剑英评价他大智若愚，有智有勇。并说他“谦虚、稳重、诚恳，有民主作风，是领袖之才。毛是慧眼识英雄。华受命于危难之际，非常之时，非常之事，非常之人，建立非常之功，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注8

李先念评价：“非常有原则。”注9

熊向晖向叶帅介绍：他含而不露。

文革担任湖南革委会主任的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将军回忆：“三年来，我和华国锋同志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和谐相处，结下深厚友谊。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为人忠厚，待人诚恳，作风正派，严于律己。”注10

他逝世后中央为他写的生平：“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对家属和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华国锋作风严肃、严谨，为人沉稳，平和，少言寡语，从不喜形于色。讲起话来不慌不忙，操着山西晋中普通话。每当讲到紧要处时，做着手势，脸上的表情也多一些。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

他寡言少语，为人宽厚，不愿意讲别人的坏话，这为我还原历史增加了困难。

他的又一个特点是不跟风。他说过：“不能听风。真实地记录下来。不能听某某权威下了定论。力求真实，跟风不成。……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后来还是搞回来。”注11

不跟风，就要有信仰、有原则、有主见。他一生都是这样。这是我与他接触中、交谈中、写作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控制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兵强马壮。蒋介石的威望达到顶点。中国正统思想深厚，为抗日救国，全国多少热血青年投笔从戎，投身国民政府的军队。阎锡山在山西统治了20多年，影响大，又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而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只有3万人，装备落后，小米加步枪，只能在山区打游击，无钱发军饷，衣食不继，生活困难，战斗频繁、残酷，随时都有可能牺牲。17岁的华国锋不顾慈母阻拦，离开家庭，步行80多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随后加入共产党，在交城山里打游击，战争年代加入共产党是要流血、牺牲、坐牢、杀头的。他所在的八分区因靠近太原，是晋绥分局斗争最残酷，干部、群众牺牲最大的地区。他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胜利。

为迎接全国解放，老区动员干部南下，不少农民出身的干部守土打敌人很英勇，不愿离开家乡南下。华国锋不信邪，坚决南下。在湖南工作了20多年。

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是纠“左”，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参加会议文件起草小组，彭德怀在庐山提了意见，转而批判右倾，湖南省委成为重点，被改组，从湖北调干部。华国锋认为彭德怀在庐山提的意见讲的都是实话，怎么成了反党集团，扼腕叹息。注12 批评周小舟，他从没有揭发。注13 1961年11月，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热情地接待回乡调查的彭德怀。

1967年中央文革以《红旗》记者名义派人到全国各地活动，到湖南的《红旗》记者出面动员华国锋“亮相”，参加省革委会。华国锋不同意，说：“我是当权派，要检查我自己的错误。”注14 宁可被打倒、靠边站、挨斗，也不愿“亮相”。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做出了正确选择。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决不追逐个人利益而丧失原则。

2006年4月18日在华家，左起严晓江、华国锋、李海文

1970年庐山会议，叶群和李作鹏在中南组带头发言，一些人唯恐落后，争着发言，群情激愤。华国锋和湖南组的同志商量，不要抢先发言。华国锋说：“人就是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不能跟风跑。跟风跑，非犯错误不行。情况不明，认识不到，那是另一回事。”

江青利用文化大革命，结党营私，权势熏天，控制舆论，作乱十年。毛泽东逝世后，如何反对“四人帮”，意见不一致，有的说开会解决，有的说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主要是如何处置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

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审时度势，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成，首先下决心为人民除“四害”。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消息传出，否极泰来，大快人心！老百姓顿时感到捆在身上的绳子松开了，戴在头上的紧箍咒脱掉了，就如同1945年8月15日突然从天外传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一样欢快，心里顿觉敞亮，看到了光明和前途，举国欢腾。

在写作中，我力求按照华国锋所讲的原则而为，写出华国锋的特点所在，写出那个时代特点所在，力求做到“写历史要经得起历史考验，经得起事实检验”。

注释：

注1、注5、注11　2008年2月27日，华国锋接见资料整理小组的成员时的谈话。

注2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注3　胡德平文章，《财经》2008年第9期。

注4　2000年3月30日，蒋冠庄、程振声访问华国锋谈话记录。

注6　1998年1月7日，华国锋决定要我为他写回忆录时的谈话。

注7　档案，1976年12月10日24号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罪证材料之一。

注8　熊向晖日记。

注9　徐柏林著，周燕整理：《专机上的政要人物》，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347～348页。

注10　黎原：《黎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第358页。

注12　1959年李琪给夫人李莉写了一封信，讲到他与华国锋谈到这个内容。1966年5月李琪被点名批判，李莉怕牵连别人，将此信烧了。

注13　1967年7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编辑出版：《华国锋罪状五十条》，《文化革命资料汇编》32辑，第1221页。

注14　华国锋的回忆。■

（作者为《中共党史研究》原副主编）

（责任编辑　冯立三）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历史共鸣

○ 王彬彬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中共在各地搞了数百起武装暴动后，便进行武装割据。割据的地区，被称作“苏区”。中共在“苏区”实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土地财产被悉数没收，对地主甚至实行“肉体消灭”。这一时期，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作“土地革命时期”。

1937年，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是“合作”的条件之一。从这时始到抗战结束，中共在自己的根据地实行的是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前提是承认地主的地权财权，只是要求他们降低租额息额。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五四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目前最基本的任务。从这时开始，中共在自己的占领区恢复“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新一轮的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过，由于开始时不想过分具有刺激性，没有叫“土地革命”，而自称为“土地改革”。

1946年5月开始的土地改革，其实是复制土地革命时期的做法。对地主、富农的“乱打乱杀”现象，侵害中农的现象，乡村流氓地痞乘机掌握基层政权的现象，都很普遍。此种现象，在中共阵营内部，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忧虑。中共陕甘宁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的习仲勋，就是不安、忧虑者之一。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习仲勋三次上书中共西北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土改中的一些做法表示异议和担忧。习仲勋的这些信件、报告，收入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

1948年1月4日，习仲勋写了“致西北局并转中央”的信。信中，习仲勋指出土改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诸如“把富裕一点的农民定成地主富农”“把店铺大都查封”“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打死”“民兵吊地主”“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吊、打、拷，弄得人心恐惶”等等。尤其是，指出了“许多地方”的群众运动是“盲目的”、是“为各种动机不纯的分子所鼓动起来”的，“让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

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呈上了《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直言土改中的各种“极左偏向”。习仲勋指出：“凡动起来的地区……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

1948年2月8日，习仲勋写了《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的报告》。《报告》中，习仲勋指出了土改中的一些政策的不合理，特别对依靠“贫农团”进行土改表示了强烈不满。习仲勋在列举了土改造成的负面后果后，指出：“其原因，就是有些地区工作同志，仍坚持组织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习仲勋强调：“贫农本身很复杂。”因为导致一个人贫穷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习仲勋指出，这些“农”的“贫”，“有的因为偶遭灾祸”，“有的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者”，而“后一种人，占贫农中四分之一，因而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是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亦由此而来……发展下去，流行于农村的借贷、买卖、租赁、雇佣等关系，都停止了……贫农团除此作用外，再少其他作用”。

与此同时，在山西的赵树理，面对轰轰烈烈的土改，也有了与习仲勋同样的不安与忧虑。习仲勋的信、报告，赵树理不可能看到。赵树理的不安和忧虑，完全是原发性的。1948年10月，赵树理发表了中篇小说《邪不压正》，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了乡村“流氓无产者”怎样在土改中把持乡村政权，怎样“打倒皇帝做皇帝”，怎样鱼肉百姓、欺压良善。小说引发了一些人的严厉批评。

1950年1月15日，赵树理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邪不压正〉》，说明了创作这篇小说的动机。赵树理说："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就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都可以。"赵树理强调，这种乡村流氓，"基本也是穷人"。如果要让他们发挥积极作用，就首先必须"加以教育"，就首先要对他们进行改造，"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性，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如果因为他们在土改初期表现最积极，就将他们"任为干部"，就把乡村政权交到他们手中，那就是"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土改是以地主、富农为斗争对象，当然不可能首先改造流氓，于是"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

流氓掌握了乡村政权，是坏人更坏。而本来不坏的人当了干部就变坏，可说是好人在土改中变坏，这也是让赵树理不安和忧虑的事情。赵树理说："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因为过去所有当权者净是些坏榜样，稍学一点就有利可图。"坏人掌权后更坏、好人掌权后变坏，"是土改中应该注意的两个重点"。

《邪不压正》发表之初即遭受严厉的批判，到了文革时期，赵树理还要又一次交代小说的写作动机。1980年4月，周扬为《赵树理文集》作序，说："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干部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倒退几十年，周扬是不会说这种话的。

说表现了"卓见和勇敢"，固然没错。说表现了常识和良知，也同样合适。有时候，常识就是卓见，而勇敢则根源于良知。如今读习仲勋当年关于土改的上书、报告，读赵树理《邪不压正》这类小说，我们感到的是常识和良知的光辉。■

（作者为学者、作家）

（责任编辑 冯立三）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400-610-0896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盒式助听器苏食药监械（准）字2012第2460530号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2第2460710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2第2460711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禁忌内容或注意到事项详见说明书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4100217号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档案里的“反革命”

○ 袁 凌

1951年4月27日夜间，镇压反革命高潮中的上海市组织了一次全市大逮捕，当晚抓捕8359人，以后数天间又捕获600余名漏网者，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加上此前已经逮捕的2万余人，上海一改在新中国成立初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落后”面目。

全市大逮捕的同时，大规模的公开处决连番举行。根据学者杨奎松考察，4·27后的第三天，上海一举在三个刑场枪毙了285名犯人，六月和七月一共处决了1060人，以求完成最高领袖“1951年上海要杀掉3000人，上半年要杀掉1500人左右”的指示。

更多的人则得到了从死缓到管制不等的各类刑罚，关押在提篮桥监狱人满为患的铁窗之后，或者遣送至各个新生的劳改农场、治淮工地。

大半个世纪过去，众多“反革命”破碎的人生轨迹保存在外滩档案馆收藏的上万份镇反决定书（判决书）缩微胶卷里。当事案犯有些符合1951年2月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中规定的武装叛变、持械叛乱、间谍和潜伏活动等情形，但大多数是有各种历史、出身问题或者行为失当的芸芸众生，在当时法律缺失的情形下，被统一归并在“反革命”的名目之下。

“反革命”的边界

上海市军管会〔51〕密二第2678号决定书（简称1951年度第8037号决定书）的案犯魏孝亭，原为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安徽学院教授。作为一位典型的旧式知识分子，他的罪案主要是两段：解放前曾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抗战初期在国民政府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任支部书记，以及“迫害学生及教师”；解放后政府要求反动党团特务主动登记，魏孝亭“抗拒登记”，“后经其友督促勉强前来”，仍仅登记三青团团员身份，隐瞒历史，登记后“又抱怨督促人”。

对于魏孝亭这样的旧式知识分子，参加过反动党团是比较普遍的历史短板。决定书对于魏的国民党党员身份语焉不详，或许根据是魏1937年参加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但这在年份上与史实不符。根据资料，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一期举办于1938年7月。况且中训团是训练全民抗战的机构，譬如抗战后期留学生出国前都要受训。魏孝亭在登记时只承认了他的三青团国立四中主任一职，由于国民党在中学推行集体加入三青团，这实际是魏作为校长的另一个例行身份。

魏孝亭在登记中疑虑重重，反映了一般有“历史问题”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认为自己从事教育和学术工作，和真正的国民党人员有所区别。他的这种自我区别显然不为新政权所接受。前后罪名叠加，魏被判处无期徒刑，虽然并无任何具体的反革命情节。

和魏孝亭近似的是辅仁中学校长杨于慎的案件。军管会1952年度第1189号决定书说杨于慎“冒充民革党员，抗拒登记”，称其为“党棍”，依据则是杨曾任国民党教育部驻沪专员。戏剧性的是杨的刑罚。杨被捕时正值镇反高潮，被判处死缓，后改无期，又改为13年。最终判决下达的1952年8月，镇反处决高潮已过，刑期缩水为5年。

除了曾担任教育部驻沪专员，杨于慎并无任何具体犯罪情节。杨的民革党员身份是否属于冒充，决定书无其他旁证。查阅资料可知，抗战时期，担任辅仁中学校长的杨于慎由于被日本人逮捕坚不吐实，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嘉奖，收录入教育部《专科以上学校教授及中等学校校长忠贞事迹一览》，孰料成为新政权下的反革命。

档案馆藏B1-2—1100-86号卷宗，即军管会1951年度第4839号决定书，记录了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盛振为的罪案。决定书称盛振为1933

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決定書

年“勾结战犯孙科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帮同拟定特种刑法、宪法草案(注：指五五宪草)等危害人民利益的反动法律，1948年任法学院院长后“在校中勾引特务”、抄黑名单致使学生被捕等，解放后“逢大游行时蓄意将女儿禁闭不准参加”。军管会通知国民党团特务登记时，“被告拒不登记”。4·27大逮捕中盛振为被捕，以后被判10年徒刑。

盛振为在抗战时参加国民党，具有了“反革命”的硬件；他作为法学专家参与国民政府立法，被新政权视为罪行；他管理学校和维护教学秩序的日常职责，沾染了迫害学生的嫌疑，所谓“毒化学生”的言论，不过是劝告学生要安心学习；连不让女儿参加政治游行也成为罪行。这些被新政权认定的罪条，当然与他的自我认知不符，不参加反动党团特务登记顺理成章，接受审讯时对自己学者身份的辩护也很自然，档案中记录为“巧言强辩”，加重了刑罚。

在1951年中期镇反高潮中，“抗拒登记”或“登记不实”案的普遍出现，说明何谓“反革命”的边界，在当时是变动不定的，大量“有问题的人”自我辨识不清。

上海解放之初，在饶漱石、陈毅、潘汉年的主政下，政府对待知识界和工商界人士相对慎重。当上海迫于中央压力“镇反补课”，一改先前态度，这里就成为重灾区。

工商业发达的上海，镇压反革命是和经济上的“三反”“五反”、军事上的抗美援朝、爱国捐献互为犄角的。最为震动的是新光大戏院老板夏运良和大康西药房老板王康年的被处决。

军管会1951年度第8714号决定书记录，夏运良“为本市戏剧界著名恶霸20余年”，广收门徒数百人，霸占房产，勾结汉奸李士群、“匪首”宣铁吾。经常召集沪剧艺人到新光大戏院唱堂会不付钱，欺压知名艺人如施春轩等；解放后威胁职工，阻止张贴抗美援朝标语。决定书认定他“系城市恶霸，一贯凭借反动恶势力，敲诈勒索，虐待职工，强奸女性，解放后造谣惑众，实属怙恶不悛，罪大恶极”，判处死刑。

夏运良系上海演艺界头面人物，所列各项罪行亦非具体，他的被处决无疑会震动演艺界，方便整肃这一情形复杂的行当。罪行中有一条“阻止张贴抗美援朝标语”，又可以当反面教材促进抗美援朝动员，掀起募捐支前的热潮。

1951年8月23日至26日，上海沪剧界22位演员在新光大戏院举办“捐献飞机大炮前辈艺人义演”，主演之一就是施春轩。

大康西药房老板王康年的处决，更直接肇因于抗美援朝。王康年的罪名是骗取贷款、买空卖空；抗拒爱国募捐，甚至以假药供给志愿军，有意毒害志愿军战士。当年《解放日报》报道，王康年将带菌棉花旧纱布做“急救包”，用假药和旧次医疗器械等抵充定货，致使成千上万志愿军伤员用了“急救包”而遭细菌感染身亡。这样的罪行自然受到全国人民共诛的声讨，使他成为“黑心奸商”的样板，臭名历久不衰。

不论王的罪行属实与否，此案显然牵动了上海各界的神经。上海档案馆D1-1-1309号卷宗显示，1953年3月25日，参加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高等教育界三位代表联名，要求了解政府对于王康年等人如何处理。市委秘书长在下级请示材料上批示，可以书面答复，但不必告知报上未公布之案情。有关部门据此回复，王康年已经政务院批准，于1952年2月判决执行死刑。由此可见，对于王康年判决的具体情形，外界并不知晓。

当“反革命”的覆盖面拓展到知识界和商界上

层人士，说明在领袖要求的“补课”压力包括捕杀人数指标下，反革命罪名的内涵已被挖掘到极限。

“恶坝”与诨名

新政权要扫荡的不光是旧社会中上层，也包括旧政权土壤的污泥浊水、“社会蚂蝗”。这类人群纳入反革命，正式名目是“恶坝”（注：许多卷宗如此，实为“恶霸”），如果有人命“血债”，则可能判处死刑。在《指示》里，共区分为恶霸地主、工厂恶霸、码头恶霸、街道里弄恶霸、妓院等娱乐场所恶霸。有意味的是，在“反革命恶坝”的名目之外，他们还往往有各种载入决定书的诨名。

袁凤英是一名“妓院恶坝”。上海档案馆藏B1-2-1285号案卷记录，她本人出身于妓女，以后傍上姘夫开妓院。勾引欺骗无知少女卖淫，曾罚妓女跪碗底，还协助姘夫强奸幼女，按住幼女两脚协助强奸，最后一条则是“造谣破坏，污蔑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

袁凤英的“血债”是以火烧红的砖头加醋烫妓女下部致死，听来自然触目惊心，罪不容诛。但根据案卷内其他材料，实际是该妓女下身生毒疮，袁用土法热砖加醋敷烫之，该女伤势加重，以后身亡，并非有意虐死。

“妓院恶坝”被追究的背景是新中国的肃娼运动。袁凤英逃过一死的原因，除了她本人的妓女出身，还由于她于1951年6月被捕时上海尚未全面取缔妓院，军管会考虑此时处决袁及其姘夫是否会有影响；案卷中分局意见判无期，市局初审加判为死缓，复审认为可判无期或死刑。待到袁案最终判决的1952年8月，镇反处决的高峰期已经过去。袁最终被判无期，逃得一命。

对于社会底层出身的各种“反革命恶坝”，如无确实“血债”，新政权大抵是处以重刑但留其一命。军管会1951年度第7962号决定书的被告田作养，年仅23岁。案卷说他一贯不务正业，专事敲诈勒索，拐带妇女，纠集流氓打人；解放前夕与众流氓一起拦路杀死一青年男子，埋尸灭迹。解放后又冒充解放军来上海，造谣破坏。从所列罪行看，田作养属于一般性的小流氓。与众人一起杀死青年男子一案，发生在外地，并未提到人证，可能属于无法核实的举报。田作养被判无期。

对于出身低微的袁凤英、田作养一类“恶坝”，军管会仍属手下留情。而出身成分高、在旧社会有一定地位的“恶坝”，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即使没有确实的“血债”，也可处以极刑“以平民愤”。案卷中的数份决定书显示了这一宽严之别。

王学汀是个典型例子。上海市法院杨思区分庭第17号决定书显示，王学汀时年已经74岁，绰号“赤练蛇”，系恶霸地主反革命。王在清朝曾任乡理事会议员，入民国后仍为绅董，其子任参议员，属于典型的乡绅。决定书称他包揽词讼、敲诈勒索、放高利贷、收取人民“孝敬”、霸占地产，譬如曾因同业竞争迫使某柴行关闭。在土改时又威胁村干部，制造谣言，称“国民党快要回来了”。这些案情都没有脱离一般性的“恶坝”范畴，够不上极刑。

但决定书特意多次提到，人民对他“切齿痛恨”，一位寡妇之女王桂新控诉王将其母女“赶出王家门，霸占其房屋和九分土地”时，“悲愤地说一点一滴是写不完说不尽的。”王赶孤女寡母出王氏家族，大约与其族长身份和当地风俗有关。决定书中也没有其他“切齿痛恨”的案例。但法庭从“人民”（实际是阶级）立场出发认定他足够“罪大恶极”，因此“接受人民群众要求，判处死刑”。

虽然名为可怕的“赤练蛇”，王并没有人命债，罪行也比较含混。这点在案件请示过程中被市秘书处人员注意到，在报军管会批准时注明，“该犯就历史罪恶说确实可杀，但具体罪证不多。是否杀，可考虑。”军管会领导则批示，“王犯虽具体罪行不多，但长时期反动，称霸一方，该处居民莫不切齿痛恨，民愤很大，仍应处以死刑。”批示中的“该处居民莫不切齿痛恨”一句被画掉，但很显然，“人民群众的要求”决定了这位老资格乡绅的命运。至于镇反动员中的民愤虚实，就无人考究了。1951年7月，这条74岁高龄的“赤练蛇”被处决。

“扫帚星”周招娣的被处决，更不加掩饰地体现了“民愤”的压力。B1-2-1175号档案保存的周招娣案卷显示，周招娣是戏院老板，据说生性霸道。周的主要罪案是阻止无票的乡民入院看戏，激起矛盾，被联名举报“查门票吓死小孩”。另外还有一宗无法查实的人命举报，据称一名男子被周殴打，数月后去世。

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決定書

一九五一年 軍辦秘(51)字第　號

主任 陳毅

副主任 粟裕

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

按说周的所谓罪行属于乡邻矛盾，查票吓死小孩的情节也不合常理，但提篮桥区法院以民愤为由判处了周死刑。市法院复查发现，周的罪行可疑，又系女性，改判无期徒刑。但意见下发后，激发提篮桥区强烈反应，认为她是流氓恶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留在社会上对人民有害无利”。市政府处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因此加判为死缓，似乎就此定案。不料提篮桥区仍旧强烈不满，认为周招娣民愤甚大，要求杀，毋庸缓刑。最后经主管政法的潘汉年批示，军管会以“恶霸”“有血债”罪条判处周死刑，对于她的“血债”，则称“虽该犯言辞闪烁，其罪行自可认定”。

盖有上海市军管会大印和陈毅、粟裕签名的军管会1951年度第2678号决定书上，保留了从死刑到无期徒刑到死缓再到死刑的毛笔字迹潦草的涂改，几乎难以辨认，周招娣的命运在民愤和法律的矛盾之间来回辗转，终究厄运难逃。一颗“对人民有害无利”的“扫帚星”，就这样以“人民”的名义被拔除，法律的具体规定已不重要。

决定书中记载的各种诨名，普遍有一种“非人类”的凶恶感，似乎可据此先行定罪。诨号或许取自民间，但决定书强调使用，也体现了某种办案思路。

特务功罪

在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反革命案卷宗中，案犯具有特务或军官身份的一类，往往有逮捕或杀害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的“血债”，算是比较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了。但恰恰是这部分人的情形特殊，最终的判决常常在罪、功、罚之间来回变动，像一只总是摆放不稳的三脚凳。

吕金康的罪名是恶坝汉奸特务，军管会1951年度第3415号决定书指控他1937年即任汪伪警察局便衣队员，广收门徒称霸闸北海淀路一带。抗战中期吕加入中统，1943年又投入日军宪兵队，并曾任日伪控制的“川沙和平自卫军司令”，是个典型的“狡兔三窟”式人物。抗战胜利后吕又投靠军统充当义务稽查员，还曾经诱奸少女霸占他人妻妾，“群众莫不切齿痛恨”。解放后吕“仍不思悔改，在登记时隐瞒罪行”。

办案人员初审判处吕金康死刑，没收全部财产。市政府秘书科复审认为，吕金康检举了几个潜伏特务，其罪行似不必处死，可判死缓。但军管会审查组认定，吕金康在担任日伪特务和“司令”期间，被人检举曾杀害5人，他都推在土匪身上。因为未经调查，没有证据，但“据他当时声势，杀人很可能。这种人理应处死”。最后经潘汉年批示“可以处死”。吕金康就这样被“很有可能”的杀人情节推上了刑场，他的检举同类“功不抵过”，难逃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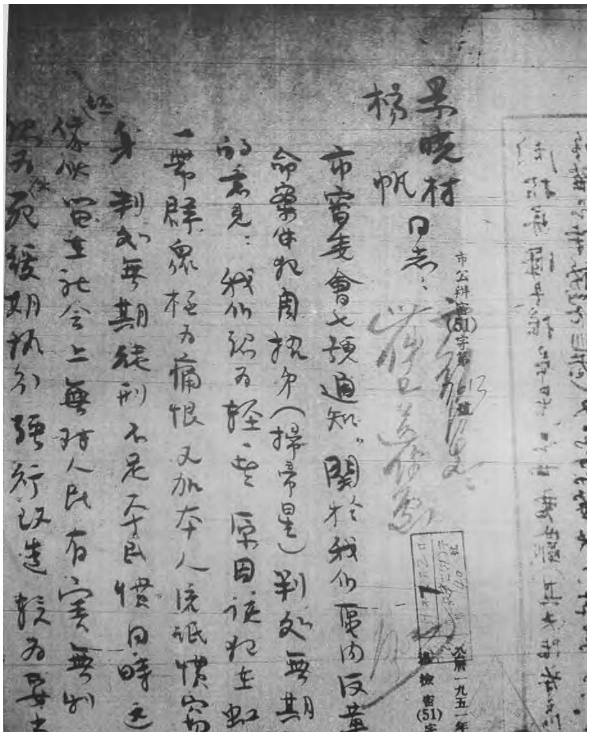
另一名匪特人员方发武则因为“立功”死里逃生。军管会1952年度第10708号决定书记载，方发武系兵痞，在汪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中从士兵干到连长，1949年2月参加中统，任中统上海站副站长。曾有下乡催粮敲诈、逮捕爱国志士、强奸女工、殴伤工人等罪行。解放前夕方发武逃亡台湾，不久又潜沪，试图投奔土匪，最后自首。像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匪特人员，判处死刑应该没有什么意外。

但方的判刑是在镇反高潮过后的1952年7月，最终的判决是死缓，其中别有隐情。办案人员最初处理意见是“群众对方犯切齿痛恨，拟同意判死刑”，但又批注说侦察科长批示方“有表

现，拟查明后决定”。复审人员的批注则挑明了其中内情：该犯罪行民愤均大，但“惟过去滥用特情”，监狱曾安插方发武到第一批判刑遣送西北的劳改队中工作（注：充当线人），虽然最终未成行，“该犯倒特积极表现，造成今天处理讨厌。”复审的意见是判死刑或死缓，案卷送到市公安局领导处，领导批示“可恶，缓刑2年”。最后由潘汉年决定，判处死缓。

方发武的判刑意见和复审批示，明白地显示了解放初上海市公安局“滥用特情”这一特殊手段引发的尴尬。“特情”即以特反特，新政权控制一批国民党特务，运用其经验人脉参与侦查办案。主事者是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局长扬帆，两人都是老资格的地下情报人员，在敌营之中“故旧”不少。

提篮桥民国末任典狱长的王慕曾，是所谓“功不济罪”的典型。王慕曾早年属军统人员，在1949年旧政权大厦将倾之际谋得典狱长一职，可谓自动坐上火山口。不久地下党找到王慕曾，想要营救政治犯，王慕曾为留后路极力配合，终使50人毫发不损获救，监狱和平移交解放军。营救过程中地下党曾承诺，保证王慕曾的身家安全。解放之后，王慕曾被留用为公设辩护人（律师）。但在1951年的镇反中，王被逮捕，当年7月



被处死刑。

上海市军管会1951年度第1897号决定书称，王慕曾早年曾参加军统，是戴笠的亲信爪牙，蒋匪反动集团要员。在陕西临潼当县长期间曾逮捕数名进步青年，这些人被解送西安集中营后遭杀害；他还亲自捕杀过一名进步人士。解放以后又抗拒参加反动党团特务登记，“显为罪大恶极怙恶不悛。”耐人寻味的是，这份判决中完全没有提及王慕曾对50名政治犯的营救之功，反而指控其“在上海解放时乘秩序混乱指示爪牙阴谋破坏”，“隐瞒其身份及反革命罪行”。

根据提篮桥监狱史编者徐家俊的采访以及军管会决定书显示，王慕曾被处决的根本原因是陕西方面来人举报。案卷材料中并未记载核实举报的经过。

徐家俊透露，王慕曾向当初他营救过的共产党员求援，其中一人曾去函说明，但未起作用。这些人解放后自身也靠边站，他们当初对王慕曾的承诺在镇反大潮面前缺乏效力。

“叛徒”一族

在特务案犯中，有一类特殊的人群，以前曾经参加革命和入党，属于革命同志，却因为叛变成了敌人，甚至成为特务。但在同为“革命党”的国共两党长期复杂关系中，“叛徒”这个词并非后来听起来那样绝对。在犬牙交互的隐蔽战线上，他们往往和旧同志保留某种联系，为党组织所利用。

解放之后，这些人的处理成了一大问题，镇反档案中的不少卷宗，记载了这类“叛徒”的命运轨迹。

44岁的季苏是中统特务，1927年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捕叛党，军管会1952年度第16706号决定书指控，季苏出卖过组织使4位同志被捕，下落不明。以后曾任中统上海组训股副股长，负责“剿共同志会”，主要从事对被捕中共党员的劝诱，决定书称他曾诱骗青年50人参加国军。以后季苏离开特务系统，任地方法官和县长、上海法院检察官，“长期迫害革命，残害人民，罪大恶极”。

这样一个“有血债”的叛徒、特务，看来难逃重刑，但他决定书上的初审刑期是15年，以后又改为7年，决定书上原有“本应严惩，因有悔悟表

现”的字样，以后删去。在案卷中保留有军管会领导批示，说明他不仅解放前就为党组织做过一些工作，解放前两年中断了与中统关系，而且解放后经其在中共统战部门任职的亲戚介绍，经公安局局长扬帆分配在虹口公安分局工作，“一般表现还好”。复核中有人批示认为应维持15年，经军管会复审，最后仍判7年。

关于此案，公安局承办人还曾在1951年9月请示报告，称对于这类人员，在量刑上“我们尚缺乏正确的认识，自然不会准确，请中心组同志审核指正”，似乎还透露出对于军管会减轻刑期的某种保留意见。这形象地说明了此类人物的处置是一个复杂问题。

孙平则是一个厄运难逃的叛徒。孙平“一度混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向国民党县党部“自首”，1938年加入中统，于1950年被捕。军管会1952年度第10645号决定书指控，孙平在1941年担任江西弋阳县代理县长期间，曾以抢劫罪名处死13名案犯，孙平称之为土匪，决定书却认为是贫民。另一宗罪行是在日本投降后，孙平曾率自卫队与共产党游击队作战3次。解放前夕，他曾陪同蒋经国考察某次会议会场。

孙平的主要罪行来源于自行坦白，可谓登记诚实的典型。最初的“案犯处理意见表”上，办案人员批示“罪行均其自白，判处死缓”。但到了镇反高潮的1951年年底，上级认为他是叛徒特务，又在当县长时受嘉奖，是敌人骨干。尤其是曾杀害多条人命，可以处死。

显然，作为国民党县长的维护治安、镇压盗匪，和新中国政权的镇压“反革命盗匪”不可同日而语。

死神追踪

上海市监狱1951年度第1381号死亡证明书的主人公童峰山，正处36岁的“本命年”。童峰山1950年9月以反革命罪名入狱，判刑5年，服刑9个月以后即死去。死亡证明书说他在押期间身体弱，入狱前就患有肺结核，在狱中发热咳嗽，并发颈部淋巴脓肿，入监狱医院治疗无效，于当年7月死于心力衰竭。

证明书所附的验尸报告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尸体特征，如眼结膜白色，腹部呈绿色，胸部有紫色斑点，尸斑不显著。死者全身贫血枯瘦，颧骨、眼骨和肋骨凸显，腹部下陷，四肢瘦削。从这些特征看来，童峰山生前处于极度的营养不良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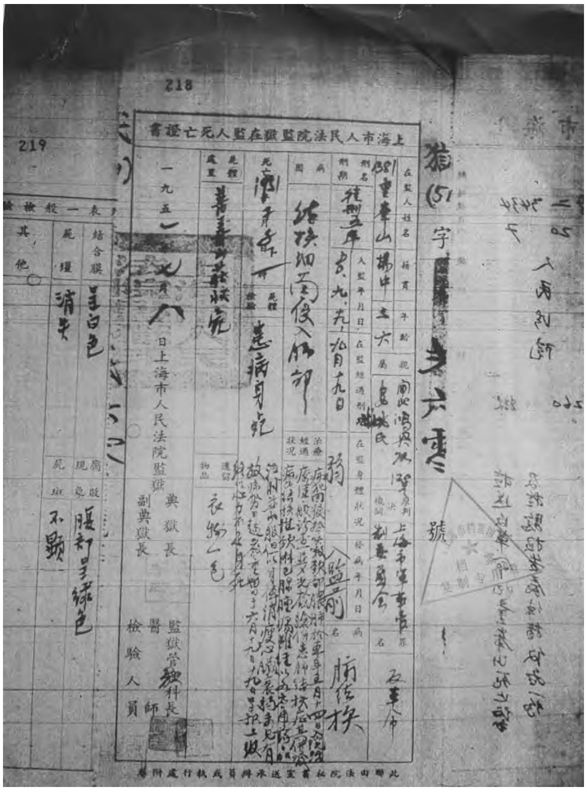
上海档案馆收藏的另一份“中统特务登记不诚”案卷记录，42岁的蒋德甫原为一家渔行经理，1951年4·27大逮捕中入狱，不久就患胃出血进入监狱医院，6月份去世。死亡证明书称他入狱前患有胃溃疡及贫血。案卷还记载他“政治思想模糊，流氓派头”。但在迅速到来的死亡面前，这些都已不再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童峰山死后由一个叫“普善山庄”的组织收尸，这是一个在民国时期就专门负责收留处理犯人和穷人尸体的慈善机构。

童峰山和蒋德甫入狱前患有疾病，但都非绝症。入狱加速了他们的死亡。这显然跟大逮捕之后的提篮桥监狱（上海市监狱）生存状态恶化有关。

上海市监狱局内部出版的《提篮桥监狱志》记载，4·27大逮捕之后，提篮桥监狱顷刻爆满，犯人总数攀上了历史最高峰，每室关押人数达到5名。而囚室原设计为单身囚室，面积约3平方米，平时不过关押两人。如此拥挤之下，生存条件恶劣可想而知，疾病也便于传播。

1951年9月7日，提篮桥监狱在给市政府的


上海市人民法院監獄在監人死亡證明書

在監人姓名：童峰山
年齡：三十六
刑名：徒刑五年
入監年月日：五〇、九、九
死亡年月日：一九五一年七月八日
病名：肺结核
死體處置：普善山莊收殮

一九五一年七月八日 上海市人民法院監獄
典獄長
副典獄長
監獄管獄科長
醫師
檢驗人員

报告中提出，为解决监舍拥挤，便于以后继续收容犯人，采取送苏北劳改一批的办法。

诸种困难之下，提篮桥囚室中的犯人死亡率直线上升，官方统计，1952年死亡人数达到463人，创下历史纪录。而从死者童峰山姓名前“1381”的号码来看，实际情形可能更严重。这些头顶“反革命”帽子的犯人，本身刑期未必很长，却早早地失去了性命。

对于多数体检合格的犯人来说，出路是遣往各地的劳改农场，从邻近的苏北、安徽到遥远的青海、新疆。遣送途中经常发生逃亡，也出现死亡。1950年3月上海市第一次遣送犯人2500余人（包括女犯360名，少年犯220名）去苏北盐碱垦区劳动途中，发生了大规模逃跑事件，56名逃犯中受枪伤身亡1名，当场击毙1名，落水淹死1名，抓回3人，另有50人脱逃，成为监狱历史上的重大事故。

判刑后赴劳改农场改造的犯人，也可能面临死神的追踪，〔55〕沪法一密656号执行书记录了这样一个特殊案例。4名案犯在1951年年初判处徒刑，遣送西北劳改。但在4·27大逮捕之后，军管会改判这4人死刑。

军管会发函给西北劳改单位执行，法院也催办数次，但似乎沟通不畅，三年公函往返，才将其中一人押回上海枪决。1954年6月西北局公安局复函说，经过询问延安劳改支队，得知一名犯人已死亡，其余两名犯人蔡家齐、顾华林于两年前又由延安支队遣送至更远的新疆劳改。公安局向新疆军区劳改单位发函询问，尚未接到回信。

以后上海市法院于年底和第二年4月两次发函催办，直到1955年年底也没有得到回音。其间西北大区取消，公安局也撤销，无法联系，此事成了难题。上海市中级法院在给高级法院的报告中说，希望高院通知有关部门查明二犯具体劳改地点，督促劳改机关“结合两犯劳改中的具体表现，另行改判或立即就地枪决”。

显然，镇反高潮过去，在鞭长莫及的现实困难面前，法院执行死刑的决心也发生了变化。对于蔡、顾两名罪犯来说，他们在辗转服刑途中，全然不知道身后还有一份迟来的死刑判决书追赶，最终追上与否，是否改判也不得而知。

犯人龚俭民在到达内蒙古哲南劳改农场数年后身亡。档案中的死亡报告表记录他42岁，南通人，大学文化，在4·27大逮捕中入狱，因反革命罪判刑18年。罪行是曾投靠汪伪特工系统，以后又任中统工运组干部。入狱时龚俭民身体弱，1955年7月24日在地里干活一整天，下午6点忽然全身倦怠，头晕失语，四肢发冷。以后龚俭民瞳孔放大失去意识，注射强心剂和葡萄糖无效，于晚上10点多死亡。

龚的死因标明为脑贫血并日射，看来是长时间在炎热天气和太阳直射下干活，诱发中风身亡。验尸报告显示他体格营养不良，全身瘦削，脸部、眼结膜贫血，手灰白色，可见劳改农场生活状况。

档案内外

对于绝大多数“反革命犯”来说，档案只是他们入狱前生平的最粗略记录，无从反映他们的囚徒生涯。

文革前夕，因为在大学期间组织“反革命小团体”被捕的严祖佑，在提篮桥囚室中遇到了镇反中入狱的老犯人徐公恕。

上海档案馆藏B1-2-1247-150号案卷记载，徐公恕出生于1899年，案由是汉奸恶霸，逮捕于1951年4·27大逮捕之夜。军管会决定书称他流氓出身，一贯不务正业，诱人妻子怀孕，堕胎导致人命。抗战时组织游击队，不久投奔日伪改编为和平军，私设关卡勒索人民。抗战胜利后又充任甲长，拜军统特务为“老头子”，组织军统外围团体“侠谊社”，属于洪帮人物。解放后制造谣言，登记时“对过去罪恶又百般隐瞒掩饰”，逮捕后仍拒绝坦白，“一味狡猾”。由于并非直系的军统人员，又无显著罪行，徐免于处决，被判无期徒刑。由于年老，长期关押于提篮桥监狱。

和严祖佑相遇时，徐公恕已年届古稀，患有严重心脏病，下肢半瘫，看去若行尸走肉。虽然仍旧事事挑剔，似乎保留着一点“流氓”派头，其实内心寂寞无比。一次徐公恕半夜受凉，一位女护士给了他一只热水袋，他竟拉住女护士手哭泣，事后遭到同室犯群起臭批为“发嗲不要脸”。

1980年，新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徐盼秋参与平反上海知识界冤案，委托原东吴法学院研究生聂昌颐提供线索，聂告诉了他盛振为的名字。从劳改农场被释放后，盛振为住在苏（下转第26页）

深切怀念本刊顾问曾彦修先生

曾彦修先生不幸辞世，旧雨新知，沉痛哀悼。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送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中组部部长赵乐际、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以及党和国家前领导人乔石、朱镕基、温家宝、曾庆红、吴官正、贺国强、李长春、田纪云等　　（摄影　徐庆全）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是李锐、何方、杜导正等人对曾彦修的追思文章。

曾彦修，四川宜宾人，笔名严秀，当代思想家、杂文大家、著名出版家、《炎黄春秋》顾问。1919年生人，1938年入党，先后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宣部工作，1949年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总编辑，1954年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1978年出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著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一盏明灯与50万座地堡》《微觉此生未整人》《平生六记》等著作。2000年出任《炎黄春秋》杂志特邀编委，后为《炎黄春秋》杂志顾问（参加社委会）。2015年3月4日凌晨，曾彦修先生因肺炎遽然逝世，享年96岁。

3月5日，《炎黄春秋》编辑部鸦雀无声。编辑部同人在社长杜导正的倡导下，向杂志社顾问曾彦修默哀，痛惜和沉思弥漫在小小的编辑部里。

3月9日杜明明代表杂志社前往协和医院参加了曾彦修的遗体告别。

长女周小燕、儿子曾小平肃立于父亲身旁，幼女周枚也从澳大利亚远道奔丧。他们恸哭失去一位好父亲。曾彦修生前好友于光远的女儿于小冬也来了，他拼了命保护过的戴文葆的儿子来了，他们哀悼失去一生总是用生命护佑他人的高贵者。没有鲜花没有横幅没有哀乐，空空荡荡的大厅却盛满了哀恸，这哀恸几乎让人承受不了了。

周小燕哭着念给父亲一封信，是当年她为了给父亲落实应有的医疗和住房待遇偷偷写给有关领导的。但是曾老却为此斥责女儿毁了他一生的清誉，一直不愿意原谅她。女儿哭诉说："当时，我只是把信给了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商量，并没有非份要求。父亲，您一定要原谅我啊。那不过是您应该享有的待遇啊！您一生都是宽厚待人，亏待自己啊！……"他们全家子女和亲戚都跪别了他，人们泣不成声。

3月10日，本刊社长杜导正等人前往曾彦修家里悼念。家里所设的灵堂，摆满了从总书记习近平到各界人士所送的花圈。

他是讲究做人的

李　锐

我认为，曾彦修是对党，尤其是对党在1949年后执政治国问题上觉悟得最早的人之一。他是讲究做人的，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人，当做人与

做党员发生冲突时，他选择做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值得敬仰和学习。

我跟曾彦修是同时代的人，我比他长两岁。我们同在延安待了六七年，最初我和他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他与田家英是同乡，当时他们都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知道我的经历。1952年后，他调到中宣部，我改行搞工业，不在一起了，但常常从田家英那里知道他的情况。

我们的经历比较相似。他的问题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后，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我反对批判胡风集团，反对反右运动，后来成为开除我党籍的10条罪状中的前两条。我在工作单位就没有打几个右派，我对反右是很反感的。田家英告诉我，反右派前，他给曾彦修打过电话，要曾注意说话的分寸。他还去过曾家特意当面提醒过他。说来可笑，曾彦修成为右派的主要原因竟然是杜甫一首诗中的两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荒唐啊！

在四清时，他已经被下放在工厂工作。四清运动开始，他对30多个被认定有问题而且自己也承认了的人，反复调研之后，亲笔为每个人写下厚厚的证明材料，他认为："我这一生真正谈的上是做了一件事的，就是这件事。即1965年在四清运动中，为被审的三十来个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这一类怀疑的帽子，全部彻底以书面撤销了这些怀疑。我一生的其他工作，我认为也就是办公而已。"

年前，当我看完曾彦修赠的《平生六记》，6次经历的政治运动，他是怎么对付这些运动的。十分感动，我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打油诗，夹在书里，今天翻出来读给你听：

革命改良对折磨，上世纪中惊逝波。暴力引来仍暴政，改革方能去梦魔。

这是曾彦修的《平生六记》引起了我的思考后有感而发，这也是我对整个20世纪世界和中国政治走向的思考。人类的进步是靠搞改良和改革，绝对不是暴力。（改良和改革在英语中是一个词）胡适是提倡改良的，延安整风时曾遭到大批判，认为改良是反革命，资本主义搞的是改良，利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暴力革命引来的必然是暴政，只有民主体制下的改革，才能真正让社会走向进步，人民享有幸福。

曾彦修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说鲁迅就是讲怎样做人，鲁迅前半生的文章最好。他非常赞成鲁迅说的必须先做人再做学问。92岁高龄时，竟以一身之力编辑了《鲁迅嘉言录》一书，根本的动力在于责任感。他说鲁迅曾经呼喊：救救孩子！"今天我却觉得我们也未必不可以呼喊：救救鲁迅！"他呼吁要把鲁迅"从神坛与框框中解放出来，让人们比较自由地来研究他。鲁迅是骂不倒的，但却可能会被一味的、片面的、不当的歌颂所孤立、所淹没。天下事没有例外：凡不能批判的人，都不可能是伟大的，因为说明他经不起批判。"

曾彦修认为，鲁迅最大的功劳在于他是一个空前的启蒙家、思想家，他最大的功绩是在中国发现了一个"人"字。他一生最根本的目标是改造中国的国民性。鲁迅一生追求的是中国的富强、现代化和民主化。他呼吁大家一定要读鲁迅，研究鲁迅。

陆定一78岁时，用毛笔抄写了于谦的一首诗赠曾彦修。这首《石灰吟》借写石灰来抒发诗人的志向，陆定一用在这里，表达了他对曾彦修的一种敬佩：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以史为鉴，能知兴替；以人为鉴，能知得失。他参与《炎黄春秋》社委会工作，非常敬业，令人难忘。

高尚高贵写春秋

杜导正

曾彦修，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出版业领军人物之一。20多年来他所以是《炎黄春秋》的中流砥柱之一，在于他对历史求真求实的坚定性，在于他高贵品格的感召力。他的一生，处处体现着对人的关爱，闪耀着高贵的珍重他人生命和名誉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经历了六次"非人"的政治斗争，但是每次他都勇敢地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挽救他人。他身体力行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高贵的

仁慈的人;他永远是杂志社同人的楷模;是我们《炎黄春秋》宝贵的精神财富。

曾彦修是党内觉悟得早的老党员,他在解放后的“三反”运动、反右运动时就觉悟了,他属于早年的老党员,跟李锐一样。

我觉悟比较晚,我是中共抱大的晋察冀娃娃党员,13岁入党。直到1959年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即庐山会议后才第一次有点觉悟,到了文革才有第二次觉悟,到了1989年风波才第三次觉悟。

第一次见到曾彦修是90年代在我住的大院内——陶铸夫人曾志家。曾志让我找了几个老记一起研究《陶铸传》。曾志请了他,尽管早年他挨过陶铸的整。

2000年,他成为《炎黄春秋》特邀编委之一。风里来雨里去,随叫随到。《炎黄春秋》经历了10多次风波,每一次总有他瘦削的肩膀、明晃晃的眼睛。他语言从不激烈,很温和,他的话经常让大家冷静。他的态度跟杜润生、任仲夷和我一样,我们都认为要换位思考,希望理智地去解决复杂的问题。

我早就知道他把自己划成右派一事,但他总是英雄不提当年勇。一次被我女儿问急了,他微微一笑:说,简单了,名额不够,把自己加上去喽。一直到他的《平生六记》出版之后,大家才知道他是冒了怎样大的风险,他之所以把自己划为右派,是为了解脱人民出版社的其他领导不被一锅端。

反右那会儿,我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当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杜不抓右派,因为他自己就是右派!”我违心按上边规定划了4个右派。跟他相比,多么巨大的差别。尽管后来我亲自登门向受害人致歉,但在我良心上一直是不能原谅自己而终身内疚悔恨的。

今年2月17日,听说曾彦修肺炎住院了,我赶到协和医院帅府519病房,他戴了氧气面罩,不能说话,但眼睛还炯炯有神,头脑很清楚。他与我几次紧紧握手,许久不肯放开。10天后,他突然呼吸衰竭,我赶到了医院,可是因为刚刚抢救过来,不准任何人探视。我在他秘书马立国协助下闯进医院,见到了他。只见他面色尚好,戴着氧气面罩,眼睛还很明亮,头脑依旧清晰。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不忍松开,我们两人眼睛都湿润了。他知道,我的到来,是代表了杂志社,代表了杂志上百万读者啊。这里面的分量,我们彼此的心里一清二楚。

他念念不忘杂志,惦记着他上月为我们赶写的一篇鲁迅研究的长文。他知道这文章《炎黄春秋》第4期刊登,他很惦念,他说他大概是看不到了,真遗憾啊。

临别,我向他深深鞠了几个躬。当时看他的精神状态,以为他还可以坚持一阵子的。谁知,这竟是永诀。他把遗体全部捐献给了医院,自己连骨灰都没有。这需要怎样的远离世俗和无畏!

他走了,他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眼前:2008年,我们八九个人在李锐家,为了给温家宝用4万亿元投资来应对金融风暴的“大手笔”提意见,我们提醒中央:弄得不好这4万亿将会被贪污分子分掉。于是上书中央要严格监督,他马上签了名。

去年9月《炎黄春秋》遇到的风波中,我们6个90岁以上的老党员给最高领导人上书,他也是挽起袖子第一个签名。

就在不久前,他还来杂志社议事,希望为杂志社度过困难出主意想办法。在《炎黄春秋》的多事之秋,他不顾病痛缠身,以他瘦削的肩膀担起了《炎黄春秋》杂志顾问的重担并参加社委会,参与社里重大问题的决策。

当年曾彦修因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妻离子散,境遇悲惨。可是,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在四清中他再次拼了命挽救了30个被“定罪”的反革命、特务、反动资本家。我女儿曾问过他,您是在延安挨过整的,难道不知道不跟着党走很可能万劫不复吗?他说,当时的环境你没有选择,我选择了良心。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会有例外,唯独一件事没有例外,这就是良心。诚哉斯言,壮哉斯言!

我想,追求良知和求实,这正是《炎黄春秋》的追求,也是我们杂志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一直被读者爱戴,被有良知的共产党人庇护的原因所在。

我们永远怀念您,曾彦修先生!

沉痛悼念曾彦修同志

何　方

挚友曾彦修同志病危并终告不治，我很悲痛。2月27日我写过一张字条向他告别："在平生好友曾彦修同志已处于弥留之际，我不能前去话别、送终，感到万分悲痛，只好从病榻上爬起，写下一些话。我和曾老交好多年，可说是情投意合。他崇高的思想和纯洁的人品，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在长期交往中，他从来都是坦诚相见，没有丝毫的虚假和应酬。在我看来，曾彦修同志早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对我们伟大的祖国来说，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的。曾彦修的思想和精神因此更加值得人们珍视和传承，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成为全国人民的一份宝贵财富。一代伟大的人道主义战士和思想家曾彦修永垂不朽！在此诀别之际，我相信彦修老友在离开人世进入极乐世界的彼岸时一定能够一路走好，保持他特有的平静和安详，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地走去。作为长期追随他的学弟，我最后向他致以诚挚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愿我们的友谊万古长存。小弟何方泣血再拜。"他的秘书小马当天就念给他听了，他说了声："谢谢！"

彦修同志是我一生中一位难得的知己加诤友。我们的深交始于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隆重举行追悼会为张闻天平反昭雪，我们二人被指定参加起草悼词工作。指定我们两人，是因为彦修同志先在延安马列学院做过张闻天的学生，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又受他领导并随他赴晋西北进行过农村调查。我是1949年在辽东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被张闻天看中，1950年跟他到北京从事外交工作。他一直把我当作他的助手，直到1959年他被毛泽东打倒。1979年11月，在胡耀邦同志倡导下，中央决定成立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并指定我们两人为小组成员并负责处理有关张闻天平反后的一切宣传和资料收集整理等事宜，这项工作持续至今，我们合作了30多年，彦修同志做了重要贡献。一年多前《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一书的出版，他就起到关键性作用。

不过，我和彦修同志的深交，并未限于研究和纪念张闻天。我们更多是就一些理论和中共党史问题交换意见。1999年我改行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写出《党史笔记》一书。成书前，每写完一章都必送请彦修同志审阅修改，他几乎每篇都有回应，有的章节还引发他的长篇议论。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有一次他给同一章提的意见，竟抄改3次，一寄再寄。

说我们是诤友，是因为我们交换意见时彼此毫不客气。为张闻天起草悼词，两人刚刚结识，我不揣冒昧，对他原先起草的部分拿起笔来就改。对我这种不讲礼貌的鲁莽行为，他不仅毫不见怪，反而连说改得好。这也是他后来对我做出过高评价（我不敢承受）的原因。我们之间一直是直话直说。他撰写《天堂往事略》时，曾分篇寄给我征求意见。我对他偌大年纪还下那么大的功夫，包括硬啃维辛斯基的法学著作实在佩服，但对他把书名定为《白头宫女话长安》自比"白头宫女"，感到实在不妥，坚持提了3次，请他换一个。他舍不得改，直到最后关头才改。他给我写的东西提意见，则是通篇就像给中学生批改作文那样：具体到这词或那句"删""加""改"。

彦修同志多年来一笔一画地写给我的信札，数量相当可观，反映了他对我的深厚情谊，更是他深刻而犀利见解的珍贵记录。

永远的曾彦修

张惠卿

我和曾彦修相识60多年，在他两次主持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始终是我十分敬重的师长和领导人。

他是1954年4月从广东调来担任人民出版社主要负责人的。他一到任就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当时全国都在学苏联，我社除出版马列著作、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外，大量出版的都是苏联的书。甚至把苏联大百科全书当宝贝，而本国的学术著作却出得极少。在他和社里其他领导的主持下，首先减少和停出了一批苏联书籍，同时

广泛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出版他们的学术著作，又重印一些有价值的旧著，改变了出书面貌。在当时紧跟苏联“一边倒”的大形势下，他这样做是要有相当的胆识的。

曾彦修组织专人调查了解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重要的社会科学著作的出版情况。列出了5000种书，编印成一本备查的目录，准备陆续选译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出版。遗憾的是他很快被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打倒，出书计划随之中断。

曾彦修被重新请回人民出版社担任总编辑主持工作，是1979年8月。次年，在他的倡议和于光远、陈翰伯、王惠德的支持下，发动全国25家出版社一起，根据选定的书目，出版了一批国外有影响的政治学术著作，定名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谁知到了1984年年初，全国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动，胡乔木把这套书作为自由化倾向的实例，予以严厉批评。

针对胡的批评，曾彦修写了近3万字的《申诉书》，对胡乔木做了有理有据的反驳，有些语言相当尖锐。他把《申诉书》寄给了胡乔木本人，也寄给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听说胡乔木看了以后，基本接受了曾彦修的意见，给社里写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但这封信没有正式发下来，这件事不了了之。曾彦修说：《申诉书》我花的力量很大，将近3万字。认错，不可能，因为事情是你搞错了。难道我也跟着说，布哈林等都是帝国主义的间谍，都应该杀，杀得很对？不可能。我是被逼上了梁山，除此别无他法！曾彦修永远是曾彦修。

他的名字将成为一种象征

杜 高

曾彦修先生崇高的政治人格将成为一种象征，永远留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残酷年代里，勇敢地牺牲自己，无私地救助无辜者，就像希腊悲剧中的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一样，他是一位现代的悲剧英雄。在他的身上闪亮着一种人性的美，体现着一种高洁的道德精神。所以他将不朽。

曾先生是公认的当代杂文大家，成就是杰出的。除此之外，他还是最早研究苏联斯大林专制主义的学者之一。还在延安，当人们都在专心研读《联共（布）党史》的年代，他就广泛收集有关苏联政治生活的资料，关注苏联的动态，几十年不间断。他不懂俄语，但奇迹般地成为苏联政治体制和苏联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专家。当人们还沉迷于“苏联天堂”的梦幻中时，他却已经看到了这个体制的弊端，并且预见了“天堂”的垮塌。他写了许多篇精辟的杂文，先是收集在《半杯水集》（200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里，后来又集中编印了《天堂往事略》上下两册。他对《莫洛托夫访谈录》的研究和批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摆脱苏联模式更有现实意义。

曾老是崇敬鲁迅的。当知识界出现了一股否定鲁迅的浪潮，他呼吁继承鲁迅精神。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精心编录的《鲁迅嘉言录》一书。他认为“国民性的改造”是鲁迅前期思想的精华，是今人研究和学习鲁迅的最重要的课题。

今年1月4日，我最后一次看望曾老时，他很有兴趣地向我询问习近平同志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他说从报刊上读了一些文章，习近平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我们要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曾老说，这段话很好，很重要，如果他真是这么讲的，这就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了明显的进步。我当时就感到，曾老对中国文艺的命运，比许多文艺工作者思考得更深刻。■

（本组文章系杜明明采编）

本刊启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刊的实际情况，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将作品的数字化处理权、网络传播权、电子发行权、无线增值业务权授予本刊，同意本刊将以上权利转授予与本刊合作的第三方使用，稿件采用后即自动获得上述授权。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酬。如作者对上述处理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

有关鲁迅争论我见

○ 曾彦修

一、鲁迅思想究竟是前期重要还是后期重要

在我零星看见过的近若干年研究和评论鲁迅的文章中，以及之前抗日战争时期对鲁迅的评价文章中，一般都着重在歌颂鲁迅思想的后期，即1927年后的思想，也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对南京中央专制政府的思想。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对鲁迅的极高评价，是："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仔细揣摩上面这段话，似乎是前后期并重的，但因有"民族英雄"这四个字，一般均认为是指对外斗争。

但是，就在同一本书上，毛泽东又讲了这么一段话："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重点显然又是指的1919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指的是1927年以前的十年的文化思想革命的。

毛的这两段话有点平分秋色，我们不应该只看见毛歌颂鲁迅反帝的这一个方面。但是现在有些意见正是只看见这一个方面，所以我不得不如此引用了。

在我看来，鲁迅在中国的思想启蒙方面，是要大大高于反帝方面的作用和价值的。强调反帝的，早已不是鲁迅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了；而强调思想启蒙，水平也超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在中国却只有一个，这就是鲁迅。

我是一直坚持鲁迅在中国的思想启蒙作用方面，前期（即1918—1927年）大大超过后期（1928—1936年）。鲁迅对中国最伟大的贡献，也是前期要大大超过后期的。

我在2012年5月的拙编《鲁迅嘉言录》（2013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献词》中说："鲁迅的伟大是在中国宣扬了'人'，而不是'阶级斗争'，这才是历史的真相。"又说过这样一些话：新中国

（上接第20页）州，没有工作，只能偶尔到上海探望女儿。聂昌颐促成徐盼秋去看望了这位自己的昔日院长，帮助恩师得到平反。盛振为担任华政顾问，晚年有了保障。这是身为东吴学生的聂昌颐最为安慰的一件事。

王慕曾的亡灵也在平反潮流中得到了公道。根据徐家俊的走访调查，王慕曾被承认为起义人士，撤销新中国成立时的判决，补偿家属几万元。

部分的"平反"在镇反后数年已经开始。上海档案馆藏1957年4月发布的《上海市委关于检查镇反、肃反工作的指示》显示，上海市从1956年8月下旬开始对1952年宪法颁布后的镇反工作复查，共检查415000余件，初步发现冤案、错案和可捕可不捕三类案件6941件，改判2919件，释放1821人。这份《指示》称，判决正确或基本正确（包括畸轻畸重或定罪不当）的比率为80%。

这次检查并没有包括宪法颁布前的申诉案件，仅这类申诉案件就达14万9000余件。随着不久后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些申诉案件失去了被清理的机会。■

（作者为《博客天下》杂志前主笔）

（责任编辑　冯立三）

成立后几十年，我们只是把鲁迅作为一个服从“阶级斗争”需要的工具来使用的，这就越来越降低了鲁迅的历史作用。从根本上说，鲁迅应该是一个与民族命运及广大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伟大启蒙思想家。

曾彦修遗像

我在那里还说过：研究鲁迅的思想，究竟是前期重要，还是后期更重要呢？这就是说究竟把鲁迅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的发现者、勇猛的“启蒙思想家”重要呢，还是后期的作家领袖、左翼文学家的精神领袖更重要？两者似乎难分伯仲。但我们如果从实际出发，从三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局出发，从已过去的八九十年的历史看，对中国文化及民族性格的改善、民族素质的提高来看，那就恐怕还是前期的鲁迅即“启蒙思想家”的鲁迅，比后期重要得太多了。因为前期达到鲁迅思想那样深度、水平的思想家只有鲁迅一个人，而后期能够追上鲁迅思想深度的人却不少：矛头转向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革命家很多。

我现在仍坚持上述的这个观点：鲁迅想治根本。今天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民族素质的提高，是太落后于经济的提高了。当然，国民性的改善即民族素质的提高，是不可能以每年增加多少百分比来计算的，但总要能逐渐地有所改善、提高才好。

我以为是：“国民素质+生产力”决定一切。而不是单纯的生产力决定一切。一个国家的国力总和就是“国民素质+生产力”，而绝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多少。

二、鲁迅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或“逆向民族主义”者吗？

近若干年，又看见一些文章说鲁迅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或“逆向民族主义”者。后者的含义当然比前者还要严重得多。照此说法，鲁迅就连常说的“爱国主义”者也不够资格了。“逆向民族主义”是容易理解的，毋须多说。至于什么叫“民族虚无主义”，我还是得引用专家们说的话来解释，这是个专门问题，不得不如此。

关于“虚无主义”，流行的《辞海》上面说：

“虚无主义。……现在虚无主义一词通常指不加分析的全盘否定人类遗产，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一切的态度或思想倾向。有时也指没落阶级掩饰的颓废思想。”（下册，第5257页）

什么是“民族虚无主义”呢？上述辞书也有专条说：

“民族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其内容有：认为民族是虚无的概念，宣布民族性为无稽之谈。一切民族特征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偏见，蔑视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等。”（同上书，下册，第5125页）

至于所谓“逆向民族主义”，是新起的名词，尚未见有具体的解释，但顾名思义，这是比“民族虚无主义”还要严重得多的。

鲁迅是不是“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民族主义”呢？我以为，恐怕不能这么说。鲁迅处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看见国家危亡的可怕形势，又看见民族风气对此又无多大的抵抗能力，深觉国家危亡是旦夕间事，遂愤而反求诸己，集中在自己内部去找原因。因为外国要来侵略，是劝不了也止不住的，只有使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才能抵抗外来的侵略。在这个根本动机上，鲁迅才把笔锋多指向本民族自身的缺点和病痛。这样，他就集中来寻找并攻击本民族的弱点了。这在一定意义上讲，鲁迅是先集中查内因，一点也不能说是错误。鲁迅集中攻击的，是本民族的缺点、毛病，这正是中国两千年留下的古训：“人必自侮也，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也，然后人伐之”，先必自强然后才可以抵御外侮。这有什么错误呢？

鲁迅当时当然还是个唯心主义者，所以他并没有从经济、政治制度上去找原因，而是集中在“国民性”的弱点，即民意不振这个方面去找原因。说鲁迅有些片面性或许是可以的，但要说他是“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民族主义”，恐怕就太离谱了。如是后者，鲁迅还起来“呐喊”做什么？

呐喊就是要唤起民众，起来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不要再沉睡下去了。

难道中国的国民性真没有很多弱点吗？那是虚骄，不符合事实，一个文革不就把这件大事完全暴露出来了吗？

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如果是抱“虚无”以至于“逆向”的态度，他还指出你的这个毛病那个毛病做什么呢？这正像一个人不会去对一朵即将完全凋谢的残花议论它这不美那不美一样。

鲁迅直陈中国国民性有很多缺点的目的，正是为了国家民族的起死回生，他在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随感录》上就说的很清楚：

“现在很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去。”

就这么简单的两句话，鲁迅就把他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内心完全袒露出来了，这哪里有什么“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民族主义”的痕迹呢？

鲁迅对当时国民性的弱点，讲得如此深刻，如此沉重，因为他是一个最自觉、最真切、最深沉的爱国者，也就是沈钧儒老人题写的“民族魂”三个字的真正担当者。

鲁迅对国民性的弱点的沉痛指陈，根本上是：爱之深所以责之切，惧其死所以伐其根。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鲁迅的真相。

三、鲁迅后期是否有过“过左”错误的问题

这个重大问题，可以说是毕克官先生最先提出来的，题为《盟主也是左的》（《炎黄春秋》2014年第4期）。毕说的“左”，用的是“极左”。我在下面将不再采用“极左”这个词，因为这是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尚未判决时的特殊用语，不能到处套用。因此，我仍用一贯的“左倾错误”一词，以免混淆界限。

我在此题中有两个方面的意思要说明：一是20年代末期起鲁迅支持及鲁迅发出的各种重大的文艺批判是否均是正确的，二是1936年鲁迅与“国防文学”的论争问题。

本节谈1936年前的问题。

1936年以前，左联及鲁迅本人对各种与自己不同的文学作者和流派进行了多样的尖锐斗争，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就毕克官文提出的是以下三种（实为四种）。

第一个方面叫“鲁迅与新月派的争论”，第二个方面叫“与第三种人的争论”，第三个方面叫与“《论语》派林语堂的争论”。其实该文还提出了一个对丰子恺的严厉批判，实际上是四派。

毕先生认为这些批判都是错误的，并讲了些简短意见。

鲁迅及左联究竟批判了哪些人，哪些流派，我不清楚，我相信毕先生说的均是有的。因为这些事情都听说过，很有名。

其中如鲁迅对梁实秋的批判，文题即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太不像话了，不入流的，纯是人格侮辱，此题目真可以得全球骂人金球奖，但它确是鲁迅写的，有点叫人不敢相信。鲁迅训过左联人士，题目即叫《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但鲁迅自己的这篇骂人题目的不良性，却远胜过其他任何人，这是今天谁也否认不了的。这个题目对梁实秋并无任何损失，但对鲁迅却是很大的损伤。

左联时期的各种对外部的文学批评（首先是鲁迅作的文学批评），张闻天认为都是过分的，并不正确的。这就是张闻天以哥特为笔名写的一篇《文艺上的关门主义》论文，提出当时左联批判的各种文艺观点的批判本身就是“非常错误的”“关门主义”，指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同时还指出“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也还是这类文学的范畴”。张闻天本人在此事不久前自己也曾写过反对各种政治倾向的派别与人物，即打倒一切的文章，但张冷静，有思想，一看，是自己错了，所以不久之后，即在1932年的最后两三个月，在他交代了工作准备去江西红色区域的空档时间，他看了很多文艺杂志等，他发现左联诸人发出的对外批评都是过左的，因此，便以“哥特”为笔名写下了这篇名垂青史的《文艺上的关门主义》。这篇中等长度的批评文字，发表在当时党中央的机关杂志《斗争》上。此文经张闻天文集编选组近现代史专家程中原先生百般考证，已铁定作者即是张闻天。此事当即报知了胡乔木，胡也完全肯定了程中原的这个考证，并指出可惜此文在实际上并未起什么作用。

但，总算幸运，当时就有人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指出了这个根本问题。这里当然就包含了对鲁迅的批评。

再以左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而论，当时是否正确呢？显然并不正确。

1930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9月2日正式开会成立，鲁迅到场并讲了话。那天，到场共40余人，我看到场名单，除了几个人党籍我不明外，都是共产党员，其实，这与共产党的党内组织并无多大区别。1937年抗战后，在延安听一些老同志说，当时在左联他觉得不过是“第二党”而已，还是党的组织。在左联先后任过党团书记的是：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戴平万。

左联提出的创作口号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该说，这个口号根本上就是不对的，它比苏联当时还左得多。现在猜想，这口号可能是受当时美国和日本左翼文学的影响而提出的，因为当时他们是用“无产阶级文学”口号来代表他们写工人阶级的痛苦和斗争的。

其实，苏联也没有过这个口号。它们是在1934年春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才由日丹诺夫正式定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名字的。

中国在1930年左联成立时就定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口号，显然是太左了，太极端了。而鲁迅恰恰是这个最极端口号的最极端的维护者。鲁迅1931年为外国刊物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说：“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除此之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的文艺。”这话说得很绝，很极端，并且完全不顾事实。现在还可能有人认为这是鲁迅彻底革命的精神。但，实际上这正是鲁迅当时过左，目中无任何一个同盟者、同路人的彻底孤立自己的表现。鲁迅在这里提出的榜样，是一个极端孤立自己的一个极不好的榜样，左联要说有“左”的错误，把鲁迅完全撇开，怎么说得过去呢？

多年来，有批评说，1935年左联解散时无声无息，近于溃败。这批评恐怕也未见得对。我以为解散只能无声无息，难道还要到《申报》上去登个启事吗？但解散前没有与鲁迅等有关同志商量，恐怕确有错误。没有先征得鲁迅的同意，把旗帜丢在一旁不顾，这确实是一个不能令人原谅的错误。此点，我以为周扬、夏衍等四位同志1935年为了劝说鲁迅谨防胡风，可以去面谒鲁迅，但在解散左联时，却不先同鲁迅商量，这个错误确是原则性的。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革命先辈们的事情，我们今天只有为他们惋惜而已。

四、大分歧——“国防文学”口号的产生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及1932年后的华北危机及“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提出了。

日本要全面亡华的决心与具体步骤，都是十分明白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了我东北三省以至热河全境。1934年又强迫南京国民政府与之订立了《何梅协定》，把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又完全“特殊化”。南京在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党、政、军、警、宪、特势力均需全部撤离华北或解散。这样，冀、晋两省及平津两市又渐渐要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了。日军下一步就是长江中下游省份也要特殊化，直抄南京中央政府的老窝了。当时情况紧急，国家已处于危如累卵之境，于是在1935年12月9日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在此运动之前，上海市的救亡运动也已经大大地兴起了。这突出地表现在紧接“一二·九”之后，上海有几个“救国会”相继成立。

1935年12月27日——上海市文化界救国会成立。

1936年1月28日——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1936年5月1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此会的第一名执委委员就是宋庆龄。（钱俊瑞是全救党团书记）

这三个救国会都是在当时与党失去联系的上海地下党员们相继领导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对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怎么能说他们无功呢？

与此同时，国际上传来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号召，也成为对上海地下党的有力的推动力。1935年7、8月时，斯大林做了极其正确的一个决定，

他决定召开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要转变全世界一切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改为要联合国内的所有阶级力量,一致起来进行反法西斯侵略或直接危害本国、本地区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共产国际的这次代表大会上,由刚出希特勒监狱不久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做了总报告,下面有三个重点发言,等于副报告,讲得更清楚明白了。第一个是德共总书记皮克讲的,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第二个是意共总书记爱尔科里做的《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第三个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做的《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即解释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均必须转变任务,转变策略,集中国内的一切力量,建立针对危害本国最大的敌人的联合战线,停止内争,集中力量,一致对外。(这四个报告,在莫斯科均印有中译本64开本的特小册,我在抗战初期在延安均全部读过)

此后,与中共中央已失去电报联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抗日救国的联合宣言,因发表于1935年8月1日,史称"八一宣言"。

宣言中提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提出了,要实行"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的出专门技能"的口号,这就是不分阶级的全民抗战了。

宣言的后半部更详细地提出了组织全国的"国防政府"任务,并提出了中共领导的红色区域愿意成为"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

1935年冬,红军长征到陕北落脚后,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已经派回了信使,"八一宣言"也带回来了。

冯雪峰是由在陕北的党中央派回上海去执行此项新方针的第一人。(但冯并不同意这一方针。此事说来话长,此文只好略去)

五、在"国防文学"提出半年以后,以鲁迅名义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国防文学"这个词,没有多大科学性,据说起源于周立波对苏军中流行的一个名词的误译。而且,这个词又官味十足。不过,当时的南京中央政权,是对"国防文学"这类的话也不敢公开说的。因为,一说了日本侵略者就要向南京中央政府问罪:你们为什么要破坏日中亲善?在这种环境下,当时大家都心里有数,就自然而然地把这四个字解释成为"抗日救亡"的大联合了。

所以,在实质上,这个有点莫名其妙的口号,大家都理解为就是抗日救国的大联合。对它的理解并不存有任何分歧之处。但是,胡风忽然在6月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叫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此文注明写成于"5月9日晨5时",距冯雪峰抵沪后13天。

胡风在他的文章中,一字未提及之前已普及全国近半年的"国防文学",却说:"在这个历史阶段……能够描写这个文学本身的性质的应该是一个新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里明明说的"应该是"一个"新口号",要以此代替久已通行全国的"国防文学"的号召的"旧口号"已是十分明白的了。胡风解释说: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该说明劳动者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说明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谁是组织者,谁是克敌的主要力量,谁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民族奸细。"(见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口号争论选编资料》上册,2014年,第215页)

当时,中共中央要组织的是:除了汉奸之外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并不忙于要把自己解释为"克敌的主要力量"。因为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之下,硬要如此强调,就不能不是一种很奇特的关门主义了——那时的情况首先是共产党能不能被承认加入这个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不是共产党允许谁加入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

胡风此文尽管口气很大,但由于"国防文学"这一并不确切的口号通行全国已久,因此,这个新口号并未引起人们的什么注意。当然也有些同伴欢呼此口号,但在社会上终究未起到什么作用。(按:这个口号十一个字,其中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真义究竟是什么,也无人能懂,所以也根本未传开)

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神圣在什么地方?

这篇文章,长期被当成《圣经》一样,是鲁迅

收篇的、光耀史册的伟大经典。鲁迅写于1936年8月3日至6日，发表于同年8月15日的《作家》1卷5号，文章是鲁迅具名的，当然应由鲁迅负责。

这篇整整占十三书页的巨文，中间无任何小标题，难懂之至。这回我下定决心，再啃它无数遍，终于算是弄清楚了一点：此文内容实际上是由三个大部分构成的，总的形式像个“小”字，其中有两个部分并不重要。

第一部分，是痛骂徐懋庸的。这只是本文的一个由头，不引用了。但其中有一句十分奇怪的话：“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吗？”请问：老左联的那些领导人，即周扬、夏衍等“他们”的“基本政策”就是要“咬鲁迅几口吗”？敌我全颠倒了。这叫对同一阵营的论战吗？

此文的第三个部分，是鲁迅为几个友人的辩护，包括巴金、黄源、胡风等。因徐懋庸去信中诋毁这几个人是太不应该了。这一部分也不重要，具体小事而已。

最重要的是中间的绝大部分：鲁迅文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同上书，第533页）”。这是太上皇的口气，并未讲道理。鲁迅何时来过这种作风？“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允许个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上你们（你们——口气怪不怪，鲁迅同原左翼人士似乎已明确是敌我两方了）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册过。”（同上书，第532页）。

“内部争论”争论到对方是属苏维埃政府还是南京政府方面的惊人的程度，已经全不可理解了，但鲁迅文中竟这么讲了，太离谱了！不仅此也，此信还存在着一个决不应有的身份安全的暴露问题。

信中说：“去年（按：1935年）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到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后的穆木天口中”。请问：这段话怎么可以公开呢？（而且这种事情要真拿凭据，是根本违反地下工作纪律的，这岂不是要把情报工作的一条线都完全公开出来吗？鲁迅应该知道的。）谈话的另两人是夏衍、阳翰笙。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人都做过左联的党内负责人，前后“四大天王”都一齐秘密地来，他们危险不危险？无非是告诉鲁迅这个“内部消息”，请你老人家小心一点而已。何罪之有？

另一个离奇的问题，是鲁迅在信中竟然几次公开提出，他提的令人记不得的那个十一个字的口号是同茅盾、胡风商量过的。在这场口号战中，茅盾始终低调，他的身份是鲁、郭、茅三鼎足，郭已表明勉强站在“国防文学”方面，茅自然明白鲁的倾向，如果他再公开表态，事情就僵了：鲁迅就被公开孤立了。茅盾持较谨慎态度，完全是为了照顾大局，茅盾还几次写文公开批评过周扬，说周扬对“国防文学”口号理解太狭。鲁迅在此文中说，“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鲁迅全集》16卷集，第6卷，第532页）。按鲁迅个性，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愿把他人扯出来的（此后茅盾对此事未说一字），但在这里却不知道为何改变了态度。鲁迅在这封经典巨信中，竟公开以自己之名怀疑周扬等人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说：“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这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是敌人所派遣。”这一大堆是鲁迅说的吗？叫人说什么好呢？

我还要提请读者特别注意，鲁迅在此文中明确说：“‘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这种文学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韩侍桁、杨邨人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鲁迅全集》16卷集，第6卷，第531页）

谜底鲁迅自己揭开了，那就是说，不管怎么宽，也宽不到你“第三种人”等那里去！这是鲁迅自己说的啊！这里，鲁迅哪里有一点自省的意识呢？这就是鲁迅明确宣布，他自20年代末以来的一切批判都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不包括这些人在内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只

有汉奸不包括在内,怎么能连文学上具有不同见解的人也不包括在内呢?

所有这些,都是约八十年前的真事,现在材料完整,并非考古学。我们不能为了无条件尊崇鲁迅,而把党在1937年抗日战争以前几年做的抗日大联合的工作,完全付之一炬。

七、鲁迅是经得起研究和批评的历史巨人

照以上说法,那么毛对鲁的多处评价又当做何看法呢?我以为,要尊重,认真地珍重,大都十分正确,但不能每个字照搬。

如果要一切依从毛,那么,从1937年鲁迅逝世一周年起,对鲁迅与孔子的关系,毛就做过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而又没说明丝毫理由。文革中期以后,毛一下又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坏最坏的人:批林批孔。那么鲁迅这个"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了呢?

毛对鲁迅的基本评价,我在本文开头已经引用过了毛的两处论断,我以为根本是正确的、杰出的,此处不重复了。

鲁迅第一个特点是思想家,哪有思想家的思想而不让人研究的呢?

研究鲁迅是寻常事,完全用不着胆战心惊地去进行。说鲁迅也曾犯过重大的错误,这无损于先生的日月之明,更不是说者就是反革命。

鲁迅的根本思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他根本上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什么叫改造中国的"国民性"?通俗地说,这就是要改造全中华民族每个人的"灵魂"。这个"灵魂"又是指什么呢?更通俗地说,这就是要彻底提高我们中华民族每个人的公私道德水平,权利与义务的认识水平。

这一任务是永远正确的、重大的。尤其不应忘却的是:他写的《狂人日记》是发表在:

1918年!

这是第一篇中国式的人权宣言!

它比"五四运动"还早一年!

鲁迅的根本思想是要改造中国人的灵魂!

"鲁迅是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永远有效!

这样的鲁迅,即使有点错误,谁又能撼动他的一根毫毛呢!

历史昭示我们:伟大的毛泽东的主要错误是左倾;伟大的鲁迅的主要错误也是左倾,这还不值得后人警惕嘛!

【附注】

一个特别令人不解的,是鲁迅逝世后的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公开发布的是: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三、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这中间有几件特别怪的事,例如,日本友好人士书商内山完造名列第二,在宋庆龄之上,太荒唐了!第四名是外国籍的史沫特莱女士,显然是以她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而非某外国左派的代表,但那时她在中国还并不怎么出名,这等于暴露了她的特殊身份。最令人奇怪而不可理解的是,中国作家的代表竟是唯一的胡风。虽说,名单中有萧三,但萧久在苏联,国内几无人知道他,显然是代表中共之意。虽说有茅盾,但他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名人,已不适于代表他之后出现的多批新进步作家。因此,名单中作为文学作家代表的,特别是30年代的代表人物,其实就只有胡风一人。但胡风当时在文学界就很孤立。胡风当然不是反革命,但无论在哪方面名声在当时都并不高,而且当时已是令文学创作界相当害怕的一根打人棍子,把他作为文学创作界的唯一代表,真是异想天开。(胡风真正成为一股特殊力量,是1938年在武汉创办《七月》杂志之后)从这张名单也可以看出,抗日战争前的一年多上海进步文学界是处在一种什么奇怪的状态中。

事情已经过去快八十年,难道现在还不可以冷静地回顾一下史实吗?难道这一切怪事都是周扬、夏衍或多少条汉子挑起的吗?他们有这个权力吗?他们已经靠边站了。这张名单难道是请示过陕北的吗?毛、周、张会同意把一个日本友好书商放在宋庆龄之上吗?太不可思议了!

写于2014年5月至2015年1月■

(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

(责任编辑　冯立三)

冤案是怎样酿成的

○　尹曙生

1962年9月，公安部编印了“党内干部教材”《毛泽东同志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黄皮书。笔者喜得一本，很开心。50多年来我一直把它作为案头书之一，不知阅读过多少遍，有些条文背得滚瓜烂熟，可以信手拈来。不过不同时期阅读这本书，有不同的感受。初读时，对领袖指示在对敌斗争中一定要防止冤假错案的谆谆教导，感到特别亲切，言犹在耳，毫不怀疑其真情实意。例如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关于镇反工作的一个批语》中说：“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195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肃反工作的方针”中，用对仗、排比的句子，简明、扼要、精粹、易记的语言说道：“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据公安部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位老领导（负责会议安全保卫工作）告诉我，当年毛主席讲到这句话时，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人员都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是真诚的，得到了真诚的响应与拥护。1962年我读到这句话时，也是热血沸腾，感到领袖真的是英明伟大。可是放下书本，我又发现毛泽东讲的和当时的现实情况对比，差距实在太大，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从1958年到1961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公安、政法机关逮捕、拘留、判刑几百万人，很多人是被冤枉而投入监狱的。全国的监狱人满为患，不得不在大西北广建劳改农场（工厂），其中在青海就新建15座大型劳改农场（工厂），先后有28万多名犯人从内地送到青海劳改。在大跃进运动中，公检法机关干部、党政干部，公社、生产大队甚至生产队干部都有捕人、拘留人和劳教、集训别人的权力。安徽、山东、河南、甘肃、青海等省的情况特别严重，以致1961年以后，中央不得不对这几个省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对这几个省的公检法机关大力进行整顿，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公安部调到青海省公安厅，从事接待来信来访、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冤假错案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在《公安工作大跃进》（见2010年《炎黄春秋》杂志第1期）及以后的一系列文章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人民群众在大跃进年代所受到的苦难，和领袖信誓旦旦的言论比较，有天壤之别。当时我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党政领导和政法机关没有认真执行领袖的教导，违法乱纪产生的。可是以后的公安工作实践告诉我，情况没有那么简单。1962年以后，冤假错案并没有减少多少；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制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大悲剧，酿成了占中国人口1/9、近1亿人的大冤案。

50多年来，我经常翻阅这本黄皮书，思考为什么实际情况和毛泽东的要求完全相反。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呢？当年参加最高国务会议聆听毛泽东讲话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国务委员们，发自内心拥护毛泽东的讲话，热烈掌声就是证明。可是两年以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有的被抓进监狱；到1976年除个别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受到冲击，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被整死。党内的国务委员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党内历次政治斗争中，不少人先后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内奸；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内元老。至于普通老百姓更是惨不忍睹，死伤无数，冤狱遍中华。让我们来看看党史、国史是怎样记载的：

1986年新华社播发的《党史纪实：平反冤假错案》一文中这样说道：“文化革命的十年，造成

了大量冤假错案，据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全国脱产干部约1800万人中，被立案审查的竟占17%。其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竟高达这类干部总数75%。此外，解放军系统有8万多人受诬陷，1100多人被迫害致死……教育部仅在17个省所属单位，就有142万余人受诬陷。中国科学院仅在17个省所属单位有5万多人受诬陷，等等。再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农民）和他们亲属中受波及者，大约有近一亿人口需要平反冤假错案，以求在政治上、精神上得到解放……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系指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5年时间——笔者），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数以千万计的干部和无辜受牵连的群众得到解脱。”

上述引用的《党史纪实：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完全印证了叶剑英元帅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内容。叶帅说：“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人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见《叶剑英文集》）

文革十年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那么文革前呢？同样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镇反、肃反、反右派、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无不以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收场。仅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就平反纠正了42万余起文革前的冤假错案；辽宁省平反了50余万起文革前冤假错案。胡风一案2100多人被冤枉，几万人受牵连。反右派斗争中50多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几百万人受牵连。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公安机关逮捕、拘留了300多万人，绝大多数是无辜的人民群众。大跃进运动中从县到公社、生产大队办的劳教队、集训队、收容所遍布全国城乡，被处罚的人无法统计，有很多人死在这些场所，而他们还不在平反冤假错案之列。1949年后，全国先后被划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人数有2000多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家庭成分不好、出身不好，没有现行破坏活动（有破坏活动的在土改、镇反中被镇压或判刑），可是一直作为专政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反面教员、打击处理对象，被饿死、整死无数，到文革结束时，只剩下517万余人，1984年才全部摘掉帽子。在长达35年中，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亲属、子女受到株连，是另类人口，正常的权利被剥夺，却要尽不应该尽的无穷的义务。他们及其亲属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贱民”。同样，他们都不在平反冤假错案之列。

50年后再读这本黄皮书，我反复思考认为，在毛泽东领导中国的27年中，出现了那么多冤假错案，这未必是他的初衷，但确实是他之所为。他在治理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国土面积第二的大国，不是依靠法律，依法治国，而是迷信自己的英明伟大，把自己当作救世主，把自己的话当成金科玉律，要人们按照他的话去想、去做、去行动，否则你就得倒霉，被打入另册，甚至丢掉性命，是不折不扣的人治，连法治的影子也没有。到了文革时期，更是蔑视一切法律和权威，得意地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时候治理国家靠的就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和中央及时发布的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但确实是铁的事实：在他领导中国的近30年中，只颁布了3部法律：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30年的漫长岁月中，没有一部刑事法律、民事法律，更没有刑事、民事诉讼法律，可是却判决杀了几百万人，逮捕、拘留了几千万人，处理了数不清的民事纠纷，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他的指示和反映他的意志的中共中央文件。那么多冤假错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炼”成的。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以史为鉴，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新时期我们党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伟大意义，更加自觉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废除民国时期制定的“六法全书”。这样，共产党在接管全国政权后，就面临着在没有任何法律的情况下，

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毛泽东是不相信法律的，他也不急于制定法律。他始终认为法律束缚人们的手脚，欣慰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得意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他迫于国际、国内压力主持制定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认真执行过，也不准备执行。宪法通过仅仅一年，文学家胡风因为上书中央对文艺工作方针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就把他和别人的通信公之于众，亲自撰写“按语”刊登于《人民日报》，把胡风以及和他通信的2100余人，统统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大多数人被投进监狱。他写的“按语”就成了刑事法律，成了给胡风等人定罪量刑的依据，违反了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这一条，是严重的违宪行为。1956年11月27日，罗瑞卿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言时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勉强一点，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还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连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都认为把胡风一案定为反革命集团是勉强的，可是谁也不敢提不同意见、不按照毛的意见办。1957年毛泽东先是号召人们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党提意见。那些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却被他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其法律依据就是他撰写的《这是为什么？》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等几篇《人民日报》社论、评论文章。他写的文章就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法律依据。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等于一纸空文。

在没有任何法律的情况下，毛泽东依靠什么治理国家呢？归纳起来，他依靠三种办法治理国家。而这三种办法都是人治的办法，是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

一是在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运动中(在他领导时期，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一直进行着，没有真正停止过)，毛泽东继承、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直接凭借暴力而无须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的理论，迷信暴力、相信暴力，而不相信法律。暴力对于推翻一个旧世界，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只能依靠法律。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规划了全国解放后的施政纲领。全文充满了无产阶级暴力论，没有一个字提到依靠法律手段来对待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这是他的真实想法，绝不是他的一个疏忽。全文充满霸气和戾气：“‘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如何取缔？如何制裁？那就是暴力！“‘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绝不施仁政，就是杀、关、管！毛泽东相信暴力、迷信暴力，认为暴力能解决一切问题。他在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仍然采用革命战争年代打仗的办法、暴力的办法，不断地指示某省、某市在某一定时间内必须要杀、关、管多少人，就像指挥一场战役一样。从1950年10月开始至1953年结束的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国逮捕了300多万人、杀了70多万人(有的说100多万人)，却没有任何刑事法律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和标准，没有任何诉讼程序，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随心所欲。虽然政务院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那只不过是个行政法规，不是刑事法律，没有任何诉讼程序，都是一些原则规定，很难掌握。整个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按照他的162次批示、电报和几个根据他的意见下发的中共中央文件，包括他亲自撰写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他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中央文件)，主观臆断，给各级

人民日報

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

響應斯大林維護和平的號召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党委下达镇反中杀、关、管的具体指标、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时间(见《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用什么标准来杀、关、管呢？在中央文件和他的批示、电报中,都是些很笼统的概念,很难掌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规定对什么人应该判处死刑,往往是“罪恶严重,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横行乡里的东霸天、西霸天”;“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害者”。这样原则的规定,教人如何判定一个人该杀不该杀呢？为了完成领袖规定的在一定时期的杀人指标,原来认为不该杀的变成该杀的。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的1951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在饶漱石的领导下,对捕、杀人是很小心谨慎的,当时只逮捕了2万余人,杀了200余人。毛泽东很不满意,致电上海市委:“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上海市委不敢违抗,上报中央说市委决心“再放手逮捕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毛泽东立即通报表扬,规定上海以后每隔几天就杀一批。上海市委认真贯彻执行,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没有辜负领袖的期望。上海最后以杀7000余人结束第一次镇反。大大超过领袖的预期。

1951年3月24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做镇压反革命的动员报告

二是在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把党规、党纪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说过:党的决议就是法,党委开会决定的事项就是法律,必须执行。党的决议可以定性某些人是反党集团成员,某人是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内奸、蜕化变质分子、贪污分子等等十几个罪名,无须司法机关确认、审判,就成为专政对象,把一个政党的纪律、条例,变成了国家法律。在毛泽东领导中国的27年中,党内斗争不断,在中央一级比较大的斗争有: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案,1959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机会主义反党联盟案,1962年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联盟案,1965年底罗瑞卿反党篡军案,1966年初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案,1968年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案。经中央批准的各省(市)委和各部委及其下属单位党委批准的这类案件更是层出不穷。一个案件受株连的人数往往达到几百、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的统计,因刘少奇一案而被株连错判的案件就有22057件,受到刑事处分的28000余人,其他被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不计其数。1967年夏天至1969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挖出了一个所谓“内人党”案件,有346220人被关押受审,被整死的有16222人,被整而残废的多达87180人。1959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机会主义反党联盟案,全国有300万人受株连。从中央到地方这些党内斗争中被关押、审查的人,大多数没有经过司法机关立案审查、批捕、起诉。个别的虽然经法院审判,也只是根据中央和地方党委决定,法院办个法律审判手续而已。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身为国家主席,要撤销他的职务,按照宪法规定,必须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可对刘少奇一案,居然从来没有立过案,本人更没有被告知立案审查,没有被提审过,没有向本人核实过材料,却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将他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而他自己却不知道。直到20多天后的1968年11月24日,他70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才被告知自己已经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选择这样的时机告诉他真相,是大有用意的,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生命垂危,生活不能自理,已经没有为自己辩解的能力和机会

了，残酷无情，令人发指。像刘少奇案件这样奇特的处理方式，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也没有发生过。

经毛泽东亲自下令逮捕的潘汉年，起初是因为他在1954年4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响应领袖的号召，主动交代抗战时期和汪精卫会面情况而引起的。随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案件的发展，他被列入反党联盟成员。8年过去了，原来指控他的三大罪状（和国民党特务勾结、和汪精卫见面的内奸；高、饶反党联盟成员；上海解放后重用敌特，为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上海指示目标）都不能成立。但是毛泽东不改初衷，仍然认为他是坏人。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这段话说得很明白：潘汉年是有罪的，必须判刑，但是不杀他，表示自己慈悲为怀。实则，经过专案人员8年审查，除会见汪精卫没有向中央报告违反党纪外，其他罪名都不能成立。可这是钦定的案件，谁敢放他？于是1962年6月中央指示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最高人民法院指派刑事审判庭庭长曾汉周（审判林彪、四人帮时，他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庭副庭长）、刑事审判庭组长丁汾和助理审判员彭树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丁汾和彭树华到秦城监狱看了一个多月案卷材料，感到指控的罪名证据不足，难以定罪，需要向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汇报。中央交办的这样重大的案件，党组理应听取汇报。可是以谢觉哉为党组书记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十分清楚这是毛泽东、中央交办的不容讨论的案件，汇报有何用？于是由副院长吴德锋个人单独听汇报。吴德锋对汇报的人说：我说的话，你们不要记录。尽管汇报的人说指控潘汉年罪行的证据不足，难以定案，吴德锋听了以后仍然说：“对潘汉年案我不想说什么，中央（实指毛泽东）既然对他的问题定了案，我们对中央的决定只有坚信不疑，认真做好审判工作，完成中央交办的审判任务。”由于办案人员想不通，证据不足为什么还要判刑？于是院长谢觉哉在自己办公室听一次汇报，以示重视，同样不准记录、不准别人参加。汇报完毕，谢觉哉说：“潘汉年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斩钉截铁，何等痛快！为了安慰办案人员的辛劳，谢老引用王勃《滕王阁序》里的两句话：“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引用这两句话是想告诉汇报人员，贾谊被贬到长沙，并不是圣上不英明，而是听信了谗言；梁鸿、孟光隐居海曲，不是朝廷不好，而是坏人当道，不愿同流合污。谢老还对他们说：岳飞以叛国罪被杀，谁都知道是冤枉的，但是当时宋高宗一心想和金人媾和，而主张坚决抗金的岳飞是在劫难逃，谁也救不了他。（详见彭树华《潘汉年案审判经历》一文）。谢觉哉是党内元老，文化功底深厚，熟悉法律；吴德锋是革命家、法学家。他们深知潘汉年是冤枉的，但是无能为力替他昭雪，只好照判。审判进行得很顺利，因为事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在提审潘汉年时就明确告诉过他：只要你认罪，判刑后马上释放，不必坐牢，还可以得到良好待遇。潘汉年深知如不认罪就会老死、病死或被整死在监狱，只好认罪。1963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中央为了审判潘汉年可谓煞费苦心：由中央组织部提名，经周恩来批准，中央机关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00人旁听审判。判决书也是事先写好，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中央主要领导人画圈同意后定稿。宣判一个月后，潘汉年就被释放，和夫人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团河农场一幢单独院落里，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可以雇保姆，可以在自家小院种菜、钓鱼，星期天还可以进北京城购物、会见友人。对一个判了15年有期徒刑的犯人，给予这样优厚的待遇，反映了主宰潘汉年命运的当政者，明知自己错了，也不愿意改正，只好用这种办法加以弥补。毛泽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话，只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已。文革中潘汉年再次被逮捕、判无期徒刑，最后被整死在湖南的劳改农场，这只能被理解为杀人灭口行为，卑鄙至极！潘汉年于四人帮被粉碎后平反。审判员丁汾晚年回顾审判潘汉年一案，感慨地说：“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半生从事审判工作，一向谨慎，最怕判错案子，冤枉好人。这辈子记不清办了多少案件，扪心自问还是个称职的审判员，唯独潘汉年案做了违心审判，一世清名，毁于潘汉年一案，自己都不能原谅

自己。”

三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用群众专政模式，代替司法机关办案，无法无天发挥到极致，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运动被定性为一场内乱。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踢开党委闹革命，蔑视一切法律和权威，整个党、政机关全面瘫痪，任由造反派胡作非为，他们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毫无顾忌，打、砸、抢、抄、抓，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为了清除造反派夺权障碍，经过毛泽东同意，将公检法机关彻底砸烂，在军事管制下，实行群众专政。为了给群众专政提供执法依据，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为其内容一共有六条，故简称“公安六条”。这一法规性文件的出台，没有法定的、规范性的立法程序，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临时性的规范性文件，本来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下，它却作为刑事法律，适用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如果说它是法律的话，那它就是一部影响深远、造成文化大革命中无数冤假错案的一部恶法。

“公安六条”中的核心内容有两条。最主要的是第二条和第四条。

“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一条是“公安六条”的核心，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固定化、制度化、法律化。从此，“恶毒攻击”这一罪名将数百万对文化大革命稍有不满、发点牢骚的人都泛化为“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无数仁人志士被冤杀，像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石仁祥等等。“恶毒攻击”罪在使用过程中又被泛化为攻击中央文革成员的也都是反革命行为；后来对攻击各级领导人也都被视为反革命。据公安部1973年统计，从1967年到1973年，在全国发生的314万余起反革命案件中，“恶毒攻击”案件占85%，其中攻击江青的又占到其中的27%。喊错口号，写错标语，贴错地方，坐在印有领袖像的报纸、杂志上，不小心将领袖像章弄脏、弄破、丢失等等，都是反革命行为，都要受到严厉惩处。根据“公安六条”，在1970年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有15万人因言获罪被枪毙。

“公安六条”第四条规定是界定专政对象的。它把专政对象无限扩大化、株连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该条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活动，要依法严办。”这一条规定的21类群众专政对象，为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打三反运动提供活靶子，为群众专政滥捕、滥杀、非法关押、打击迫害无辜人民群众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就有了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等地的野蛮、血腥屠杀“阶级敌人”的法西斯暴行的发生；于是就有了1967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北京有33695户专政对象被公开抄家、抢劫，有85196人被扫地出门，赶出北京城；全国有40万城市居民被强制遣返农村；于是就有了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安徽有150万“阶级敌人”被非法关押，其中被群众专政队员打死、逼死5000余人的惨剧发生。

历史的教训岂能忘记。历史虚无主义更是不可取。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以任何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说道：“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我读了以上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认为是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从而促使我写了这篇文章。■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冯立三）

关于巴金《没有神》的一点考释

○ 陈丹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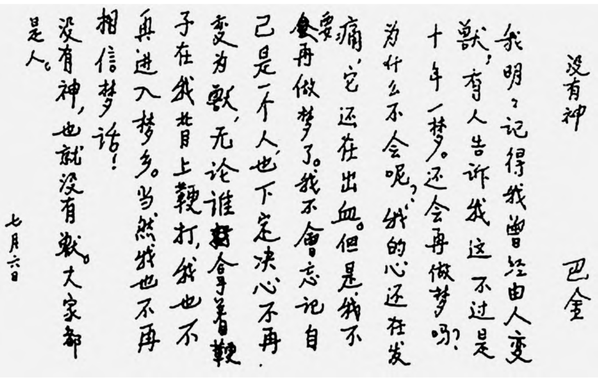
1993年,巴金已近九十岁,身体已经不太好,写作比较艰难。《新民晚报》有一个专栏《文革轶事》,约巴老写一篇有关文革的文章,巴老写了一篇三百字短文,题目就叫《没有神》。(《没有神》,原载《新民晚报》1993年7月15日。后收入《再思录》第85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新民晚报》开辟这个专栏后,颇有点影响。编者是响应巴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设这么一个专栏,发表了的有些文章被一些中学老师用来作为课外阅读辅导的资料。学生们开始几乎不敢相信这真的是在我们国家里发生过的事。经过学习研讨才明白这是真实历史的一页。但是,巴老这篇仅仅三百字的文章却引起某些人的敏感,下令关闭了这个专栏。

我读到这篇文章后觉得非常重要,在我自己写的文章和书里一再讲到,认为是巴老写有关文革的文章中带有总结性的,指出文革的核心实质的一篇。但是稍后我才发现《没有神》这个题目,这句话却是有所本的。它最早出现在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中,出现在1886年美国芝加哥以及1889年法国的五一工人运动中,五一国际劳动节也是由此而来的。当时这些运动都遭到统治者的镇压,一些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人为此牺牲流血坐牢。于是由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进而成为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运动,喊出了“没有神,没有主人,万众得自由!”的口号,后来流传很广。

巴金年轻时非常敬仰两位著名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柏克曼。1927年在法国时还去看望过柏克曼。柏克曼给巴金的信笺上就印着这句“没有神,没有主人”的口号,这是他们柏林办公处的信笺,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常用的口号。使巴金印象很深,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多次用过和解释过这个口号的历史。

那么现在为什么巴金又重新提起这个口号,写文章用了这样一句话,绝不是偶然的。简单地说:因为我们现在还有神,还有主人,仍然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人还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正常的权利。巴老在文章中强调的是“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兽,是从文革时将揪斗的对象叫作“牛鬼蛇神”引发的比喻。“牛鬼蛇神”这个词语在《毛选》里就常用。巴金的话也是从此说起的。我是一个人。大家都是人。这句话很简单,却包含着巴金对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肯定和追求。人和兽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思想,是理性的动物。譬如人和兽都有嘴巴,但是,人的嘴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吃食物,能够生存,这点人和兽(动物)基本一样;另一个就是会讲话,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是老天唯独赐给人的,是兽所不具有的。如果有神把我们当作兽,有主人把我们当作奴隶,让我们闭嘴,不让我们吃饱吃好,不许或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那么“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们都要维护做人应有的权利。我理解巴老这句话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没有神,没有主人,万众得自由”,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最基本的理念即反对专制强权、反对一切强制压迫人们的具体化形象化的说法。无政府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他们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人类自治,自己管理自己。克鲁泡特金的主张就叫“无政府共产主义”,也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五四时期曾有人办新村实验。后来匡互生办的立达学园,泉州的黎明中学、平民中学、广东西江乡村师范等等这些与巴金有过关联的学校也都是一种自治的实验。人与人之间要自由、平等,互助、讲正义,有献身精神,才能建成这样的理想社会。所以人文伦理、道德完善是无政府主义非常看重强调的内容,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一个理性的正义的社会。所以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都写过伦理学的著作。


没有神　巴金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会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七月六日

巴金手迹

人们都熟知，被马克思和后来的共产党百倍赞扬和肯定的巴黎公社，领导人中有一部分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等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实践；无政府主义者却认为是无产阶级自治的试验。1871年巴黎公社的口号与1789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大革命时喊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是一样的。公社期间发布的398件公告（街上张贴的），每件开头都是在“法兰西共和国”大字之下先标示着这三个口号，然后才是正文。（参见《巴黎公社公告集》，罗新璋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所以过去总把这个口号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这是很大的误解，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个口号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对专制强权，也就是没有神，没有主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一样地享有自由、平等、博爱的同等权利；人不应该拜倒在神和主人面前，任其驱使和鞭打。这是从历来被认为资产阶级性质的1789年革命和1871年被认为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直到今天，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也正是现代文明最基本的追求。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政治理想，真正得到完全实现，还有待时日。巴金的呼吁就是希望人类应该从现在开始，从日常社会生活中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巴金在年轻时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来从事文学写作，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信念。即使在1949年后，1956年他强调创作要有个性，呼唤过“独立思考”。1962年他鼓励“大家站出来说真话”，要求创作自由。文革后巴金写的《随想录》里，反反复复批判封建专制，反对长官意志，更强烈地要求“独立思考”，执着地呼唤“讲真话”，主张文艺“无为而治”，重提“没有神”，要做一个人，而不再是神的奴仆，主人的婢女。这时他已不是像年轻时只是从理论上或对当时社会认识出发，而是有了反右派、文革等等政治运动的亲身痛苦经历：思想有过迷失，像是吃了迷魂汤陷入现代迷信；屈从过权势，背离了曾经有过的信念，写过假大空的文章；对受迫害的胡风、冯雪峰等等这些作家朋友投过石子，从沦落为“精神奴隶”，“奴在身者”到“奴在心者”。这对一个一生追求自由、正义、互助、献身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耻辱。我们可以由此理解他的这番苦心，理解他所以那样羞耻痛心，痛加鞭挞，决心洗清污垢，都是出于对历史和个人的反思，出于对人类的也是对个人的人格尊严的严格追求。

“没有神”，其实对许多现代人来说是共同的追求，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主张的。恩格斯曾这样说过：“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他的名下。……相反地，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即非人的，我们越是不能称赞它。”（《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51页。）简单地说，就是不要把人类的一切进步和创造都归功于神，并因此拜倒在神的面前受他主宰。

还有一段话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也是恩格斯讲的，在《反杜林论》中。他批判黑格尔体系存在的矛盾，说：“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见《马克思恩格斯》第三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些话，都说明谁也不应该把自己说成是老天给他的特权——绝对真理的独占者，就像以前封建社会皇帝是天之子，君权神授代表神来管治人民，天子无戏言；或者既承认与时俱进，又把自己说成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就像文革时，宣传毛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从而要求人们绝对信从他。恩格斯说的是黑格尔的例子，但是黑格尔没有权力，

就不能用强权强制人们来信服他。而当强权来强制你时，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讲巴金，讲一个有关的“故事”。1985年年初，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有两件重要的事：一是胡耀邦让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到会祝贺讲话，倡导“创作自由”。二是原先作协和中宣部提出了一个下一届领导成员名单，准备让代表们画圈通过，结果被胡耀邦否定了。他主张由代表们直接自由选举，选上谁就是谁。后来就按此办了。这两件事大家反应都非常强烈。许多老作家兴奋得流了泪，说：“盼了一辈子才盼到这一天。”王蒙说：“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另外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会开成了自由化。巴金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只是请别人拟了祝词稿子在会上读了下。但是，巴金在听说了这个会议情况后，写了一篇《“创作自由”》的随想，讲了一些自己不同的感受和看法。他一方面肯定了会议的成果，另一方面他又说：“‘创作自由’不是空洞的口号，只有在创作实践中人们才懂得什么是‘创作自由’。”他举了农奴制的沙俄统治时代为例，说那时是没有自由的，在他们的国家里，托尔斯泰就没出过一本未经删节的书，也就是说都被官方删节过的。尽管如此，仍然出现了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等等一大批伟大作家。说他们“都是为了‘创作自由’奋斗了一生”。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怎么争取，就是“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虽然事后遭受迫害，他们的作品却长久活在人民的心中”。这个意思是，一个人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坚守心灵的自由和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束缚、自我规训、自我监禁，成了精神奴隶，糊里糊涂，跟风顺从，其结果“一切都是空话，连‘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空话”。我觉得巴金在这里说的已不是一般的政治理想，而是从更深的人文伦理、人类心灵等精神文化层面上提出的问题，是相当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探讨，这也是巴金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之一。

附：

《没有神》——巴金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作者为评论家、传记作家）

（责任编辑　冯立三）

（上接第80页）达到三个目的：一是造成国家统一，二是奠定国家和平，三是促成国家法治。由于没有统一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法治，因此他指出，假定一个国家中的某些地区或党派可以掌握武力，与政府的军队相对峙，那么要想实现统一、和平、法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假如有人认为国内的政治只能以武力来解决，那么中国的政治就永远离不开陈胜吴广或刘邦项羽争夺天下的模式。因此他强调：一定要在政治上提倡容忍的精神，而各党派同时并存就是这种容忍精神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应该享有自由，但是不允许有煽动武装叛乱、依靠武力推倒政府的企图。

六、“不食周粟”的新儒家

1949年3月，内战形势逐渐明朗，张君劢离开内地移居澳门。在此期间，李宗仁曾邀请他出任行政院院长，但是他没有答应。同年11月，他应印度教育部的邀请前去讲学。在此期间，周恩来曾派人请他回国，被他拒绝。1952年他转赴美国，更加坚信只有民主宪政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认真清理中国的文化遗产。他开始专心著述，写下《新儒家思想史》，因此他被视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1958年，张君劢与唐君毅、牟宗三共同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表达了中国文化需要活跃于世界舞台的决心。1962年，台湾教育当局曾希望他前去讲学，也被他断然拒绝，并退回了一笔数额可观的路费。于是他成为不与海峡两岸政权交往的著名人物。

1969年2月，张君劢在旧金山逝世，享年82岁。■

（作者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冯立三）

我当律师的一段经历

○ 张思之 口述 孙国栋 整理

肃反结束，法院党组开始筹划成立律师协会。贺生高想让我去律协，让人事处处长成玉林做说服工作。成对我说，法院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整你一年多，搞成敌我了，回去也没意思，不如去律协。律协由司法局分管，局里有党组，老贺是书记，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到律协，你是顾问的顾问。我心里明白，这是为了说服我拣好听的说。我呢，前前后后挨整两年，法院确实是不想回去了。对律师虽不熟悉，但没恶感，从前父辈的朋友中有律师，他们不错嘛！于是下决心到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

虚为第一代律师，只办过一个半案子

政府设置律师制度，一开始就是个门面。它能在1950年就提上司法部的议事日程有偶然性。对于巩固政权、建立良好社会秩序来说，律师制度可是个好东西。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律师制度都发展得好就是个证明。我们的情况有点意思，1955年律师一出现，老百姓就挺信赖，那时律师在老百姓心目中即使不能说印象绝佳，也是很好，总之挺受欢迎。

当时，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陈守一。挑选他，据说是要找个大学者撑门面，但陈的主要职务是北大法律系主任，在律协是挂名，实际负责的是白振武。白是老红军，在陕北时就跟贺生高一起打游击，后又随贺从公安局来法院做办公室主任。我所在的研究室归办公室管，所以我们两家人住同院，那时为了工作方便，贺生高决定按行政单位分配宿舍，就是现在的人民大会堂的位置。我和白不但工作上互相信任，私交也不错，他乐于我来律协工作。

谁知到了律协屁股还没坐稳，贺生高就说：给你个任务，成立第三法律顾问处，你去搞，房子已经给你找好了。贺在这方面对我确实是特别照顾。你知道办公地点在哪儿吗？南长街，中南海门前，中山公园对面。那个小院好漂亮。中式四合院，西式装修，小院里边是个大玻璃罩子，它不是房间里的玻璃窗，而是整个玻璃大厅，这种装饰在当时很不寻常。人手也基本上配齐了，我就这样变成第三法律顾问处主任。

此时，那位在肃反中斗我最狠的女高音也调来第二法律顾问处。她又没学过法，怎么能做律师呢？我怀疑这是给老贺安的钉子。老贺的方针是：有人就行，来就欢迎。

不少人称我是新中国第一代律师，但实在惭愧，我对于五十年代律师开创时期的工作没有建树。那段律师生涯，基本上是搞行政事务，除了每周参与三个半天的法律咨询之外，总共办了一个半案子。重视咨询，主要是想了解一些社会对律师工作的需求以及人民大众对于律师工作的观感。

所谓“一个案子”，是因为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团参观法院要旁听审案，为此找律师出庭，司法局要求我去，正好预定的参观之日要审一个抢劫案，它就成了我的“处女作”。

那个刑事案子不具有典型性，按抢劫起诉的。我的表现自我感觉还可以，可惜什么材料也没留下来。现在还记得，案中辩护我把握了两个重点：一个是改变了定性，是抢夺而不是抢劫；另一个是被告人有犯罪中止情节。在刑事案件中，这两条当然很重要，被法官采纳了，结果判了缓刑。开完庭，代表团跟被告人会了面，说你的律师给你辩护得不错，最后还对他说了句“祝你好运”。

所谓“半个案子”，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罗抱一离婚案。那年头，干部中的离婚案子本来就容易闹得沸沸扬扬，加上我的当事人罗抱一是中央政

府重要经济官员、外贸专家，女方是北京市一所重点中学的模范教师，两人一道从革命根据地进的北京，一对恩恩爱爱的患难夫妻！国内外有些报刊一渲染，自然万众瞩目。夫妻二人感情确实很深，但性格差别太大。一个是风流才子，另一个是女工作狂，一心扑在事业上，平常不回家，对丈夫有点“冷”，按罗的要求是不够“热”。时间长了，罗抱一就有点“那个”了。当年外贸部周末都搞舞会，罗跳着跳着跳出了花样。据说那个舞伴漂亮又风流，两人一“跳”钟情，罗抱一就开始“抱二”了。妻子有察觉，但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罗抱一正式提出离婚，她惊呆了：咱们是恩爱情侣、患难夫妻啊，怎么能这么冷酷无情呢？女方接受不了，找妇联帮助，妇联一介入，麻烦了，罗抱一就不再姓罗，而是百分之百改姓陈(世美)了，要作为重点打击。妇联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喜新厌旧”的典型，而且出自“高干”，就要造造积极维护妇女利益的态势，这样一来，罗更是死心踏地非离不可了。想当初，中央和省市一级的妇联负责人，一般都是“上层人士”“革命元勋”的夫人，枕边风一吹，那劲头一般人抵挡不住，所以妇联那时颇有点“令人生畏”的气派。我心想，结合这个情势，联系当时法律背景、人事背景、舆论和政治背景，他的婚难离，而且人们很难同情他。我只好千方百计在他俩之间调和，总的方针是：即使离，也不要打官司，因为打官司对罗抱一百分之百不利。由于两人互不相让，而且越来越僵，又只好等待时机，这样前后耗去了我两三个月的时间，还没等出结果，反右一来，我就“闭幕”了。

对于这“半个案子”，我坚持这点看法：当事者是开初相当美满、后来实该分手的幸与不幸的一对！谁之过呢？说得清，又难说清。所以说，真正做一个好律师，办好一个案子不那么容易，也不那么简单。我阅历不深，从中增长了见识。作为律师，懂得人情世事，是必修课，太要紧了。

从“醋泡判决”到“大字报贴上天安门”

对北京市属各单位来说，整风鸣放与反右斗争，相隔也就半个来月，动作慢点的单位，包括法院系统，几乎就是“相连”了。

我没有参加整风。想法很简单：中央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我又不是党外人士，为什么要“自外”？因此大小座谈会一概不参加。重要的是，当时一门心思在工作上。肃反收拾我一年半，丢了的这18个月，想补回来，更何况律师于我是件新的工作。

我没写过大字报，甚至没看过大字报。我所在的第三法律顾问处也没人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曾要求后勤备足纸墨，但没人写。因此，法院、司法局、律协三家，还有一、二法律顾问处，天天有人动员我，说这么大的运动，你不能按兵不动，来看看我们的大字报吧。我一直未为所动，后来禁不住人劝，又听说当时最有名的那张被呼为“醋泡判决”的大字报，是我的朋友陈建国写的，标题是《共产党员的良心到哪里去了》，很轰动，我觉得说不定会捅娄子，动了想去看个究竟的念头。不料这一去就闯了祸，走上“不归路”了。

陈的大字报揭发了这么一件事：1956年，人大代表黄绍竑要来法院视察，调研反革命案件的审判情况。法院紧张了，因为1951年镇反时案子成批比较集中，有的没来得及写出判决，用军法处的名义以一纸布告替代，一张布告可以判处好多个死刑。你想，把人毙了，连个判决书都没有，太草率了！怎么办？于是补写，好应付人大代表的视察。但问题来了，补写的判决用纸新，一眼就能看出是补的，拿不出去啊。危难之时出高人。有个老法院的推事说，好办，用醋泡一下，而后晾干，就像旧纸了。陈建国大字报说，你们共产党用醋泡判决书来蒙蔽人大代表，“共产党员的良心到哪里去了”？他自以为“问”得很到位，美滋滋的。

院长王斐然率先去看这张大字报，很重视哦，他对旁边人说：“我是先睹为快。”研究室的郭可宏听后反唇相讥：“怕是先睹为恨吧！”跟着，围绕陈的这张大字报展开了热烈辩论。有人激赏，有人反驳，争得不亦乐乎。我去看时，好多人围上来问我的看法，我坏就坏在嘴上，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党员讲党性，“良心”这个词用得不好，应该问，共产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么提，搞到哪里都不会有毛病。我哪知道法院“密探”也多，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马上就报到王斐然那里了，王的反应很有味道：“他到底在党内混

过一阵子,就是比陈建国高明。"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信号,我混不多久了,连同陈建国!

没过几天,贺生高召集党组扩大会,传达市委关于大字报的指示,总的精神是:一不提倡,二不反对。老贺解释说:"咱们是专政机关,有些问题带有机密性,不宜对外,要贴只能在机关内部贴,不准贴到外面去!"我跟他过于熟悉,平时又不注重上下等级关系,就有点不那么讲理地问了一句:"要是有人往外面贴怎么办?"他很不高兴,硬硬地回了我一句:"谁贴我处分谁!"

"别拿处分吓唬人好不好?"我至今也想不清我说这话的心态,其实根本没有"抗"他的意思。他却生气了,立马说:"你贴个试试。贴了就处分你!""我不给你贴,要是有人给你往天安门上贴一张,我看你也没办法。"

党内怕是也有人"卧底"。市委书记刘仁当夜就得到报告,"张思之要把大字报贴上天安门!"谁报的? 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已身处这场斗争旋涡的中心,前途只有一条:下沉了。后来我的右派罪行中有一条"主张把大字报贴上天安门",源头就在这里。现在当然一说就清楚,可当时呢?

青年时期的张思之

饭局也是阶级斗争

好像一有运动,我就在劫难逃。天下事也就有那么巧,接下来的一顿饭局,竟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一天清早,我穿过石碑胡同朝长安街走,准备过马路去南长街我的办公室。一辆三轮车忽然在我身边停下,周奎正老兄腆着大肚皮跳下车,拦住了我,劈头一句:"有好吃的,去不去?"我说,有好吃的当然去。两个馋鬼碰一块儿了:"什么时间,在哪儿?""明晚,北京饭店。"然后我才问什么由头。他说:"欢送郭可宏,赵威候操办,到时候他会通知你。"

我为什么一定要送郭可宏呢? 郭与我曾经同在研究室工作,学贯中西,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对我帮助很多,是可以信托的朋友。他"二战"时当过远征军翻译官,肃反中为这段历史挨了整。夫人在上海工作,夫妻两地分居,一直恳求调回上海。我也屡屡请求老贺高抬贵手,尽快放行。老贺的回答非常干脆:"你让他走,我用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调动于是遥遥无期,几乎已是泡影。

肃反之后,情况起了重大变化,郭可宏虽然没有政治问题,但因为受我牵连,又揭发不出我有什么问题,被整得很惨。为此去意更坚,老贺不好再留,同意放行。朋友设宴饯别,我当然得参加。根本没考虑《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已经发出了严重的信号!

第二天晚上来到北京饭店,大家刚坐定,楼邦彦教授推门而入,夹着皮包,满面堆笑。楼当时以北大教授身份兼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又是九三学社北京市主委,民主党派中的头面人物,坐定发话:"威候,今天吃好一点,你们原来定的标准不够,不足的数统统算我的。"因为可宏平时工作之余,替楼译、校过不少书稿,都是义务性的,作为回报,合情合理。这顿饭于是吃得格外丰盛。未折柳,饮美酒。

席间,除了惜别,基本上是无主题地闲聊,楼邦彦是老师又是局长,说话特少。酒足饭饱犹存离情别绪,我看大家好像没有尽兴,又多了句嘴:"时间还早,诸位谁有雅兴,咱们上中山公园喝茶去。"楼先生等四人有事先走,其余的人与可宏一起在"来今雨轩"一直泡到"静园",才入"人散"之境。

第二天一早6点刚过，司法局局长贺生高的电话就打来了，说你过来一趟，有要紧事。见面就问："昨晚干什么去了？"我据实以对。"都有谁？"我逐一报了名。"楼副局长怎么去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事先也真的不知道。贺又问："楼都讲了些什么？"我说除了闲聊，没说正经事。贺一听，火了："你这个人，脑子里怎么没有政治？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和他们一块搞什么欢送？楼是市委关注的人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情况很严重。市委对你们昨晚的活动很重视，知道情况后连夜讨论，分析楼参加这种活动到底想干什么。"他说刘仁很恼火，特别问张思之闹什么？还说刘在等着你的汇报材料，你先回去写材料，把昨晚的事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写清楚。我心里十分明白，贺对我百分之百是好意，是为我创造"主动"的机会，交代清楚，好躲过这一劫。我的报告很详尽，但酒桌上的泛泛之谈，能有什么价值？我也估计不出楼副局长有些什么问题。报告递上去后没消息，我知道事情不妙，但并没意识到有多么严重，不就吃顿送别饭吗？

楼邦彦很快入"网"。批楼会上，斗争尖锐激烈，发言直指楼氏的重大活动无不带有邪恶的政治目的。以"骨质疏松"为特征的某些知识分子，面对突然而至的新形势，似乎个个都学会了披挂上阵，使尽十八般武艺，投向"顽敌"，聊表对党的忠心。楼先生一介学人，何曾见过这等战阵，只余哀叹，略微有点点招架之力，其状可悯。他的门生陈建国转得特快，第一个揭发他的老师，发言题目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他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说"受到了欺骗"。楼先生没有客气，慢条斯理地回了他一句："你那么聪明，我骗得了你？"真是绵里藏针。不知这位人称"沪上精灵"的陈老弟做何感想。没过几天，他也被人移为"靶子"，本想避开恶斗，却被击中了。我深知自身已是"在劫难逃"，一语未发。

市委政法部召开的最后一次座谈会，点名要我参加，送来书面通知，郑重其事。我仍然不去。法院机关党委只好另换对策：打上门来，三个人找我恳谈。那位昔日斗争会上的"女高音"，现在压低嗓音故作温柔："思之同志，咱们都是党员，共产党员首先得对党忠诚，讲心里话。大家都知道你对肃反有意见。现在党在整风，我们也在回顾工作中的问题。你有哪些具体意见应该都倒出来，帮助党改进工作嘛。"另外两位随声附和："孟萍同志讲了党委意见，今天是专门来听你讲。"

我一听，心想跟我玩这个呀。形势已然清清楚楚告诉人们这是一场斗争，曲曲弯弯怪没意思，就来个实话实说，直截了当：肃反那么整我，的确有意见，但现在我不提。右派向党进攻，肃反是很重要的一条。让我在背后捅刀子，我不干。等运动完了，我会提的。他们软磨硬泡：现在提，组织上能很快改正，岂不更好？我的态度十分坚决，说你们就死了心吧，我现在不会提。谈话总共也就十多分钟，他们一无所获，灰溜溜地走了。

没多久，白振武对我说，是不是主动检讨一下，也许能过关？我明白他的好意，就说老白啊，我现在想得很清楚，我检讨也是它，不检讨也是它，反正在劫难逃，不费那个劲了，有什么算什么吧。

我入了"网"

果不其然，在北京律师界，我第一个被划为右派。请你注意一个史实：毛的反右方针中有一条，叫"先党外，后党内"。楼、陈他们之所以划得早，就因为他们属"先"。从"后"说，我大约也是法院系统的第一人！

批我什么呢？大字报和斗争会上罗列的罪行总共有五条：一、攻击肃反运动是打击报复，政治陷害；二、在内部制造分裂，一贯反对党的领导；三、主张把大字报贴上天安门；四、给右派分子陈建国出谋划策，支持右派言论；五、参加欢送右派分子郭可宏的黑会，为右派分子撑腰。

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划右标准，以上五条只要一条就够。头两条，去年在肃反中已反复做过批斗，再炒"回锅肉"也弄不出新鲜味道了。第三条看似严重，实际上我与老贺在大字报问题上的那番对话，主持反右批斗会的刘杰三当时就在场，他不会曲解我的原意，"斗争会"上三言两语就交代清楚了。至于后两条，说我主张把陈建国大字报中的"良心"改为"党性"是出谋划策，说送别郭可宏的晚宴是开黑会，我都没做辩解，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回特乖。一是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二是

批斗我的都是律师界一块工作的同事，他们无非是执行公务，发言又都不出格。个别人情绪激烈点，也是出于争取个好的态度，有利于“闯关”免划，可以谅解。我没有理由跟他们对抗，说什么我都认。因此，斗争特别顺利，三场下来，就结束了。刘杰三的结论是：“不像人们说的那样难斗难缠嘛！”他是30年代北平的老地下党员，靠拉排子车做苦力做掩护，一位忠厚温和的长者。虽也来自公安局，但到得晚，对王、贺既不偏爱也无成见，没有介入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相当超脱。他领导律协系统的反右斗争，我没吃过分外的苦头，最终给我的文字结论，也只有反对肃反和主张把大字报贴上天安门两条，其余的都抹了。文革中刘杰三被造反派整得死去活来，终日罚跪，膝盖都磨烂了，浑身上下是伤，我去看他，一句怨言都没有，对毛依然无限崇拜。文革没结束就含冤去世了。

反右开始，王斐然运用权力，把调走没几天的郭可宏又从上海调回批斗，这显然因为可宏与老贺和我关系密切，王依然想从他口中挖出点材料，结果当然是再度失望。可宏回京本想尽快过关早日重返，进门第一句话是：“我回来是认罪的，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有罪。”他忘了自己有小辫，他们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不得团聚，平时自然会有不满，发发牢骚，激动时也会发出不敬之词，那句“先睹为恨”便是新例。于是就被硬整狠斗了。但这够得上“反”吗？构成“罪”吗？可他不得不“认”，斗争结束，戴了两顶帽子——右派加反革命，带着两项处分——开除公职加劳动教养。回到上海，夫妻二人承受不住如此剧烈的打击和折磨，双双自杀，携手天国，这或者是他们“最后的”抗争，正在英年！我却由此永远告别了一位真诚的兄长和朋友……还有，一个那么多姿多彩的温馨之家。谁能告诉我：今夕何世？

如果不是受我牵连，可宏可能不会被弄回北京，不会被处理得那么严酷，他也不至于走上绝路。每念及此，心里有多少愧疚的话想说？能说？

法院“烂掉好哇，可以再搞一个嘛”！

划右派的时候，大家已看清领导小组的“布局”：王派这边划一个，必定要从贺派那边也揪一个出来，所以，肃反时几个斗我最狠的，包括那位女高音，一个没跑掉，都被划为右派了。这样一来，名额超标，我那个第三法律顾问处却只划了我一个。刘杰三告诉我，内定还有马德昌和李知新，让我揭发他们的问题，有让我“立功”的意思。老马平常说话有点尖锐，有时还带点刺，但绝无恶意，能算问题吗？我什么也说不出。终因名额已够，刘杰三就给摁下了，他们逃过了一劫。从整体上讲，整个法院、司法局系统划了六十几个，包括王、贺两个主要头头，够狠的了。

运动结束，对我的处分，按“标准”说不轻不重，不是分六类处分嘛，我是四类，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工资降了两级。

北京法院划右派，在基本点上与其他单位类似：荒唐。从全国范围来看，什么花样都有，五花八门难以概括。给你说个法院的例子印证一下。女法官毛思浚，人很好，整风座谈会她开庭没空参加，本来可以躲过“引出”这一关了。嘿，真的是“人的命天注定”。她开完庭，座谈会还没散。她也是好事，推门往里看看，里面人说“进来进来”，她觉得自己很受欢迎，边找位子边说：“我不是来‘争鸣’的，我是来共鸣的。”这话精彩吧？好！共鸣。尽管坐定之后直到散会没再讲半句话，会上所有右派言论也都有你一份，“共鸣”嘛，于是入网，定为右派。噢，怎一个“共”字了得！她丈夫同我挺要好，跟我说，这个思浚啊，平时不爱说话，不知怎么却多这个嘴！

我也搞了“落井下石”

我后来得知，戴帽的人包括一些头面人物，除了极个别的“硬骨头”，无不公开承认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罪。我排在这支长长的认罪队伍里面。不同的是，我除了认罪，还夹点虔诚。有个重要的观念主导着我：“毛主席还会错吗？他绝不会错！”错在自己，咎由自取。反右肯定既正确又必要。

王斐然、贺生高双双划右，我都不觉得意外。尽管我自始至终不认为他们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但让我揭发王斐然，我却非常痛快，虽然揭的都是陈年往事，陈谷子烂芝麻，甚至只能算是鸡毛蒜皮，但毕竟不该落井下石。冯雪峰被周

扬迫害成那个样子，却拒绝揭发周扬，那是什么品格！私心一重，什么坏事丑事都干得出来。

我对老贺确实有特殊感情，于公尊敬，没有距离；于私亲切，没有隔膜。现在把他划成右派，要我揭发，竟也降服，面对暴政，我是懦夫，哪有马寅老那种孤军奋战不可夺志的浩然正气！反右领导小组指示我，先写材料，斗争会上不讲具体事实，达到让老贺丢掉幻想、坦白交代的目的就够了。我遵从照办。在会上，贺夫人对老贺说：“你还扛着！还存什么幻想？还不彻底交代。你听张思之发言，谁知道他会揭你些什么？家里人等着你的觉悟！”贺夫人平时怯于在会上讲话，那天说得既沉重又沉痛，使我受到很深的刺激，我无“颜”以对。

我终于给老贺致命一击，是交代肃反中前门见面那件事。按当时的政策，那种晤谈不仅仅是违反组织原则、破坏纪律的问题，还够得上“敌我不分”的立场错误，足够划为右派了。我明知这个揭发会引起公愤、给老贺造成压力，得到恶果，还是干了。我天真地认为我们都错了，好蠢啊！

1958年划右以后，我和老贺失去了联系，再未见面。1978年，老贺的右派问题作为特例先期改正，重回公安局任顾问，却突然查出胃癌断为晚期。我去公安医院看他，只见他仰卧着，接近一米九的壮汉身影已不复存在，瘦得厉害，只是精神还好。见到我十分高兴，虽然当时已经几乎不能进食，却执意要吃一个我带去的梨：“你给我送来的，我一定要吃下。”我懂得他的心，没有劝阻。他带着微笑，一口一口艰难地往下咽。“梨核儿内酸”，他那既坦然又艰难的状态，给我的刺激远超“死别”。我陪着他，眼泪一滴一滴往下落：我们都动了感情。他握着我的手说：“人都会死，不必难过。只可惜我没能为党多干点工作。你还年轻，又很能干，好好干番事业。过去法院那些事，别再想它，没什么了不起！”这么忠诚坦荡的党人，却硬给划成了党的敌人，阶级敌人！人间还有是非公道吗？除去问天，又能问谁！纵观此生，多少“天问”？

老贺走得太急太早了。他是第一个因早逝给我极大刺激的人，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愧疚与悲痛：真不知怎样才能挽回我带给他的痛苦与损失！

斐公1979年初春“改正”以后，调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次开会巧遇，他孤单一人，腿疾似乎重了些，走路很费劲。我赶上去扶他，一阶一阶地登上楼。他很感动，边走边含歉意地说：“别怪我。那时候主要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领导你们这批青年学生！”我懂得他的意思，也相信他说的是实情，回应道：“我能理解，我有些事做得也很不像话。”他转了话题，接着说：“你转到律师行业，合适，好好发挥吧，等你的好消息。”再以后，他来电要看我那年写的文字，表示出一如过去那样的关心，我也很受感动，前嫌尽释。

现在，斐公、老贺都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是他们，领我迈进了中国社会的门槛，懂得了一些世事，给了我锻炼本领的机遇，又是他们的坎坷唤醒了我的觉悟。我怀念他们，感谢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做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张思之：本刊常年法律顾问；孙国栋：《律师文摘》主编）

（责任编辑　冯立三）

华源书阁
北京华源书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HuaYuanShuGeCultureCommunicationCo., Ltd.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0050480
我是华源书阁，我来了，你在哪？
——为了“您”和书的邂逅！
千元出书　赠送交流
回忆自传　家谱族谱
单书套餐　免费发行
丛书套餐　全国代理
A类：丛书号出版优惠套餐最低11500元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赠送最低1000元
服务热线：010—56223866　56223877
公司邮箱：huayuanshuge@163.com
公司网址：(华源出版网）www.hychuban.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18号明天生活馆A座206室

“长治号”起义的前因后果

○ 周 克 口述 顾训中 整理

1949年，在黎明到来前夕，中共中央上海局做出了一项决定，号召地下党同志为迎接解放，开展立功运动。我当时所在的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热烈响应号召，加强了敌占区的群众运动，武装扩展，政治攻心、策反、情报和统战工作，做了一系列漂亮的工作。

直接参与组织的几件重大策反工作

一件大事是成功策反了朱家角的镇长蔡佣之。他向我们表示留下来不走了。于是，我们交给他3个任务，而且专门派了两个同志。一个叫王正，原来是昆山工委书记。当时为了加强这个工作，临时调出来到这里做策反工作。另外一位是从中原军区撤到上海的有军事斗争经验的老同志，在朱家角坐镇指挥，迎接解放。我们布置给蔡佣之的第一个任务是，把朱家角镇的自卫中队掌握住。这支自卫中队相当于一个连，百把人，要组织他们起义。第二个任务，因为朱家角当时是米市，许多粮船都要经过这里。因此，要他积聚些米粮，供给即将到来的解放军。第三个任务，国民党昆山县县长很反动。他跟蔡的关系很好。假使他逃跑经过这里的话，要把他扣留下来。最后，这三个任务中前两个任务完成了，第三个任务他有意没有完成。碍于面子，把这个县长放走了。

后来苏南区党委给我们提了意见，说是蔡佣之手里的血债太多了，最后在肃反时只能镇压了。为什么镇压他呢？大约在1948年，华中工委从苏北派过来一支部队，司令是丁锡山。丁锡山过去曾是忠义救国军，后来经我们教育、策反，向我们靠拢，最后跟着我们新四军一起撤退到了苏北。这支部队经过改造，汤景炎同志被派到这支部队担任政委。这时这支部队受命挺进上海周围，打开江南局面，迎接解放。这支部队当时是比较有战斗力的，从苏北到了浦东，一直到青浦这一带，对国民党震动很大。敌人组织了四路围剿。这个时候，朱家角那个蔡佣之是反动的，协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堵截。就在青浦附近，丁锡山和汤景炎两人被国民党军队俘虏，最后英勇就义。因此，苏南区党委认为蔡佣之有血债，批评我们地下党怎么能策反这样一个人？认为这个人不能策反，本身就是要镇压的对象。当时，外县工委副书记亲自接受了蔡佣之的投诚要求，主要是考虑到，这个人在朱家角地方上很有影响，掌握了一些实权。对他的反动性是知道的，但也希望他最后能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好事。他主动找到我们想弃暗投明，因为他不想走。这些人到台湾去没有身份，到了台湾也没有立足之地。留在这地方还能保点身价。而他最后确实是做了一点事情的。粮食囤了150石，一个中队的人枪对解放军来说可能不算一回事，但他总算也还有点表现，而且对当地的解放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蔡佣之被镇压了，但蔡佣之儿子的认识还是正确的。他对共产党并没有记住杀父之仇。解放后他在工商联工作。蔡佣之的两个孙女儿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都非常出色，被美国大学公费接收，到美国去留学了。我也蛮有感慨，这些人家的孩子不像干部家的有些子弟，自己努力学习，倒很有出息。对她们本身来说，感觉到只有自己奋斗了！这是一桩事情。

其次一件大事，就是炸毁江湾军火库。这项工作是我自己组织的。炸军火库这个工作应该说是获得了全胜，我们没有任何损失，没有任何牺牲。

那是1948年的初冬，地下党员周沙尘异常兴奋地来告诉我说，江湾军火库有个非常合适的工作对象。那时，江湾军火库是国民党一座十分重要的军火供给基地，供应着前线急需的枪械弹药。因此，那里守备森严。但是，我们在里面没

有一个自己的同志，也没有一个积极分子。所以，听说有了工作对象，我也十分兴奋。原来，那里有个年轻的少尉技师叫赵聚能，担任检修军械的工兵组长。他是个追求进步的好青年，对国民党残害人民的内战十分不满，所以已经自发地行动了起来。他常常把一箱箱弹药当作废品运到吴淞口销毁，还把许多真正的废品混到弹药中运到前线去。赵聚能是湖南人，与周沙尘不仅是同乡，还有甥舅的亲属关系。赵父曾与彭德怀是少年时的同窗好友，他亲自修书推荐周沙尘到延安抗大学习。周毕业后回到了蒋管区做新闻工作，直到1948年才由我与他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赵聚能知道周的来历，经常央求这个小舅舅帮助他到解放区去。我与周沙尘仔细研究了赵聚能的情况，觉得他的政治态度是真实的，决定加强与他的联系，把他作为我们的重要工作对象。在一次交谈中，赵聚能在十分愤慨时无意中说到想炸掉军火库，引起了周沙尘和我的很大兴趣。但是靠他小赵一个人，靠他的一腔热情，能炸掉吗？这是一件大事，必须周密计划。为此，我和周沙尘、小赵多次具体商讨，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每一个困难，都反复推敲、仔细部署。我们最后决定：目标是彻底炸毁这个军火仓库，方案是从仓库的炮弹库中心开花。为了确保完成任务，又要确保安全，务必细致、果断、安全。当时赵聚能的弟弟赵申也在这个军火库工作。我们立即采取措施，要他弟弟和母亲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同时，安排人员组成接应小组，在仓库外面接应小赵完成任务后安全撤离。我还决定，从此时起，小赵不能再有任何可能引起敌人怀疑的议论和行动。

这一行动只能安排在晚上夜深人静时进行。因此，行动的第一步是如何让小赵这个修械组人员能在仓库里住宿下来。不能留库住宿，就无从下手。此时，前线急需军火，而检修工作根本跟不上。军令如山倒，库长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小赵趁机提议晚上住库加班进行，得到了库长的赞同。小赵又利用住库机会，主动接近选定的爆炸中心炮弹库的看守老兵，得到他的信任，摸清了库房地形。

为了能顺利引爆，我们还一起仔细研究了用什么材料引爆。经过多次试验，最后选用了俄罗斯人抽的一种长烟卷作为引线，点燃着火油桶后，烧着黑火药，引爆炮弹。我们又安排了老党员杨孟亮协助小赵撤退。

小赵利用先后进炮弹仓库的机会，布置了火油筒和黑火药。当一切准备停当后，我向上海局汇报请示：“如计划可行。何时执行？按目前形势，是和平过江还是战斗过江？如和平过江，就可以不实行爆炸计划，军火库可以保存下来交给我军。”上海局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最后指示我们：“要准备战斗过江，可按原计划行动！”

1949年2月14日，是个星期六的晚上。赵聚能让组里的其他战士出去玩，自己单独留下守库。他趁看守炮弹库的哨兵走开时，乘机溜进去，按照预案点燃了长烟卷，然后从容离开。在库外接应他的老杨用摩托车将他迅速带离了现场。我是在从上海去无锡的火车上看到报纸上登出的江湾军火库爆炸的消息的。这一行动震动了整个上海。

后来我们把赵聚能送到了浦东的游击部队去了。大家很欢迎他。因为他会修枪。轻重枪、长短枪他都会修。解放以后，刘晓很看重他，将他安排到了上海锅炉厂做车间主任，他表现非常好。以后他又支内到沈阳锅炉厂。文革当中，他调到了武汉中南地区一个发电机供电站公司里做经理。赵聚能的弟弟原来在上海一所大学里工作，现在已经离休。他弟弟没有直接参与这件事，是他一个人做的，小赵是孤胆英雄。

组织“长治号”起义

另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国民党海军“长治号”起义。这是我们在1948年年初就着手进行的工作，在1949年9月18日夜起义成功的。但是，直到1979年秋还要为这一地下党的壮丽凯歌而正名！

“长治号”是艘日本制造的新型护卫驱逐舰，排水量达1350吨，装有火力十分猛烈的主炮和机关炮，抗战胜利后转归了我国，是国民党海军中除“重庆号”外航速最快、火力最强的军舰，又是当时海军海防舰队的旗舰。“长治号”上曾发生过两次士兵的骚动，都被镇压下去了。在“重庆号”起义成功，另一艘军舰“永兴号”起义失败后，国民党特别加强了对军舰的控制和警戒。为此，他们特别调来了一批山东籍军官，掌握了军舰上

电影《海魂》海报

一切重要部门，控制了整个局面。这使得舰上占绝大部分的福建籍士兵更加受压，双方情绪更加对立，矛盾十分尖锐。这些军官很反动，对他们不可能进行策反。我们决定走组织下层士兵进行起义的路。

1948年年初，我们在暨南大学学生中发展了几名新党员，他们都是福建人。我们研究了他们周围的关系，决定派他们中的党员王保鎏、陈健藩、林慰慈打入敌海军，开展策动海军的工作，筹建地下党海军支部。通过陈健藩，我们与“长治号”上的进步水兵陈仁珊建立了关系。不久，舰上建立了由陈仁珊、林寿安、李春官组成的水兵三人小组。陈仁珊是枪炮下士，身材魁梧，为人慷慨仗义，很有魄力，和士兵有着广泛的联系。林寿安是枪炮上士，为人机智多谋。而李春官是个帆缆上士，曾到过解放区，政治上坚定地靠近我们。陈仁珊由陈健藩发展入党，要他独立负责领导起义。其他两人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由于都出身于贫苦农民，对国民党的统治早有不满，思想进步，向往共产党，都有着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不料，后来因为这个原因，解放后北京的海军政治部与我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们认为这只是水兵的自发起义，不是我们党领导的活动。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之间闹得很不愉快。这事后面再讲。

“长治号”起义由我直接部署，由王正、陈健藩两人协助我进行。我们一起研究了形势，充分估计了反动军官控制下的严峻局面，决定起义的方针是准备“流血起义”。为了表达坚定的决心，陈仁珊曾将自己唯一的“财产”——一枚金戒指请陈健藩转交他的妈妈，表示万一牺牲了，可以让妈妈维持生活。

解放军渡江时，“长治号”三人小组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目前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决定先随国民党军队撤离吴淞口。上海解放后，“长治号”泊于浙江定海，担任国民党海防舰队的旗舰。此时，陈仁珊利用机会秘密串联，迅速在士兵中建立单线联系的一个个“三人小组”，逐步发展了43个士兵，由他们三人分别联系，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队伍。八九月间，“长治号”在吴淞口外大矶山附近游弋，执行封锁吴淞口的任务。陈仁珊觉得这里离上海很近，正是行动的有利时机。这时，舰上的军官们乘机对渔民们敲诈勒索，激起了士兵们更大的不满。9月19日午夜，士兵们在陈仁珊、林寿安、李春官等人的指挥下开始行动。陈仁珊迅速打开了枪械库，分发了武器。起义士兵们将军官押到了舱底，按计划迅速占领了舰上的要害部门。起义很快取得了成功。随后，“长治号”加足马力，向吴淞口全速前进。为了不致造成误会，“长治号”在进吴淞口时将主炮罩上炮衣，炮口向下。船樯上还挂上了白布。当军舰驶进吴淞口时，全舰士兵高呼：“解放军，我们是起义的！”此时，敌人派来的飞机追了上来，并不断地扫射、轰炸。但轮机手和士兵们毫不畏惧，依然勇敢沉着地前进。当军舰驶到外滩码头时，陈毅司令亲自来迎接。按照陈毅同志的安排，“长治号”立即开往南京。在南京燕子矶华东海军基地码头，解放军举行了热烈隆重的欢迎仪式。可能是因为这个场面太激动人心了，陈仁珊当众跪了下来，并磕了个响头。

后来，“长治号”改名为“南昌号”，加入了人民海军的序列，并作为华东海军第六舰队的旗舰。10月10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亲自致电“长治号”全体起义人员，电文中说：

长治号全体起义的同志们：

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行动。由于国民党军海军内的爱国官兵陆续起义，人民海军已在迅速发展。希望你们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建设中国

人民海军和完成解放中国全境的伟大事业。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

后来，毛主席于1953年2月在长江首次视察海军时就曾亲自乘坐过这艘军舰。2月24日这一天，毛主席就在"南昌号"的会议室听取了海军领导人的工作汇报，指出：我们有了一个强大的陆军，再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帝国主义就不敢欺负我们了。毛主席还分别为"南昌号""黄河号""广州号"题写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延续了30年的正名纠错

起义以后，陈仁珊做了副舰长，因为他是起义的领袖嘛！直到后来改名为"南昌号"时还有他。但不久就另外换了别的解放军干部。所以他的确受到了一定的另眼看待，虽然不叫歧视，但也不认为是可信赖的。解放军海军政治部始终存疑，陈仁珊算不算入党？这是不是地下党领导的起义？当年流血起义的方针是不是正确？他们不承认我们上海地下党与他的领导关系。以后还把舰上的40多个起义士兵都遣散了，不承认他们是起义，认为都不能留在解放军的行列里，都送回了乡下。解放后很多年了还在闹这些事情，真是岂有此理！

为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在福州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这件事。陈仁珊去了。他一定要求我和陈健藩也去参加。我到了福州以后，海军政治部的一个秘书跑来动员我说，周克同志，请你们回上海吧，不必参加这个会了，因为这个会和你们没有关系。但陈仁珊要求我们留下，这个舰上被遣散的那些同志也要求我们参加。在福州开会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反映问题。还有人赶到福州，见到我们痛哭流涕，申诉当年回家以后不但没有职业，还被作为国民党兵痞处理，直到这次开会都没有钱成家！我们听了后太气愤了！太岂有此理！不承认陈仁珊的党员身份，不承认这些起义士兵，并歧视、遣散他们，而且认为我们举行武装起义，枪杀了10多个反动军官这个做法是违反政策的。可是他们就没有想一想，当时不枪杀一批反动军官就不可能起义，当时和平策反根本不可能进行，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在这之前的"重庆号"是在舰长率领下起义的，因此"重庆号"上没有枪杀什么人，是整个的和平起义。我们是士兵起义，情况不一样。

当时这场争论很大，这边的同志们都气极了。我不在部队工作，而且我也不是当时上海局的负责人，1979年我才刚刚出来工作，是上海市科委副主任的身份，身份不高。因此海军那边很藐视我，公开提出请我回去，说是这里没有你的事情。我说，怎么没有我的事呢？这就是我的事！幸好我认识福建省省委的统战部部长，他是过去松江地委的一个副专员，与我在苏南工作的时候很熟悉。当时福建省副省长许亚解放的时候是苏州地委副书记，我也很熟。我就去拜访他们，把这些情况一讲，许亚他们就理解了。这个会议正好是通过省委统战部出面组织，来做这个工作的。他们听后感到很有道理。他们还听到了一些起义士兵的反映，听到了陈仁珊的反映。

正式开会的那一天，许亚来了，统战部部长也来了。许亚说话分量就不一样了。他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说，这些都是当年起义的负责人，都是"有功之臣"啊！他还直接对着参加会议的海军政治部负责人说，上海同志来很不容易，来了就一道开会吧！大家见个面，一起商量一下怎么解决问题吧！经过他的这番话，海军方面才不好说什么。大家讨论的焦点还是起义是自发的还是党组织的？算不算起义？第二个，这些遣散人员现在应该怎么办？最后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了一部分，就是给被遣散人员中还活着的同志发放安家费。这些被遣散的同志在会上讲了许多情况，参加会议的省里领导同志都听不下去了。于是决定先发安家费。让谁发呢？就叫陈仁珊去发。所以后来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到福建乡下去找那些被遣散的士兵同志。有些人被遣散后找了些别的工作生存下来，有些人根本没有工作，只好到乡下去当个农民。那时给每人发500块钱。那个时候还算值钱，但也是不多的。

对陈仁珊的工作安排。一开始他做了副舰长，后来安排到上海海军的一个部门工作，最后做了厦门对面鼓浪屿基地的副司令。这是后话。陈仁珊跟我关系当然很好。但是，他后来灰

我目睹的中华民国

○ 王 蒙

日伪时期

提起中华民国，对不起，我首先想到的是日伪的“中华民国”，原因是日伪政府仍然自称中华民国，仍然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执政党”仍然名为国民党。不同之处是“国旗”上加一个小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和平”，意味着汉奸路线，不准抗日；“反共”，以此标榜，耐人寻味。回想起1942年3月日伪当局在华北推行的穷凶极恶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条口号就是“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正思想”，当时我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学校紧紧张张地要求我们背诵，说背不下来就有可能被“带走”，可以看出日伪势力是如何地视中共为心腹大患，为头号敌人。有意思的是，正是这种敌伪口号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做了铁证。

还有令人困惑的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原汪记的汉奸国民党党部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告同胞书》，大张旗鼓、大言不惭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并高喊“蒋总裁万岁”。原来说的是“汪主席”“陈(公博)主席”如何如何，眼也不眨，立马换成了“蒋总裁”，让少年的我大惑不解。此后，未见到处理汪记国民党机构的任何后续消息。

民国时期的语汇与官衔

后来报上出现了关于国府“接收大员”的报道。国民党贪官污吏当了大员以后颐指气使，化公为私，什么“五子(房子、车子、票子、儿子、金条子)登科”啦，什么发国难财、接收财、娶接收夫人抗战夫人(把沦陷区的夫人抛弃娶新夫人)啦，不一而足，这些事情，在报纸上爆料，使人深感失望。

大员，这是民国时期对于官员的一种说法。那时说到高一点儿的官员，还有要员、要人一类名词，对他们绝对不叫领导也不叫首长，而叫上峰、长官、×座(如局长就叫局座，主任就叫主座)，夸奖一个官员时说他“忠党爱国”，说部级副职时不叫副部长，叫次长，说到“汇报”，绝对只能叫“报告”。国民党的各级委员会叫党部，绝对不叫什么省、市、县委员会。而那些不学无术的国民党政工干部，被舆论称为“党棍子”，国民党召开的动员会长官讲话会被称为“精神训话”，某些

心之极，常发牢骚。我每次遇到他都不敢提当时的起义活动。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一场起义，当时我们都是准备牺牲的，却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还不承认我们！我们那么多同事一道搞的，我现在一个人做官有什么意思啊?！我没有办法向他们交代！没有办法面对他们啊！他还说，你看，现在国民党一架飞机起义过来，奖励几十万两黄金。我一艘军舰回来应该是多少钱？为什么国家就不算这个账？给我们起义的人这么点钱，还是争来的，还好像很照顾我们了，像施舍一样！他心里很难受，情绪非常消极，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联系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也不想去找。因为找他，他发牢骚，我没办法帮他解决。他也不想找我了。

后来上海的电影厂曾拍过两部电影，一部叫《长虹号起义》，一部叫《海魂》，反映了“长治号”起义的影子。当然，内容不完全一样，有些改变了。■

(周克：1917年生，1948年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81年—1986年，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部长，兼中共上海市委政党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　冯立三)

会议开始时的默哀，日伪时期称作“默祷”，国府时期称作“静默”。这些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很多词儿如领导、任务、组织、首长、汇报、总结、经验、教训、坦白、从严、从宽、贯彻、摸情况……都是解放区的词儿，国府控制区绝少用这样的词儿。现今一些描写民国时期的电视剧，一听里边的对话我就几乎晕倒，因为只要说上三句话就露馅了，剧中我党的谍报人员等于不打自招，国民党方面的人员也似乎是刚刚受过解放区的“洗脑”的“新生”人员，国共双方谍报人员满嘴都是老解放区的名词。

此外，其时将公务人员与教育界供职者称为“公教人员”，大体上是指工薪阶层的白领。民国时期称呼男人为先生、×公、公子、少爷、老爷、老板，称呼女人为小姐、太太、老板娘。小学时称老师为“老师”，中学以后称“先生”(不分男女)，称班主任为“级任老师”。称呼商家为“掌柜的”，称呼服务员为“侍应生”“跑堂的”，称呼管家、幕府人员、秘书等为“师爷”，称呼会计、出纳为“账房先生”，说到妓女称为“窑姐”，说到小偷扒手称为“小捋”，公安局叫警察局，派出所叫“段”上，女仆叫“老妈子”，男仆叫“听差”，家务劳动介绍机构叫“妈妈店”，机关学校的勤杂人员叫“管役”，这些用词与解放区、新中国的称谓完全不一样，差远了去啦。

1945年后国府有一项措施，我觉得很重要也很正确，他们招募一批语文教师去台湾推广国语，我最敬爱的小学老师华霞菱女士就是这样去的台湾。可以想象此举对于国家民族的意义。1987年华老师来北京探亲，1993年我去台湾开会，都与老师见了面，是新加坡友人傅春安先生(歌星包娜娜之夫)帮我在台湾找到的华老师。

民国报刊

当时北京有三家报纸我印象深刻：一是国民党党报《华北日报》，销路很差；二是民营报纸《平明日报》，销路不错，副刊上看到过萧乾、焦菊隐的文章；三是日伪时留下的《实报》，小开张，人称“小实报”，八卦新闻多，主编管翼贤，解放后1950年代以汉奸罪被处决。“小实报”的版面至少有三次给我留下了印象，一个是日本发动突袭

在平民中学读初中时，王蒙接受父亲的朋友、共产党人李新的建议，做了以“三民主义与四大自由”为主题的演讲，并获得北京市中学生演讲比赛初中组第三名

珍珠港后，宣布开始了“大东亚战争”，《实报》上登载有什么人摇旗助威庆贺(后随着战况失利日方更名此战为“保卫东亚战争”)。二是详细报道了枪决汉奸、间谍金壁辉即川岛芳子的情况，说什么金被处决前要求换上一身素白衣裳，被国府执法人员拒绝。三是报道冬季慈善粥厂开张的消息。我那时还能见到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1946年旧政协会议达成停战协议(没能执行)，《大公报》用头版通栏刊登四个特号大黑字“停战令下”，非常醒目。

说起民国的期刊，日伪时期不能不提到《三六九画报》，即每月阳历三日、六日、九日，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出版的娱乐小刊，封面多是名伶，即京剧坤角，如言慧珠等的黑白照片。该刊版面上我有兴趣的内容有郑证因的《鹰爪王》，叫作“技击小说”，没有叫武侠小说，还有白羽的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此画报社举办过短篇小说大赛征文，获冠军的小说题名《点绛唇》，是凄婉的爱情故事。

国府时期，有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主张

在共产党人何平的引导下，王蒙阅读了《铁流》《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纲》《新民主主义论》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著作。这些著作使他内心充满了对革命的拥戴。1948年10月，年仅14岁的王蒙在河北高中就读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图为王蒙(右一)与何平、秦学儒合影

第三条路线，我的印象是它的文字语言比较古雅与学院气，少年的我读起来比较吃力。另外在旧中国临近寿终正寝了，忽然出了一本《太平洋月刊》，主编姓耿，笔名"笑天"，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叫《列宁的叛徒与国父的逆子》，破口大骂完了国民党再骂共产党，十分吸引眼球，一下子洛阳纸贵，但没出几期，严正宣布停办，未知其详。

1948年，一家赔本的小报突然别出心裁，发行了套红号外，声称"共军"的刘伯承等已被"国军"俘获。为此，国府有关部门宣布此报造谣传播失实消息，欺骗读者，罚他们停刊一周(或更多)。其实，他们正是因为报纸办不下去了才玩这么一手"奇葩"，光这样一份号外，已经赚回了不少亏空，你不停它的业，它也早想洗手不干了。

我那时爱看报，许多消息是从报上得来的。1948年年初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当选为大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江南一家报纸说蒋中正当选为"小总统"，后来说是经查确系排版紧张所致，没有政治意图。"受害人"蒋介石也未提出诉讼，不立案。还有一事，中国国民党一个机关的牌子被示威学生换成了"中国刮民党"，于是一批人在报纸上表态，说是该党受到了严重污辱，令人哭笑不得。国民党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后报上登了许多对嫌犯的审讯消息，居然还大量刊登了他们对闻、李的咒骂，连"嫌犯"的捶胸顿足、情绪激动、流泪喊叫都有报道，似乎是在宣扬"杀之有理"。1946年美军皮尔逊强奸北大学生沈崇案发生后，各报纷纷连篇累牍地刊登对沈崇的妇科检查病历，污七八糟，观感十分恶劣。1947年四川说发现一个女子杨妹不需要吃饭，国府组织了国家级专家去调查，后来报上登的调查结果是在她肛门上发现有食物残渣，说明她不是不吃饭。为此引起媒体冷嘲热讽，说国民政府主导的我国科学专家的最大科研成果竟是人类必须吃饭才能生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关于郝鹏举的报道令人难忘。郝鹏举是个有名的变色龙，他在国共日伪之间来回反水。1946年年初，民国方面的媒体报道郝鹏举的日伪军部队要从"共军"处反正投靠蒋军了，可是没几天说是没有此事，并说是郝受到共军高级将领的看望宴请云云，个把月后又大张旗鼓地报道，说是郝司令当真投蒋了，数周后，却是郝司令被共军枪决了。

民国时期的报纸有一套专门语言，战事失利撤退，叫"转移阵地"，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打死，叫"自行失足"，其实"自行失足落水"的说法早就受到过鲁迅的声讨。那时的报纸还有一个说法，将大学生中致力于反蒋的学生称为"职业学生"，即他们不是学生，而是以学生的身份打掩护，专搞颠覆国民党政权的。根据我个人对旧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的了解，"职业学生"实属罕见，相反，地下党的要求是进步学生首先必须学好功课，才能在同学当中树立威信。倒是有几个"职业教师"，例如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校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杨伯箴同志，解放前在北平的身份是某校童子军教员。杨后来担任过北京师范学院院长，外交学院院长等职。

物价奇闻

日本刚投降时，万民欢腾，日军家属侨民狼狈返日，他们变卖家产，物价狂跌，百姓充满希望。但是很快，国民党法币与关金(国民党在东北发行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后来上涨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两小时粮价变一次，晚上比早上不知翻多少倍。房租也只好以值多少袋面粉计算，因为钱币转眼变成废纸。老板雇工有时也用袋装面粉发工资。

前不久播出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其中用

金圆券代替法币的事，那是1948年了，我记忆犹新。由国民政府限价，以某天为标准，一分不许涨。当时我已是高中学生，学校旁边有"老牛奶厂"门市部，家里给了我一点钱，我去喝点奶，虽然没涨价，但是越卖越掺水，奶也是越给越少，最后干脆永久打烊。

南沟沿往北就是北沟沿，现名赵登禹路，北沟沿与南沟沿（即今佟麟阁路，佟麟阁与赵登禹都是国军高级将领中的抗日烈士）交接处，被称为"小市"。随着物价飞涨，小市那边出现了一批穿着长衫，手里叮叮当当地撞击着两枚银圆的小贩，嘴里念叨着："买俩卖俩"，收购并兜售银圆，赚取差价与高价波动带来的利益。银圆多称"袁大头"，是袁世凯时代发行的金属货币，上有袁的浮雕半身像。还有一种银圆，浮雕是孙中山的全身像，被称作"站人儿"银圆，与"袁大头"相区别，后者行情一直高于前者。除了银圆贩子以外，在街边逡巡的就是些家有一点银圆的市民，多半是妇女和老人，也加入到此种生意中来。人越是穷，越要想尽一切办法给自己的财产保值，做着投机赚钱的白日梦。

百姓生活

那时失业人口极多，我们家住的西四小绒线胡同一带大多数人都没正经工作。有房的人家出租一两间，勉强维持生活。再有就是过往略有积蓄的人，靠卖上一辈的遗物维持生活。我不止一次听到这些邻居祈祷上苍，希望给自己以机会捡到一个装满大票子的皮夹。

那年月到处是垃圾堆，我在西四、西单、东单、北沟沿都见过大垃圾堆，苍蝇嗡嗡叫，恶臭扑鼻，小孩子在上面捡煤核，有时捡到残羹剩饭，就吃了。报上经常出现"由于误食垃圾鱼头一家人惨死"一类的消息。1946年年初我11岁，参加了国府第11战区政治部举行的中学生演讲比赛，我当时就说："看看垃圾堆上拾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哪里去了？"我的演讲稿得到了当时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任中共代表的叶剑英同志身边工作人员李新同志的指导。由于我的讲话的调门不符合主办者的要求，虽然我的演讲反响最热烈，连一个主持发奖仪式的军官都说"王蒙那个小孩讲话声如洪钟"，可是仍然只给了我第三名。

北平一解放，没过几天，解放军就用车拉走了所有市内的垃圾堆，真是说干就干，立竿见影，赢得了民心。

当时一般人是进不起饭馆的。人们买了食品，如烧饼油条等，都小心极了，生怕被饥民从手里夺走，他们啐了吐沫，你抢回来也不想再吃了。我记得我所接触的多数人家都没有床，最好的是用条凳搭板当床。当时臭虫横行，经常在夜里打开灯进行捉臭虫大战，旅馆墙上也到处是臭虫血迹。绝大多数人家也没有洗澡设施，最多是弄一盆温水擦拭一下。当然，社会上有澡堂子，一两个月才去洗一次，热水撩到身上，用手指一搓，下来的都是泥股截。

当时北京的大街是柏油路面，胡同里都是土路，俗话说"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我解放后在钟敬文教授家中看到过一幅字，上面有一句说的是在北京的生活感受："日日好春风里过，教人梅雨忆家乡"，意为北京的风水劣过江南的梅雨。那时北京下水道问题严重，大雨后有些地方水可没膝。雨后到处是蜻蜓，入夜则是萤火虫到处飞舞。那时候萤火虫多除了生存条件与此后不同以外，主要是由于电力少，常常停电，供电时贫民也舍不得开灯，给了萤火虫光芒四射的机会。小汽车很少，公共交通靠有轨电车，车上挤得连门窗上都扒着人。这种场面我1999年去印

民国时期的街头乞丐

度访问时又看到了。我们那时青少年普遍不买票，想买票也买不成。

当时卖一种大眼儿窝头，非常大，用刀切下来称斤卖。高级点儿的卖大油饼，一二尺长，切条卖。更高级的有豆面丸子炸豆腐泡，带汤，撒上芫荽末、五香粉、盐、酱油。早点除了豆浆，喝杏仁茶很普遍。

家里有了病人，像我家的水平，一是煮挂面，一是冲藕粉，上医院都是有相当层次的。我的一个亲戚，孩子发烧到39度多，没钱看，眼瞅着死了。当时医院多是教会的，医务人员穿着像修女。河北高中组织过透视，医生护士说话用外语，别人都通过了，让我复查，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记得那时当铺很多，我家不远就有“永存当”，我牙疼，父亲带我看牙，他让我等会儿，说进去取点儿钱，从当铺出来他的礼帽没了，我问“你帽子你帽子……”，他不回答。后来有一次，我指着这家当铺对母亲和其他朋友说：“我爸就在这儿领薪水。”母亲直掐我，我不知做错了什么。

民国街头，刺激人的还有乞丐的群相。我们居住的胡同里常有一个赤裸着上半身的女丐带着一个小女儿行乞，她的表现被认为是疯癫，有时小学生下学时看到她们，一些淘气的孩子就七嘴八舌地叫：“疯子，疯子！”这时女丐会惨叫一声吓得所有的路人疯跑。我不懂为什么那时候的孩子完全不懂得同情贫民与弱者。

有一种叫作“叫街”的乞丐，他们走的是骇人听闻的自我施暴苦肉强讨路线，见了他们估计有钱可给的乞讨对象，就用砖头砸破自己的脑袋，砸青自己的胸口，甚至用利刃划开自己的脸面，血流满面地跪下乞讨。令人不寒而栗。

还有一种乞丐，寒冬腊月，破衣烂衫，天色已晚，他睡到你家门口，吓得居民赶紧掏钱送食物，只求可怜人不要死在自家门前。

再有就是各种生理畸形或残疾的乞讨者，惨不忍睹。

这样的乞丐群相，我的感觉是历史通过他们在进行发动人民大革命的动员课，倾情发力，号召颠覆造反。一个国家，能够这样混下去吗？这里不发生，这时不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难道能发生什么温柔美丽的沙龙派对吗？

现在重温那时的北平旧照片，萧疏、陈旧、破烂、贫穷、饥饿，摇摇欲坠，是彻骨的绝望感。当然也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例如城墙、牌坊、灰瓦顶子、平房、四合院，还有那时不拥挤，全北平只有200万人，而现在是2000多万人，等等。再说怀旧就是怀自己的少年时代啊，谁能毫无这种向后看的波动呢？王朔有言，如果你是在监狱里长大的，中老年以后，你也会对监狱有所怀念的。但当时的我们恨不得引爆旧世界，把旧北平彻底翻一个个儿，《国际歌》的词儿叫“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终于等到到处是高楼大厦了，又会怀恋旧日的某些特色或遗憾于某些旧日图景的失落。文化就是这样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时时在失去，时时在创造积累。当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愤然！同时文化与生命时时在发展，时时带来希望，也带来新的挑战与不安。您不可能有多么踏实，您甭想着有多么舒坦……

学校经历

1945年我跳班上平民中学（今四十一中）初中，校长常蕴璞（字玉森）是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他工作非常负责，督导大家背“总理遗嘱”，多次在大会上讲“管学生必须体罚，一定要造成不守纪律孩子的肉体痛苦”。有时上课，我忽然听到后边啪啪打耳光的声音，异常恐怖，我们都不敢回头看，那是校长从后门悄悄进来，大打出手，打那些他认为不守纪律的学生。

南沟沿有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机构，一天级任老师通知我们班几个功课好的同学去那里座谈。我年龄小，一声没吭，听见几个大个儿学生提意见，说三青团员净是歪戴着帽子的纨绔子弟，和小流氓一样，给人印象不好。

我随后唾弃了三青团，去追求革命追求左翼思潮。我在国会街北大四院欣赏了大学生们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只觉得是惊天动地、气贯长虹，左翼意识形态尤其是文艺的气势压得国民党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1946年，我所在的平民中学，现北京第四十一中学，通知全体同学收听市社会局局长温崇信的讲话。他是公鸭嗓，南腔北调，全部腐朽透顶的国民党套话，没说一句明白话，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根本不会说“人话”，连我父亲在家听了此人讲话也

完全目瞪口呆，莫名其妙。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政权要完蛋，首先表现在语言上的撑不起门面来，简单地说，就是说不成一句人话。

当时的平民中学给我印象深的是音乐教员乔书子（音），他一面教着我们课一面晚间演出着歌剧，人的样子也极帅气。他自己也作曲作词，如“第一次的春雨，只是几滴，像少女第一次的眼泪，我问你，什么是你第一次的悲哀呢？”据说，他也可以教授“国文”。平民中学的校歌词曲也是他作的，唱的是“你是智慧的海，你是真理的灯”，追求高远。

教学楼前有几株大合欢树，一到放暑假的时候，红花盛开，着实难忘。

高中时我上了河北高中（简称“冀高”）。这个学校有革命的传统，“一二·九”运动中，河北高中的许多学生参加了以大学生为主的游行。荣高棠、康世恩等都曾在这个学校就读。1948年4月17日河北高中学生自治会成立，校内的中统特务和国民党警察局配合，大打出手，一次就逮捕30多个学生自治会人员，使学校进步力量受到打击。为此，我的地下党单线领导人对于我与另一位进步学友双双考入河北高中，补充进去，深为满意。我们的考入，使冀高增加了一个地下党的平行支部。冀高原校址现在是地安门中学，该校至今以每年4月17日为校庆。

我在冀高时，用复写方法办了一个刊物《小周刊》，手抄的，抨击社会不公，被校长穆庚寅找去谈话，说是办这种周刊会造成事件，下令取缔。但冀高仍有大量党员与盟员（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在活动，有两个平行的党支部，以便于与国府周旋。学校也有中统组织，他们以“暮鼓社”名义张贴大字报和“肃清匪谍”一类标语，但谁也不知是谁干的，鬼鬼祟祟。

1948年寒假，河北省教育厅在冀高办冬令营，伙食糟糕，白水煮萝卜，没油，苦的；房间里温度在零下，有炉子没煤，冷到极点。年龄大的学生到教室偷桌椅，劈了当柴烧。当时我家也是这样，冬天洗脚水、尿都会结冰。

1948年冬，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四野和华北野战军包围，国府方面在学校招募“自救先锋队”成员，意图垂死挣扎，与解放军拼命。后来这些人不战而溃，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惩处。

同时以傅作义为首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了包括军警宪三方面人士的执法队，打着执法队的旗子，开着卡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声称遇到“通匪”的“匪谍”，他们有权“就地正法”。

社会见闻

佟麟阁路上有一处警务机构，门口停着一些摩托车，配有穿军装的警卫，门内一处大影壁，上书“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与伟大口号形成明显对比，使我对古圣先贤的高论也不免疑惑起来。

当时还有一些类似的高调，动不动就喊“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还有“不成功，便成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童子军的军训是“智仁勇”，并用食指、中指、无名指行童子军礼，我当时就认为，这纯粹是自欺欺人，屁用没有。

那时社会上有少量舞厅，一般人进不起，也不认为那是好地方，当时对舞女的看法就相当于妓女。报上刊登武汉军政要人妻女与美国人跳舞，突然停电，女性受到猥亵、凌辱、强暴。

说到停电，民意机关参议会开会的时候，参议员们吐槽最多的就是这一点。当时的说法是北平的电力来自冀北电力公司的供应，此公司据说位于唐山一带，总经理叫鲍国宝。参议员与平民都在召开参议会时大骂鲍先生。解放后突然传出鲍总是我党地下党员的消息，不知其详。但从1949年2月北平解放以来，停电的事渐渐没有了。

当时主要的娱乐就是看电影。日伪时期我看过周璇、陈云裳、李丽华、周曼华、梅熹、吕玉堃主演的电影，国府时期更看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反映现实的进步电影，并知道了白杨、张瑞芳、陶金、赵丹等明星。

黄宗英主演的第一部影片《追》，我是在一个大礼堂里看的，当时的师大女附中校长石砢磊竞选参议员，为此，招待一批批师生看电影，一面放电影，一面打幻灯，为石女士竞选造势。我因为年龄小，远不够投票标准。

日伪时大烟馆都是公开营业，报子胡同和受壁胡同（西四四条、五条）东口就有店，大字写着“土膏店”，我当时还不知这是什么东西。国府来了以后，这种店立即销声匿迹。但私卖毒品的据说

仍然不少。有些小贩深夜叫卖,家里人告诉我,卖卤鸡与水萝卜是假,多半是卖大烟的。

日本投降后美军为了帮助“国军”受降,从天津塘沽港抢先登陆,那时在北平也能收到美军的电台广播。然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些士兵来了北京,为迎接美军,本来日伪时期规定人车全靠左行,突然改成了靠右行驶。

在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领导下,北平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北大学生自治会办的孑民图书馆,位于祖家街的北大工学院学生自治会办的六二图书馆,都提供了大量进步书籍,其中有解放区出版的赵树理、康濯、马烽等人的作品。

流行歌曲与进步歌曲

当时流行歌曲很盛行。有一个歌是《三轮车上的小姐》,说的是美国兵双人吉普车上的女郎,这么说的:“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装裤子短大衣……”其中有一句是“露出了白肚皮”。1948年年底,歌曲《夫妻相骂》流行全国,第一段是女的骂男的,“也没有金条也没有金刚钻,简直像殡仪馆”;第二段是男的骂女的,“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第三段是房东骂夫妻,“你们搬了来,天天都不安,不是男的叫,就是女的喊,这样的家庭简直是疯人院”。对于少年的我来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这两个歌就是中华民国的挽歌、送葬曲。

另一首颇有民国特色的歌是“我的心里两大块,左推右推推不开”,“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跟,要想回头看又怕难为情”,唱完两段以后是打口哨,当时的感觉是小流氓唱的。至于周璇的歌,乃至于《夜来香》之类的歌,就算极好的了。

艺术歌曲也有,郎毓秀唱黄自作曲的《天伦》,还有赵元任词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也很受欢迎。

还有两首歌值得一提。《春天的花是多么香》,现在成了国际比赛香港队的出场歌,其歌词本来是小资型的,“春天的花是多么的香,秋天的月是多么的亮,少年的我是多么的快乐,美丽的她不知怎么样”,现在变了雄壮堂皇的分列式进行曲了。一首歌的命运也如一个人一样,有它的不确定性,无厘头性。

解放前夕流行的歌曲中有“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赵家庄有一位好姑娘”,这是吴祖光作词,在香港最先唱出来的,被认为是迎接解放的歌。因为人们设想,山南山北,当然早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还有一首在学生运动中相当流行的丹麦(一说芬兰)民歌,“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逍遥……”,完全与政治无关,但最后唱道:“不远了,不远了,幸福的日子就要来到了”,成为青年学生迎接解放、盼望革命胜利的心曲。我想起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一个论断,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只局限于若干城市,出城数公里后,就不是国民党的地盘了。

恰恰是中国,从历史上就把战争的胜负与歌曲联系起来,项羽兵败,叫作“四面楚歌”。无怪乎王昆大姐曾经跟我说,一次老区的革命歌唱家聚会,大家激动起来,认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与革命歌曲的红火关系极大。我就此话题与原籍河南、后长期在台湾生活的诗人痖弦交谈,痖弦颇为首肯。他说,在台湾上中学春游时的一个苦恼就是无歌可唱,说要唱一个歌,马上被警告词曲作者是共产党,禁唱,换另一个歌,仍然不行,因为这首歌的作者也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指挥。

在解放前不久,媒体上还发生了批评曲艺演唱靡靡之音的事情,别的曲艺艺人不怎么应声,好像是连阔如还有曹宝禄对此进行了强力反驳。把社会风气不好归咎于大鼓、单弦、坠子,似乎没什么道理。而想到我国社会风气不佳时人们的谴责“靡靡之音”的习惯。也颇具特色。

1948年春天,在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下,平津两地学生组织了大联欢,一批王洛宾还有北师大老至诚教授作的边疆歌曲,《达坂城的姑娘》《喀什噶尔舞曲》《沙里蕻巴唉哎唉》《青春舞曲》等,就是在共产党组织的这个联欢中唱火了的。

我个人始终认为,当社会上广泛唱起《吉普车上的女郎》《夫妻相骂》的时候,当“赵家庄的好姑娘”与“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逍遥”的歌曲,当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与“太阳落山明朝依旧爬上来”也为革命所用的时候,中华民国这个政权确实是“气数已尽,无力回天”了。■

(本文由远方记录整理)

(责任编辑　冯立三)

六十五年前一次盛会

○ 袁 鹰

时光已过去六十五年,青年人都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者,当年的与会者绝大多数都已先后作古,但是那次盛会的洋洋暖意,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感受如同昨日。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礼堂地处闹市中心的西藏路八仙桥,九楼礼堂常常举行大型报告会等群众性活动。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我就曾在那里听过柳亚子、郭沫若等先生几次关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演讲,也参加过一些音乐舞蹈的表演会。当时在上海进步人士和学生心目中,“八仙桥青年会”是个熟悉而温馨的所在。

1949年6月5日,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上海解放才一星期,正值大局初定、百废待兴之际,在八仙桥青年会九楼礼堂,举行了一次上海开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盛会。刚刚率领三野大军解放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出面邀请一百六十多位教授、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界知名人士,欢聚一堂。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况,在上海生活多年的老人都是从来未曾有过的。据第二天《解放日报》以《为建设人民的新上海而努力,沪文化界昨盛大集会》为题的报道中,列举的名单有:

教育科学界:吴有训、周仁、陈望道、周谷城、潘震亚、罗宗洛、钟兆琳、陈鹤琴、茅以升、冯德培、钟伟成、杨铭功、杨卫玉、涂羽卿、曹未风、陈石英、蔡尚思、徐森玉、郭绍虞、李平心、张孟闻、吴若安、谢仁冰;

文学艺术界:巴金、冯雪峰、梅兰芳、周信芳、陈白尘、陈伯吹、章靳以、黄佐临、熊佛西、陈鲤庭、吴蔚云、赵丹、蓝马、石挥、秦怡、黄宗英、袁雪芬、刘开渠、庞熏琹、张乐平、陈烟桥、陈秋草、周小燕、谭抒真、陈知白、董天民;

新闻出版界:赵超构、周予同、杨刚、浦熙修、冯亦代、张明养。

这个集中了当时上海知识界“精英”的名单显然也还不完全,比如还有一些原上海地下文委成员、上海解放立即便参加“文管会”工作,穿上军装或未穿军装的于伶、黄源、唐守恩、郑森禹、陈虞孙、姚溱、刘厚生等同志,他们那天都作为座谈会工作人员,分别接待各方面的到会人士。许多与会者都经历了上海解放前那段紧张恐怖的日子,劫后重逢分外高兴,会场里洋溢着一片欢声笑语。

陈毅同志来到会场时,引起全场热烈掌声。人们不无惊讶和好奇地注视这位声威煊赫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和上海市市长。对绝大多数与会者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只有极少数进步文化人士三年前国共和谈时曾经在思南路“周公馆”见到过周恩来同志)。陈毅这天只穿一件白衬衫,一条普通军裤,像谈家常似的开始他的讲话,开口便称“诸位朋友”而不称“先生、女士”,一下子便拉近了同所有与会人士的距离。接下去几句坦率而又随便的开场白,就将会场严肃凝重的气氛一扫而光。他首先对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坚持斗争的文化教育界人士表示亲切的慰问,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上海解放的伟大意义。然后,就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教育政策做了详尽的阐述和解释,坦率地说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接管上海后面临许多困难,衷心欢迎文化教育界朋友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上海。他讲得实实在在,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大话,没有空头支票。一口气讲了近两个小时,四川口音更增添了风趣诙谐。洋洋洒洒,谈笑风生,使满场人士全神贯注,几乎都入迷了。会场上自始至终掌声不断。如果说开头时那掌声还具有一定的礼貌性质,越到后来,

就越是从内心发出的由衷赞佩。

三十年后，当时主持座谈会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军管会下属文管会副主任夏衍同志在《解放日报》发表一篇文章《从心底怀念我们的好市长》，是为了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而作的。文中深情地回忆那次长达四小时的盛会，他说："在这次会上，陈市长一口气讲了两个钟头。他的话是那样的深刻、具体而又幽默风趣。有人说，听了这次报告之后，上海的文化界就成了'陈毅迷'，我想这不是假话。"

此话千真万确。从1843年上海开埠一百多年来，几曾见过这种官民和谐的热烈场面呢?上了年纪的老文化人，也许记得从1927年国民党政府设"上海特别市"以后历任市长黄郛、张定璠、张群、吴铁城、俞鸿钧直到抗战胜利后的钱大钧、吴国桢的名字，或者也听说过其中某些人冠冕堂皇的文告，见过报纸上刊登他们的照片，却从未见过庐山真面目，更不用说当面晤谈了。只有今天，在解放了上海，才有可能同共产党的市长坐在一起，共商建设新上海的大计。当然，上海解放还不到十天，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对共产党的认识和观感还只是表层的印象，他们凭自己多年阅历，对共产党也不会那么轻信。由于听多了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污蔑宣传，其中有些人，难免还抱着敌意。今天，共产党一位高级领导人如此坦诚、如此率真地掏出心来同他们对话，人们自然就受到感染和感动，用自己的真情来回报了。原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先生，在陈市长讲完话后立即激动地从座位上起立，叙述自己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三次逼他去台湾，曾在上海闭门不出，隐蔽数月之久。他提出："苦干""实干""硬干"三句话，作为新时代的口号。陈毅市长不住地点头，表示赞许。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授激动地说：几个月来东躲西藏，提心吊胆，如果解放军不来，就会得精神病，现在总算被解放了，心里非常畅快。陈毅市长立即插话："不是被解放，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带枪的从外面打进来，是会师了。"几句话引起全场忻然。主持座谈会的夏衍请巴金同志讲话，巴金腼腆地站起来，一开口便说："我虽然也是四川人，却是个不会讲话的四川人。"全场欢快地笑起来，陈毅市长也哈哈大笑。整个会场洋溢着亲如一家的热烈气氛。

那次座谈会给上海文化界留下很深的印象，人们的心头如同吹过一阵和煦的春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真心诚意的，是平等待人的，是坦率友好的。我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有幸列席盛会，这样暖意洋洋的盛会，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一个时间，我不曾听说有第二次。

可惜，好景不长，盛筵难再。不到一年时间，1950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决策并亲自撰写其中主要段落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有如突然从九天落下狂飚，震得人们目眩神摇。从此知识界便遇到一场又一场冷风苦雨的侵袭，阵阵寒潮，二三十年间连绵不断，"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了。■

（作者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

（责任编辑　冯立三）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万~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 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6、57192223、57192229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文馨、牛萍萍、王双（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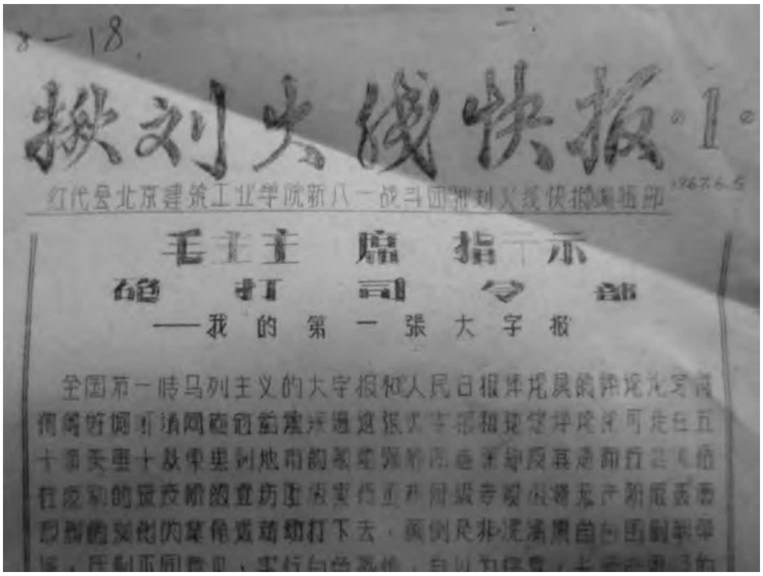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我参与处理“揪刘火线”

○　华方治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刘少奇同志被“一张大字报”打倒后，继续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全国规模的所谓“批刘”运动中，北京刮起了一阵小小的旋风——中南海外围的所谓“揪刘火线”。我因工作关系，知道此事件的全过程。


揪刘火线快报 1

红代会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揪刘火线快报编辑部 1967.6.5

毛主席指示

砲打司令部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7年6月5日第1期《揪刘火线快报》

事情的缘起

1967年春，在“全国大串联”之后，提出所谓“就地斗批改”。

五月的一天，中南海北门警卫报告：“有建工学院的四五十个学生要见中央领导，要求将刘少奇揪回建工学院接受革命师生的批判。”按照分工，由我前去处理。我赶到北门，先让他们选派代表并让他们的队伍离开大门，以维持大门的秩序，他们都照办了，我和他们的代表到北京图书馆前谈。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是个个头高高的女学生，她先谈了他们的要求，我根据当时对此类事处理的口径做了答复：“中南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办公的地方，为了确保安全，不宜很多人在此集结和停留，中央号召‘就地闹革命’，‘就地斗批改’，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写成书面材料，我们负责转呈，你们回单位等候答复。”

经做工作，他们很快将队伍拉走了。过了几天，又有建工学院的学生来到中南海西门提出同样的问题，我去做工作，说服不了他们。后来知道，他们是“新八一”，即当时所谓“造反精神”强的组织。反复说服不听，我们就采取冷处理，听其自便。那时府右街道路没大修，中南海西门至西北门分上下道，中间有一小岛，他们便在岛上搭了帐篷住在那里。

7月10日，据西门警卫报告，当天戚本禹坐车从西门出来，绕着小岛转了一圈下车问学生：“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学生答：“建工学院‘新八一’。”

问：“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学生答：“把刘少奇揪到学院接受广大师生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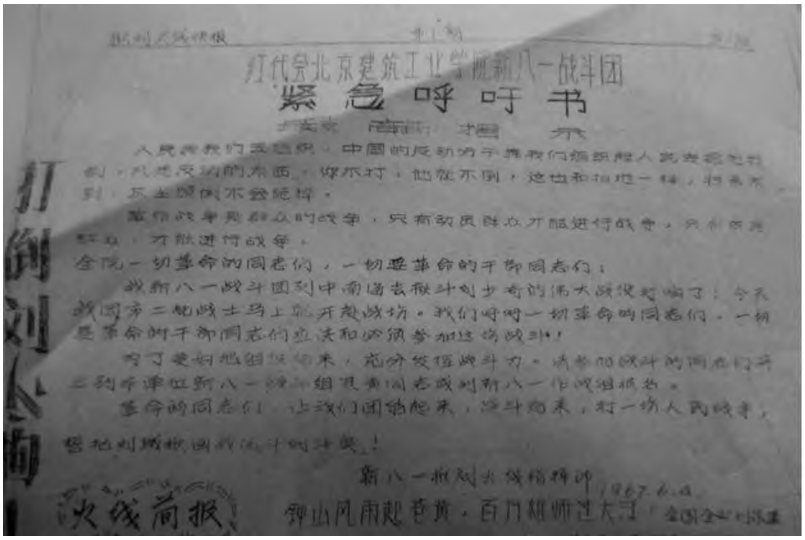
戚说：“你们在这儿多辛苦啊，你们还是回学校去，不一定把刘少奇揪到学院去，可以搞背靠背的批判嘛，让刘少奇写个书面检查给你们还不行？”

学生说：“行！”

这时学生很激动地呼喊起口号：“感谢中央文革对‘新八一’的关怀！”“感谢戚本禹同志！”

戚说：“你们的要求我会向中央文革反映，让刘少奇写个书面检查。”说完，他乘车离去，我去找秘书局接待组组长孙吉太同志，他说中央已定，“让刘少奇给建工学院写个书面检查。”

我听后对孙说：“材料写好一定不要交给一个组织，中央号召大联合，一定让他们派出联合代表来接，否则，一个个都来要‘检查’，你应付不了。”孙说：“对，一定让他们联合接。”


打代会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紧急呼吁书

全院一切革命的同志们，一切要革命的干部同志们：

新八一揪刘火线指挥部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新八一揪刘火线指挥部印发的《紧急呼吁书》

过了几天，是个星期日早晨，我骑车出中南海西门去铁道学院，走到西门北边一看，不好了，担心的事还是出现了，大墙贴满了"感谢中央文革对建工学院革命组织'新八一'的关怀！把刘贼的认罪书交给革命组织建工'新八一'"，在按语后面是刘少奇检查的全文，府右街北口贴着，西安门大街贴着，平安里贴着，西直门贴着。按语突出强调了中央文革交给"新八一"，交给"革命组织"，这是挑起矛盾的关键因素。

从铁道学院回来，我直奔秘书局接待组找孙吉太，见孙后我说："糟了！老孙，'新八一'已经把刘少奇的检查贴满了全城；这样，建工学院的其他组织肯定会来要刘的'检查'。一个月前，建工'老八一'到北门来，被我劝说走了。"孙此时也感到事情麻烦了，他说："自戚本禹见了'新八一'后，'新八一'他们每天几次打听刘的'检查'写好了没有，当我们拿到刘的'检查'后，他们要求看看，说他们在这儿坚持了一个多月，多么辛苦啊，还不让先看看。我说必须他们学院联合派代表来拿才能给他们，他们保证只是看看，不想他们还是抄写去了。"

正如所料，7月13日建工学院"老八一"带着愤怒的情绪涌向中南海西门。我接到报告，迅速赶到西门，按以往的方式向他们做工作，这次不灵了，他们根本不听任何劝说，他们说："上次听了你的话，我们回去了，他们'新八一'不听你们的话，在中南海待了一个多月，结果你们把刘少奇的'检查'交给他们，这是什么道理？"又说："这次，我们要采取最革命的行动，不把刘少奇揪出来，决不收兵！"这时有20多个青年学生到大门北侧墙根坐着，他们宣布："从现在起，进行'绝食'。"

开始坐着，后来逐渐开始躺倒了。此时，看热闹的、"支援"的越来越多，有的不是建工学院的也加入了绝食的行列，陆续地，有的打着旗子的单位也来"支援"，"老八一"的人继续增加，有的绝食，有的演讲，讲他们绝食的原因，讲他们绝食的决心，吁请一切革命的人们支援他们的"革命行动"。

这时天渐渐地黑了，中南海西门外已是人山人海，绝食者开始有出现昏迷的；北大医院的医务人员前来救护。后来，绝食人员增多，救护人员显得不够，别的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来了，绝食者在继续增加，昏迷者被陆续送走，救护车的警笛声不断，有组织的、"看热闹"的也在猛增，府右街交通受阻，已成了人的海洋。

遂成高潮

府右街的事件，没有官方的传媒工具，仅靠一张嘴或者加上有线电话，就在一夜之间传遍京城和北京附近的城市和省份。绝食的没有了，都送到医院去了，但有组织和无组织的人却蜂拥而来，都以能到西门外占有一席之地"为荣"；有的搭起了帐篷，插起了本单位的旗子，张贴大字横幅"××揪刘火线联络站""××揪刘火线指挥部"……大刷标语，各组织传单、小报，到处分发，到处传递；通过串联，成立了"揪刘火线联络站"，推举了头头，有的把本单位本组织本系统的批斗对象揪到现场批斗。据我所记有：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北大工作组成员彭佩云，安徽省第一书记李葆华，八机部党组书记黎玉，纺织部部长钱之光，还有桃园村原支书吴×，他是来控诉王光美在桃园搞"假四清"对他的"迫害"；纺织部机关的造反派把钱之光揪到中南海西北门外，挂一张大芦席，贴上"纺织系统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钱之光"，钱之光倒写着，还打上红叉，钱之

光被太阳强光暴晒着站在大标语下示众。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和秘书局接待组从海军借调来的老刘商量,劝说他们不要这样搞,这样影响不好。老刘同志和我的看法相同,他也认为不好。于是我们就去找纺织部造反派的头头,一个四十来岁,身体较胖、干部模样的男人接待了我们,老刘首先介绍了我们是警卫部队和中办秘书局的人,并讲了对他们做法的意见,希望他们不要这样搞,这样影响不好。他听了我们的意见后很不高兴,说:“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你们好好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看来我们对毛主席的著作没有他学得好,不过他学了是为了取其所需,对付别人。

增援“火线”的队伍在继续增加,不仅仅是北京范围,北京周边的天津、唐山、承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等城市都有群众组织来,就连山东、辽宁等省也有。当时统计,大大小小的组织1000余个,帐篷搭满了府右街两侧,就连灵境胡同、枣林大院等周围的胡同里都搭上了帐篷,有的一个帐篷几个单位。一片帐篷的世界,人的海洋。

“火线”不仅组织多、人数多,“火力”也在不断增强,开始少数单位装了广播喇叭,后来没装的单位也效仿起来,把最大的喇叭都拿了出来。据统计,最多时达600多个高音喇叭,一齐开动起来,中南海机关被吵得根本无法办公、休息,连中南海周围的居民都无法生活休息。你还不能提意见,因为他们是“革命行动”,谁敢反对“革命行动”?

高音喇叭就在周总理墙外高叫,吵得总理和邓大姐无法办公、休息,工作人员劝总理暂时换个地方,总理不同意,说:“他们就是对着我来的。”的确是对着周总理来的。就在闹得乱哄哄的当口,从府右街通过的14路汽车撒下的传单上写着:“(大意)中央的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被彻底摧垮了,但是旧的政府依然没动,他前几天还在保那个司令部里的第二号人物。”署名是“5·16红卫兵团”,此传单当时已上缴领导机关。

根据群众向我们报告的情况,“火线”策划组织人员要冲进中南海,架走刘少奇,他们做了精细的研究部署,冲门的分几个梯队,直接揪刘少奇的,还准备了几辆小汽车。据说,有一个曾在中南海施工部队任职的干部向他们提供了刘少奇住处的方位图。我们将此情况报告给中央负责同志,随后得到指示:“一定不能让他们把刘少奇揪走。”部队做了充分的准备和部署。

在此期间,部队进行了一些宣传和爱民的活动,增强军民关系,派出了宣传员向各组织宣传毛泽东思想,具体就是宣传群众“大联合”,“就地斗批改”,“就地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同时掌握群众组织的动态,如:要冲进中南海揪刘少奇的行动,就是群众主动向我们反映的。中南海的警卫部队还为群众送开水,派医生为生病的群众看病送药,这些行动都直接为保卫中南海的安全起到了作用。

狼狈地撤离

据说,毛主席大江南北巡视回京后,对围困中南海的行动提出了批评。8月4日突然接到通知,中央文革要在西门给群众讲话,于是连忙准备了大卡车,我记得陈伯达、谢富治、叶群等在西门下了车,又踩着凳子上了卡车。陈伯达讲话,大意是:伟大领袖号召大家要“大联合”,“要就地闹革命”,“就地斗批改”,要立即统统撤离中南海,一个也不留;谢富治也讲了话,说:不要揪刘少奇了,中央安排在中南海里分三个会场,由中南海群众组织分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批斗的过程拍成纪录电影放给大家看。大家从现在起,马上撤离中南海,越快越好。散会后很多单位在拆帐篷回家。陈伯达、谢富治一直在监督撤离行动,深夜了,还在检查督促,当看到有的行动迟缓,想等到明天再撤的单位时,陈伯达火了,气哼哼地说:“我们搞过武装斗争,搞过土改,搞过多种形式的革命,什么时候像你们这样搞过?你们这不是在搞革命行动。”还骂他们是在“丑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给文化大革命抹黑”。

在这种气氛下,帐篷很快被拆除搬走了。轰动全国的极“左”闹剧——围困中南海长达近一个月的“揪刘火线”,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一顿训斥而告终了。■

(作者曾任中央警卫团常务副团长)

(责任编辑 冯立三)

我所接触的江青

○ 张国男

1946年在昆明父亲李公朴被暗杀牺牲后，我随母张曼筠带着弟弟回到上海。就读上海法学院高一，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47年到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二。当年参加了地下新民主义同志会。1948年10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全家由香港经天津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解放区石家庄，被分配到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并加入了共产党。结业后分到该校外语系学俄语。1949年北平解放，我随校来京继续学俄语。1951年年初，军委卫生部北京医院来了两位苏联院士教授，是为中央首长看病的，急需两名党员翻译。我和陈复君同学(从延安来的年轻党员)就这样提前一个学期毕业，脱下了灰制服，换上了绿军装，担任起北京医院保健翻译的重任。

1952年夏的一天，我接到准备去苏联出差的命令：陪江青赴苏联治病担任翻译。临行前，军委卫生部傅连暲部长亲自找我训话：出差期间不能和家人通信，有信由大使馆信使传达，不得告诉任何人出差具体任务，这次不仅要当好翻译，还要做好为江青的服务工作，回来后直接向我汇报。

9月6日脱去绿军装换上红花连衣裙的我被送到南苑机场，已有一架苏联专机在做起飞的准备。突然看见毛主席和江青从车上下来，我作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俄文专修学校学员，有时，周末被挑去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做舞伴，我和毛主席跳过舞，这是第二次见他了，感到意外的是他亲自来送行。我当时想毛主席对江青真心关爱。近四十岁的江青穿着得体，走起路来腰板笔挺，有风度，没有化妆，看起来令人感觉很舒服，对人亲切平和，打消了我紧张的心情。

苏联的专机很讲究，有卧室和客厅，从飞机起飞这一刻起，我跟着江青开始享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飞机飞到中途在伊尔库斯克停几小时加油。然后继续飞行，到达莫斯科已是傍晚了。坐着一辆黑色吉斯车来接的是苏共中央对外联络处的中文翻译娜斯嘉·卡尔东诺娃，这种车所经之处红灯立即变绿灯放行，这是苏联政治局委员的待遇，车直达克林姆林宫医院(中国同志称之为“皇宫医院”，只接待国内外高干)。病房分里外间，里间是一大间，为病人住的，外间是一小间，为陪伴者住的。那里已有一位保健大夫等在病房，立即为江青做了长途飞行后的最必要的检查。经过几天检查，结论是江青患有胆囊结石，结石呈泥沙样，需进行胆囊冲洗治疗。病人向右侧卧，将一根细长的橡皮管从口腔插进胃经幽门直到胆囊内，让管头顺利进入胆囊是个难点，必须要摆好合适的姿式，引流管才能顺利地插入胆囊；在引流过程中，她口含着管子经常要说话，开始我听不清楚，没法翻译，医生着急，病人更着急，影响了正常冲洗，幸亏我适应快很快就能听懂了。几个疗程后泥沙几乎看不见了，按医生建议，我们来到高加索的索契专门进行泥疗的疗养院，每天用黑泥敷在江青的腹部进行泥疗。

2月，回到莫斯科“皇宫医院”不久林利也奉命来到了医院，林利是中央老领导林伯渠的女儿，1938年6月高中毕业被送往莫斯科学习，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延安。1949年后多次随高级代表团出国。1949年她任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翻译，结束后被留下为江青第一次到苏联治疗任翻译。1952年秋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林利任翻译，大会后她陪同少奇夫妇去高加索的索契治疗，江青正好也在那里做泥疗。江青碰上了林利并对她说，和他们一起有什么意思，不如和我在一起好。回莫斯科后江青要当时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找林利谈，要她留下陪江青，她不得不放下列宁《哲学笔记》的翻译工作留下陪江青。

这次我们住的病房除病人的卧室外另有一大间供陪同人员起居，另有小客厅兼电话间，也是医生护士办公室。苏方派了两名警卫员轮换值班。林利觉得江青毕竟不等同毛主席，她是来

治病的，林利就建议江青主动向苏方提出撤掉专门的警卫员，她面色不悦，但也同意提出，当时苏方还是坚持给她派警卫员。

3月5日早上护士为江青抽取胆汁化验做准备，如一切正常就可以回国了。这时苏共中央联络员卡尔东诺娃冲入我的房间，要马上通报江青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我要求等做完胆汁引流再告诉她，不然一紧张就做不成了。林利也和医生说好暂时瞒着她。卡尔东诺娃边哭边说，今天全世界都应知道苏联人民和党所遭受到巨大痛苦，是党中央派我来专门通知江青这个噩耗的。她走进江青房间要林利给她翻译，还说林利和医生决定暂时瞒着她，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江青顿时大哭，边哭边对林利拍桌子，说不该瞒她。医生等她冷静后仍给她做了胆汁引流，居然抽出来了。事后江青对林利说，她理解林利和医生的好意。

几天后苏共中央联络部正式通知江青带着我和林利到圆柱大厅为斯大林守灵，虽然是短短的几分钟，斯大林的遗容已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

此后江青自觉症状不佳，肝区常痛，计划天暖后去南俄疗养。林利趁机把国内单位同事希望她回去工作的多封信给江青看了，她大为生气，大骂中共中央编译局领导师哲，说是他组织这些人写的信。林利后来动员了苏方的保健医生、护士长以及我都来劝她放林利走，江青总算同意了。到起飞的那天，江青号啕大哭，就不放林利走。这时医生、护士长变着法儿让江青的歇斯底里发作停了下来，终于放林利走了。临走时她对我说：江青说你爱人是沈钧儒的秘书，是党内的民主人士，并说你的社会关系复杂。当时我和林利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她这么看我。直到"四人帮"的材料曝光后，才知道江青最忌讳提到她的前夫之一唐纳。蓝苹和唐纳、赵丹和叶露西、顾而已和杜小鹃三对打算同时举行婚礼。到杭州六和塔下结婚是"才子"唐纳的主意。他们聘请了上海著名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著名导演郑君里任司仪兼摄影师，三对新人和沈老拍的相片，我还看到过。还有郑君里在文革中被江青整死，也是沾上了唐纳的缘故。江青在文革中通过叶群去郑家及其他四位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知情人家，为了查抄出一封信。1957年，毛主席的《蝶恋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轰动一时。江

江青与本文作者（右）1953年在莫斯科巴拉维赫疗养院

青对毛主席说："你想杨开慧，我还想唐纳呢。"她一怒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索要唐纳在法国的通信地址。在一次和江青聊天时我随口问了一句唐纳现在怎么样了？江青脸色一沉，没做回答。这就是我被她戴上了社会关系复杂帽子的原因。

养病期间她经常调电影来看，我印象最深的是译制片《红与黑》，我幸亏看过这本名著，边看边翻译，凑合过了一关。看过苏联国产片《第四十一》后，她对我说：这部片子是禁演片，可惜了，男女主角演得真好！她对我说过胡乔木要她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帮着审察电影。我首次听到拍电影的一些术语，如蒙太奇、淡出淡入，是江青给我解释的。江青曾去大剧院看过一次芭蕾舞，人民演员乌兰诺娃正在表演《红罂粟花》，江青很反感地说：这是侮辱中国人的戏，我们不能去看，普列谢茨卡娅是仅次于乌兰诺娃，是功勋演员。我们坐在莫斯科大戏院的包厢内欣赏了普列谢茨卡娅主演的芭蕾舞剧《喷泉》。另一次去观看了最有名的歌唱家、人民演员达拉索娃主演的《三姊妹》。演出后她嘲笑地对我说：唱得不错，但形象太差了，那么胖，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想中途出来，又怕包厢突然空了影响不好。

江青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很敏感，和周围人接触中，凡是有人在说话中带有自夸的味道，她就说：你看他们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多明显，我们在他们面前也不能示弱，必要时也要反驳几句。她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在这里一切待遇是政治局委员的标准，在别墅每人是按100卢布一天供应，住医院另算。江青一次对我说：我们在

这里的开销他们都管，我们国家外汇少，我们都不要领出差费。有一次她从信中得知帮她料理家务的姐姐之子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她让我帮她接通汪东兴的电话，我听她在电话里追问她外甥是怎么进这所大学的，直到对方肯定地答道，是自己考上的，她才放心地放下了电话。她对我说："我们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影响。"那时的高级领导还真是以身作则的。我感觉得出，在任何场合她都考虑影响，她穿着得体，头总梳得溜光，她虽然有罗圈儿腿，但走路时全身笔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也有吃相，保持她特有的风度。讲到吃相，她对我这样狼吞虎咽看不惯。江青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如何吃西餐："闭着嘴吃，不要吃出声音，吃面条一类要用叉子先卷一个小卷，整个放在嘴里等。"

在疗养院的游泳池里我教过江青游泳，她是初学，我从漂开始教，她像小学生一样，很听话，很大胆，完全按照我教的动作去做，很快就学会了蛙泳的基本动作。

江青估计不会在苏联度过夏天，因而我们只有冬衣。她让我给汪东兴打电话，找王光美给我们俩选几段做连衣裙的绸衣料，她提出了几种颜色。因为王光美审美观较好。买好后托访苏代表团带来。苏共中央有专为高干做衣服的裁缝，夏装很快便做好了。夏天来临后，江青带着我和两位保卫人员坐着火车来到了黑海边著名疗养地雅尔塔，住进一座漂亮的别墅，这是在二战期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巨头开"雅尔塔会议"住的地方，我们住的曾是罗斯福住过的别墅(利瓦季亚宫)，离海边很近。每天最高兴的是去黑海里游泳，那段时间，好像是给江青专用的带有大石头的沙滩，还有停靠小船的设备。在此游泳，一下去站不到底，江青坐在岸边椅子上沐浴着海风，看着我在黑蓝色的海水里畅游。有一次浪比平时大一点，我游得也远点，她在岸上看不见我了，着急了，不知怎么和保卫人员说通的，保卫人员划着小木船急忙地来找我。此后她不让我游得太远，怕出危险。

1953年江青在雅尔塔黑海边

整个一座大房子除了两位保卫人员、一位厨师和一位女管家，别无他人，江青只能跟我聊天，这段时间的确谈得很多，可惜时隔六十多年，我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记忆力一向不强，只能回忆起某些印象深的内容。她说："父亲是个木匠，喜欢喝酒，醉了就打妈妈和哥哥们，我最小，没有挨过打，我有时在学校正上着课，好像听见我妈妈的呼救声，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刺激，小学毕业我就离开了家，到一个戏班子学京戏，在那种旧戏班里受了不少苦。后来到了青岛，在大学的图书馆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我曾旁听过闻一多先生讲课。党组织派我去上海在工厂做女工，在工人夜校教书。后因怕暴露身份，让我打入戏剧界。我曾经主演过《娜拉》《大雷雨》，都很轰动，我的艺名蓝苹从此出名了，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原名李云鹤，我的女儿跟我姓叫李讷。贺子珍不喜欢孩子，她的女儿娇娇，是我从农民那里要回来的，也随我姓，叫李敏，很小就送往苏联，回来后中文都不太会讲，她不愿去她妈妈那儿，喜欢在我们家。"交谈中她常标榜自己处处向主席学习，如学他写字、签名。曾当场写给我看，问我学得像不像，听到我肯定的答复时，她显得很得意。她也学主席多读书。江青还说："我们在中南海住的夫人们是一个党小组。"在雅尔塔休养期间是她情绪最好、最平稳的时段。

整个夏季快过完了，两位保卫人员都让我向江青提出该回莫斯科了，因为天气已凉，对健康不利。不知为何她不同意。过了几天，他们又要我向江青提出回莫斯科一事，她勉强同意了。8月份的莫斯科气候已像北京的深秋，江青因两地温差较大而有点感冒，她把我叫去生气地说：就是你和保卫员自己都想早点回家，串通一气编一大堆理由，催我回莫斯科。我回到房间后委屈地大哭了一场，怕惊动了周围服务人员，不敢大声哭。我生性有点男孩子

气，我父亲死去曾大哭了一次，后来就没有再哭过。这次江青从我红肿的眼睛发现我哭过，责备我不顾影响，周围人一定认为我受了她的欺负。

9月初总算盼望到了回北京的日子，她特别对我说：我知道你回去后，傅连暲会找你谈我的情况，我不喜欢这个人，他什么都想管，都想知道。除了病情，别的不要说。真给我出了道难题，我到底该怎么汇报。

1953年在巴拉维赫疗养院（左起：林莉、苏方保健护士、江青、张国男）

我们又是乘的专机，是苏制图-104喷气式飞机，由一直负责给她治疗的保健女医生和两位保卫员护送。这次直达北京。出乎我们这些陪同意料的是，飞机还没停稳，便看见毛主席已向我们招手了。我们跟在江青后面走下飞机，毛主席依次和大家握手，我介绍完三位陪同后发现飞行员也过来了，毛主席一面和他们握手一面问："我还没有坐过你们的喷气式飞机，我可不可以上去坐坐？"机长连忙答道："当然可以。"毛主席大步走向飞机，上去坐了一会，下来后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也算坐过图-104飞机啦！"几天后为答谢这次为时整一年的治疗和休养江青宴请了全部陪同成员。我向傅部长做了汇报，得到了对我工作的肯定，总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55年年初我大女儿王力平降生了，由于母奶充足，孩子发育很好。5月初接到了再次陪江青赴苏联治病的任务，这意味着我要忍痛断了我宝贝女儿的最佳口粮。因行期近，要想办法紧急断奶，按我院的苏联专家办法：用绷带紧束胸部。发着烧的我随天津著名妇科专家俞霭峰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一向不晕机的我在飞机上大吐不止，反而受到俞教授的照顾。本来是由协和医院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为她诊治，她感觉林教授手太重，说话不温柔，不喜欢她，所以挑了俞教授，这些是我后来听说的。我们紧急赴莫斯科是为江青赴苏治疗子宫颈癌打前站。我们首先到了莫斯科全苏妇产科学研究院妇产科临床医院。俞教授和苏联专家们研究了江青的病情，确诊还是原位癌前期，无须手术治疗。定下了做子宫颈局部的放射治疗，江青同意了此治疗方案。当时北京医院著名内科专家吴洁带着我院翻译徐五凤要来参加学术会议，正好顺便陪同江青乘飞机来。江青还留他们在别墅住了一天。这次还派了北京医院一名在江青身边工作不久的保健护士员林爱。不需要翻译的时候由员林爱照顾她。每天吃饭都是俞教授、我和小员陪着她，她和俞教授交谈多，我觉得她谈吐得当，态度和蔼，没过几天，江青突然对我说：你想法暗示俞霭峰可以回国了。我想不知俞教授何处使江青讨厌了，俞教授很快就离开了。接着林利在北京又一次接到中央的命令作为江青的陪伴来到了别墅，她看到这里已有护士员林爱和我，林利真觉得不是滋味。江青这次做化疗有反应，情绪差，脾气也不好，林利想法进了一次城找到正在莫斯科的周总理，说了回京的充分理由，也没有得到总理的支持。然后她直接向江青软磨硬泡，最后，她终于答应放林利带着给毛主席的家信回京了。

这次有员林爱在我就轻松多了，尤其是晚上帮助江青入睡的任务，我可以摆脱了。回忆起第一次一整年的情景：江青入睡困难，每天睡前她躺下后背下要斜垫个枕头，半躺着，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两人打扑克牌，打的是在苏联学的名叫"傻瓜"的最简单，不用费脑筋的一种打法。有时长时间她不能入静，她出一张我出一张枯燥无味，常常我比她先入静，我困得不行，也得硬撑着打下去，如果让她看出来，她会不高兴。夜间有时也把我叫起来。总之，每天晚上是我最难熬的时刻。本来一躺下就能入睡的我，也开始入睡困难，回国后多年我经常服用味极苦的水化氯醛帮

我入睡。这次印象最深的是夜里被员林爱叫醒，一只很大的绿蝇在江青的睡房里嗡嗡叫，飞个不停。在苏联被告知这里都是卫生蝇，因为他们国家没有传染病，所以不备蝇拍，更不会有杀虫喷雾剂，别墅的房间又高又大，我们两个矮个怎么可能打得到这可恨的家伙。江青只有多吃安眠药度过此夜。第二天叫了保卫人员才赶出了这个“入侵之敌”。

江青没有住院治疗，而是每次到妇产科临床医院去，将带放射性钴的小棍放在子宫颈口内进行治疗。整个疗程不长，但她的白血球迅速降到两千多，此后想尽办法提高白血球。她抵抗力极度下降，真叫是弱不禁风。医生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她不要感冒。室内保持恒温，外出散步江青要求不仅要看温度，风力大小，还要看风向。出门前要擦干身上的虚汗，穿衣要动作轻和慢，不能再让她出汗，否则就得坐下等汗干。这次除外出去医院治疗外，没有出过别墅院子的大门，后门是一片草地，有几次看见了邻居住的苏共中央政治委员勃涅日列夫，他向江青点头问好。

江青在此邀请过随中国艺术团赴莫斯科的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到别墅来共进午餐。来之前她对我说你不要对苏方人员说来客的身份，当时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怕人知道她要见一个演员。后来我想是她对自己学过京戏以及30年代演员的身份不想让人知道。用午饭时，她让我和员林爱把饭厅的两边门都关严实。席间，她对程砚秋的艺术表演才能大加赞扬，午餐结束后，她问程先生能否清唱一段《荒山泪》，这是她最欣赏的一出戏。程先生轻声清唱了一段，江青带头轻轻地鼓掌。她对程先生说：我今天很荣幸，能如此近距离听到程先生的清唱。我所以欣赏程先生的戏，是因为程先生能根据剧情和你本人声音条件来改变原来的唱腔。我喜欢你的创造精神。在对京剧中青衣梅程两大派的爱好问题上，我曾和周总理争论过，我欣赏你的戏，我是程派，总理欣赏梅兰芳的戏，是梅派，是保守派。客人走后她还强调地对我讲，梅兰芳唱戏因循守旧，没有创新，总理倒喜欢。

周总理对江青也十分关心。他每次到莫斯科，不管多忙，都要抽空来别墅看望江青。告诉她国内发生的大事，如高岗、饶漱石事件。询问她需要些什么。总理注意到江青想吃绿叶子菜，他回京后不久，我们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说已托人带了一箱新鲜蔬菜。收到后江青让我告诉厨师，这些菜他们不会做，她要亲自示范。我陪她到厨房去炒了一盘菠菜，还给厨师和在场人员都尝了一口，得到一片赞扬声。此后苏联的厨师也学会炒蔬菜了。

一晃半年，江青的白血球还是上不来多少，决定还是回北京找中医治疗。员林爱一直护理带着放射线的江青，和她接触最多，也没有保护措施。她本来出身就苦，12岁打工养家，身体底子差，她的白血球也降到了两千多。另外因为那时出国必须穿裙子，她两腿受寒，起了好些红点，患上了风湿。这次临回来前，她让卡尔东诺娃买了一个苏联制造的坐着的黑熊玩具送给我的女儿，捏上发条头，上面的两只爪子就能动。我想她这是给我丢下哺乳的女儿陪她来治病的补偿吧。“可当我回到家里，看见因断母奶改吃牛奶满脸红疹的宝贝女儿时，一阵酸痛涌上心头，她也不认识我了，我匆忙地拿出小黑熊，拉近了我们母女的距离。”员林爱后来这样说。

1956年5月，江青做放射治疗整1年，需要赴莫斯科复查。复查结果令人满意。她自觉精神也不错。苏共中央安排了一次江青和苏共领导人夫人的会见，祝贺她病愈，一共是四位：当时斯大林的接班人苏共总书记马林科夫的夫人、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的夫人、赫鲁晓夫的夫人和米高杨的夫人。马林科夫的夫人是四人中较年轻的，她说她是电力学院的院长，她问江青将来想做什么，学过什么，当她知道了江青的学历不高，她对江说：你可以留下到我们学院来上学。江青听了先愣住了，然后回答说：以后有机会我就来你们学院学习。这次交谈看来并不投机，时间不长就结束了。回别墅的路上坐在车里，江青对我说：这几位夫人都太没有水平了，尤其是马林科夫的夫人说话太没深浅了，让我去她的学校去上学，太可笑了，她太傲慢了。赫鲁晓夫的夫人还较为朴实和霭。这次会见大伤了江青的自尊心，住了三个月就回北京了。此后四年见过江青大概四次，头三次都是她来北京医院做胆汁引流，叫我的原因一是她认为我能知道什么样的卧姿引流管能顺利进入她的胆囊，二是她口含引流管时说话我能听得懂。记得其中一次是我院内科张惠芬主任叫我去的，她那无奈的样子至今我还

从《邓小平论文艺》到《邓小平论文学艺术》

○ 阎 纲

在已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袖人物的“论文艺”的选编书籍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的《邓小平论文艺》问题最大。

该书编者(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在《编后记》里特意解释说，这本书是1987年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时编成的，“八月编成，经我部领导审阅后，十月铅印送审本，送中央领导审核。”“12月初，传下话来，说邓小平同志从政治上讲文艺讲得多，从艺术上讲文艺的讲得少，这本书不出了。”及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标志着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我们的心情为之振奋，于是又想起了《邓小平论文艺》一书，增补了最近的一篇讲话和几段论述。经领导批示同意，这本书终于得以出版了”。编者严正指出：“近年来，许多人鼓吹所谓‘回到文学自身’”，“由动乱发展到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那些呼喊‘回到文学自身’喊得最响的人们，有许多不就是在那里搞他们的政治吗？”最后厉声反问道：“从政治上讲文艺难道就不对吗？”

政治家“从政治上讲文艺”顺理成章，十分正常，问题在于政治观点与文艺观点在小平同志笔下如何融会贯通，而不是集政治语录和文艺语录两大块让读者自己去组合。

编者只讲对还是不对，回避了到底多还是不

有印象，她说：我们做胆汁引流无数次，她还担心我们的技术，非要我来叫你去。最后一次是1959年，我在和江青说话时流露过，我跟的最后一位神经内科苏联专家也走了，别的翻译以前都学过医的，都已转行去做大夫了，我只是学的俄语，我很想去上大学学一门专业。

这次和江青见面不久，正值春节，我突然接到通知：江青请我到中南海她家吃晚饭。我按指定的时间，从家里骑着车到了中南海。使我意想不到的是毛主席也来一块吃饭。毛主席问了我一些问题后，他对我说：从工作中就能学到知识，要多读书，才能学到更多更广的知识。不一定要去上大学，我就没有进过大学，江青也没有上过大学嘛！这顿高级别的晚饭是江青安排的。明显是为了打消我上大学念头。也许有点表示对我多次为她服务的一点谢意吧。

1960年根据院党委的安排，我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学习一年，回来担任病房专职党支部副书记、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算是中层领导干部，造反派让我在病房擦地劳动。1967年原朱德总司令保健卫士魏琳给我看了一个小本，上面记录了汪东兴和保健局局长黄树则与上海两位专家对江青的会诊意见：客观检查，没有像江青主诉的那么重。我因看了写有江青病情的小本，认为有泄密之嫌，被关进了医院的地下室10个月。最后以泄密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留党察看两年。而魏琳比我更惨，在秦城监狱坐了六年的牢。

1969年，我到五七干校，年终被北京医院连队评为优秀“五七”战士。头上的光环戴了不到两个月，春节回京休假的连领导给我带来了一顶“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又被禁闭了半年，变成了专政对象，参加劳动三年。

1973年回院后，我被分到图书馆任馆长，参加了图书馆学会办的学习班。我无奈地当选了医院医务处管辖范围的党总支书记，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加在我头上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随着江青成为罪犯而自行平反了。凭15年图书馆工作成绩和几篇学术上的文章，图书馆学会将我的职称评定为副研究馆员。1987年，我离休。■

(作者当年曾经担任江青俄语翻译与保健护士)

(责任编辑　冯立三)

多,特别是“完整地理解”还是并非“完整地理解”的大问题。

编者之所以“从政治上讲文艺”选得多,是因为要在选编中体现“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体构想、关于四化建设、关于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估量和分析、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关于反对错误倾向等等,(所以,)关于建设精神文明、思想战线问题、知识分子等,则尽可能收入了”。——呀,这无异于攒自行车似的攒了一部“论文艺”,实则一部从论政治、论社会、论思想一直到论文艺的极其庞大的言论集成。姑且不论这种编法的准确性、完整性需要多高的理论政策修养,单就如何理解和处理政治与文艺、政策与文艺的正常关系就是一番极严格的资质验证了。

编者一番增补之后,全文收录了出版前4个月即6月9日邓小平对戒严部队所做的重要讲话,讲话中重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然正确,特别强调继续执行党的十三大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没有错,“胆子要大一些”,“坚定不移地干下去”,“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邓小平这里难道不是讲政治问题吗?《邓小平论文艺》的编者却一仍惯例,按“1987年夏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时编就的体例交付印行,当然成问题了!

《邓小平论文艺》的编者一门心思突出政治,却忘记了邓小平谆谆教导的最大的政治——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说:我党制定了总路线、总政策,也制定了党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假若只记住党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而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那就要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所以,人们面对《邓小平论文艺》这本书时,难怪有一种感觉,好像中国仅仅出现了一场“风波”、仅仅实行“戒严”和“平暴”,仅此而已;又好像面对着难以保持一致的两个形象、两种思想:一种是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一种是《邓小平论文艺》的编者所诠释的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到底是“完整地理解”,还是“我注六经”,抑或是“六经注我”?

邓小平南巡讲话,涉及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且谆谆告诫,说明“完整地理解”并非易事。如果按《邓小平论文艺》一书编辑的体例要求,那么,犹如一夜春风起、局势大为改观的“南巡讲话”,理应全文辑录入册,正像“全篇收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一样,做一番修正和补订,然而,没有!

《邓小平论文艺》的重心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明眼下文艺的政治方向,充其量,只能算作以“论文艺”为切入点“突出”编者自己所理解的“政治”读本。

果不其然,《邓小平论文艺》出版后,文艺界效仿延安整风时期的“干部必读”,发给几乎人手一册,紧接着,扩大发行,大肆宣传,宣传部门下文要求全民都来学习,不但用以指导文艺,更要用它引领政治——把党的政治仅限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90年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论党的建设》《邓小平文选》《邓小平论文艺》已经翻译成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号召各族人民进一步搞好学习。1991年3月1日,中宣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印发《关于当前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级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文化部门、广播影视部门、文艺团体,要组织和帮助文艺评论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列文论、毛泽东文艺论著和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论文艺》。”

文革期间流行过这样一句话:“不怕马克思的唯物论,就怕造反派的辩证法。”

更奇怪的是,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中央教育部竟然一而再地下发文件动员千千万万学子们学好这本教材(《编后记》提示说它是“极好的教材”),而这时,另一本比较靠谱的“论文艺”早已出版。

它就是将近10年后出版的《邓小平论文学艺术》。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种《邓小平论文艺》,一本是1989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编选的《邓小平论文艺》,一本是1998年1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的《邓小平论文学艺术》。

这本书不是那本书。

不是常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继续和发展吗?那么,邓小平的文艺思想正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因此,编选出版《邓小平论文学艺术》如同编选出版《毛泽东论文艺》一样,十分必要,何况那一本《邓小平论文艺》问题太大。

《邓小平论文学艺术》来得晚了,但毕竟来了。

该书由“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理论体系”,将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分成6个部分,包括党的文艺方针、路线、政策,社会效益,艺术家的灵魂,党的领导与文艺,等等,分法合理,对于完整地、科学地理解和学习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兼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文艺理论不无帮助。

该书以“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不可能脱离政治”为指针,阐明邓小平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忠于原意,这是负责任的。

该书着眼于“文艺”,立足于社会主义,取材不离题,编排成体系,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文艺”选本。

该书的附录《重要文献》,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江泽民的《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作为三代党的领导人关于文学艺术的纲领性的文献连缀成集,增强了党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从诞生到继承的历史连续性。

然而,十分奇怪,2000年10月26日通过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中,依然列有那本《邓小平论文艺》!更奇怪的是,时至今日——2007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定《大学生必读书目100本》,书目中仍旧列有《邓小平论文艺》,即:“18.《邓小平论文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该书出版已经18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成型,《邓小平论文学艺术》早已出版,教育部这样的行动,到底要把新时代的热血青年引向何方?

1992年初稿　　2007年定稿

【2014年11月赘言】

说实在的,写这篇文章我很有顾虑:怎么连邓小平的语录都敢质疑呢?其实,我质疑的不是邓小平语录,而是某某人为反自由化,六经注我,代本局、本部所编纂的邓小平文艺语录。

1990年7月5日,由徐惟诚主持召开的中宣部通气会上,王忍之传达7月3日中央宣传领导小组会上李瑞环关于《中国文化报》“6·24语录事件”(始作俑者同于编选《邓小平论文艺》的发起人和执笔者)的讲话。根据下发的记录稿称,会上,李瑞环说:“摘录没有完整、准确地反映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论述,连小平同志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这一纲领性的讲话都没有摘,而且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论述排除在外,违背编选中央领导人言论的规定中的第三条和第五条。……会有人认为中央领导核心有问题,效果很坏。”会议的最后徐惟诚讲话,重申道:“上半年小平同志还讲,现在到处出‘小平同志论这个’,‘小平同志论那个’,这不好,不准确。”

“‘小平同志论这个’,‘小平同志论那个’,这不好,不准确。”足以见编选“邓论”之严肃、完整、准确和政治责任感,《邓小平论文艺》悖逆于这一精神。好在《邓小平论文学艺术》取而代之。如是之故,恕我直言,学鲁迅,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作者为评论家、散文家)

(责任编辑　冯立三)

陈修良访苏记

○ 冯 翔

1939年12月沙文汉、陈修良与女儿沙尚之

退休以后，七十五岁的上海老太太沙尚之仍然每天上班。研究的对象是她母亲。

她母亲——陈修良，1998年11月6日，以一个平凡无奇的“上海市社科院退休顾问”之身去世，享年九十二岁。很少有人知道，她有一个让人想起谍战电视剧的身份：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1949年，她主持了南京的和平解放工作，令这座千年古都免遭战火荼毒。去世前不到一个月，她在病床上接待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解放前，她在南京曾有过一段大学生活。

这位1927年由共产国际选派留学苏联，一辈子投身理想的老太太，人生真正的高峰期却在晚年。去世前，她用二十年时间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各类文件、材料、口述记录，涉及大革命、抗日、国共内战、反右、文革等历史阶段，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历史的横截面。

“这项工作只有我能做。”沙尚之老太太骄傲地对我说。她母亲留下的大量书信、手写笔记，只有她能辨认。母亲晚年口齿不清，也只有她能听得懂。母亲留下的四十盘口述录音带，她一一整理成了文字。这四十份录音记录，她送了我一份。其中最吸引我的一段，是她母亲1950年访问苏联，“朝圣”的经历。

没有钢笔的国家

1950年2月，时任南京解放后第一任组织部部长的陈修良报名参加了一个考察团。团里三十几个人，全是组织部部长。名字就叫“组织工作考察团”。

刚刚建立国家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堆问题。怎么领导工业，怎么领导农业？党委和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党委、政府、工会、青年团，这四个组织经常打架，怎么和谐相处？……很自然地，考察团踏上了赴莫斯科的长途列车，前去“朝圣”。

对二十多年前曾经留苏的陈修良而言，这次考察不亚于另一次留学。她自己带着一堆问题，想向苏联求教。比如：一百二十万人口的南京，只有两万产业工人。这么低的比例，怎么搞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

考察团整整在苏联待了四个月，去的地方比她留学时还多：莫斯科、列宁格勒、克里米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从列宁格勒到克里米亚，就坐了整整五天火车。

“这次考察其实是刘少奇的意思。”陈修良回忆，出国之前在北京培训，刘少奇接见考察团，提了三个要求：不要提南斯拉夫，因为当时南斯拉夫已经被斯大林开除出世界共产党情报局，成了“修正主义”；不要问“统一战线”，苏联没有这个说法；不要问苏联人的工资，因为他们的工资差别很大。

在北京—莫斯科九天九夜的火车上，陈修良开始发现有些不对劲。苏联的女列车员只吃一片黑面包，一杯茶，两块糖，偶尔吃一点香肠。还不如中国的列车员吃得好。陈修良问：“你怎么吃得这么少？”“生活蛮困难的。”

女列车员嘱咐中国考察团，每到一站，必须安排两个人值班。“为什么？”“因为会有小偷上来。”陈修良又感到奇怪了：社会主义怎么还会有这么多小偷？

到了苏联，答案就来了。偌大的苏联，满街是帝俄时期留下的高楼大厦，富丽堂皇，可是却连一支自来水钢笔都没有，只有老旧的蘸水笔。中国考察团出门，钢笔经常不翼而飞。陈修良的衣服扣子掉了，去商店买，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生产计划。”

生产计划？考察团去了苏联的工厂，知道了什

么是生产计划，什么是计划经济。

一个纺织厂，生产多少布匹，事先有计划，可以控制，也能完成任务。但只能完成数量，控制不了质量。工人基本上是平均工资，没有什么差别；有光荣榜和“社会主义竞赛”制度，但没有什么效果。评上了劳动模范，给一张证书，报纸宣传一下，仅此而已。

陈修良的鞋、袜子都是蹩脚货，到苏联却被人人羡慕。她发现：苏联人的鞋都不分男女，款式一模一样；袜子一穿便破。

光荣属于斯大林

“朝圣”的终点，自然是克里姆林宫。陈修良又觉得别扭了。

她一直在上海、南京领导地下工作，到1949年都没见过毛泽东，更没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很快，她注意到：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上，有一排霓虹灯的大字：“光荣属于斯大林！”

“那么多人在卫国战争中牺牲，这不是人民的力量吗？光荣只归于斯大林是啥意思啊？我感觉这口号很不妥当，几千万人民的牺牲他们不光荣吗？只属于斯大林一个人吗？我又感到奇怪了。”

陈修良不知道，“光荣属于斯大林”，在当时的苏联，是一句已经非常保守的口号。在她访苏前两个月的1949年12月21日，各国的共产党领袖齐聚莫斯科，为斯大林庆贺七十岁生日。在庆祝大会上，斯大林坐在第一排，左边是毛泽东，右边是莫斯科市委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为大会做的结束语是：“荣誉献给我们亲爱的父亲、我们智慧的老师、苏联人民共产党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英明领导人，斯大林同志！”

“光荣属于斯大林”的效果，考察团很快知道了。

给他们上课的苏联学者，上课的方式闻所未闻——读稿子。读事先拟定的稿子，没有一点差错。而且，每一篇的模式都一样：斯大林领导下的工业，斯大林领导下的农业……

马克思、列宁已经基本不提了，全苏联都称颂着斯大林。根据苏联官方出版的《联共（布）简明党史》，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这些老革命都是潜伏的特务，甚至企图谋杀列宁，只有斯大林一个人例外。从地下工作到革命斗争，都是斯大林的功劳。

当年留苏，陈修良对苏联的党内斗争心有余悸。这一次，她感觉到：苏联的政治氛围之严酷程度，有增无减。“（学者们）讲话为什么这样怕？原因就是怕有性命危险。”

这一年，苏联官方档案记载：全苏的劳改营和劳改定居点拥有整整二百五十六万名囚犯。

他们在皮鞭和枪口的强迫下，建设着大批斯大林亲自倡议的人间奇迹：贯穿北极冻土的铁路线、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连通伏尔加河和顿河的大运河……维持囚犯劳动的代价，远远高于他们创造的全部利润。而这些耗费巨额财富和生命的庞大工程，基本上都很短命。

没有人敢于向斯大林进言取消这些工程，尽管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在陈修良访苏的一年多以前，两名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库兹涅佐夫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沃兹涅先斯基被逮捕入狱，正在等待处决。从1939年起，苏联没有召开过一次党代会，最高国务基本都在斯大林醉醺醺的别墅宴会上处理。

“从这个讲稿里面看，苏联言论是一点自由没有的。”陈修良问一个留苏的中国学生：你怎么读《资本论》？对方回答：《资本论》没啥了不起，考试前老师会暗示你考题在第几页，你背下来，就可以了。

那你懂得这个吗？陈修良问。

“我管它呢，反正我考试及格就可以了。”

苏联也有妓女？

对中国共产党挠头的重点问题——组织，苏联却解决得异乎寻常的顺利。

莫斯科市委、区委、工厂党委，考察团分三级进行了充分考察。发现苏联的党委除组织部之外，还有一个干部部。有了这个部门，组织问题迎刃而解。

一切政策、方针由党委决定，不听话的干部，立即由干部部撤换，撤职或调走。从政府到共青团、工会等大小组织，一切都由党委领导，就不存在“打架”问题了。党委做出的计划，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计划就是法律”，在莫斯科的工厂里，考察团看到这样一句标语。

“这样固然有好处，统一计划、统一领导。可是民主呢？”陈修良不得而解。

很快她就知道答案了。莫斯科一个区的苏

维埃刚好进行民主选举，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都是候选人。陈修良坐在观众席里，看到光头的赫鲁晓夫和“阴森森的”马林科夫两个人在一本正经地发表竞选演说。旁边一个苏联人告诉她：“这个马林科夫将来要做部长会议主席，那个赫鲁晓夫要做书记了。”陈修良问：还没有选举，你怎么知道的？那人说：是内定的，苏联人都知道。

果然，不久马林科夫、赫鲁晓夫都被选为苏维埃代表，又相继跻身苏共最高领导层。

这是马克思讲过的无产阶级专政吗？陈修良感到对不上号。马克思的著作她认真学过：第一，公社的委员要由人民选举；第二，人民可以罢免公社委员；第三，工资不可高于技术工人。这三条，苏联一律对不上号。尤其是最后一条。苏联不但有专门为领导干部准备的特供商店，甚至连货币都消失了。“有一种很高级的店，中央领导要吃的用的就到那里去拿好了，哪还要什么钱呢，用不着。”

与此同时，苏联普通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百货商店要么货架空空如也，要么来了一批货物，立即排起购物的长龙。根本没有私有经济可以对此补充。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得极其彻底，连擦皮鞋的、卖冰淇淋的都是国营单位。

“国有目的，就是不让你发财，不叫你发展资本主义，饿不死、吃不饱，但是实际上仍旧有人可在这种制度下发财。”陈修良站在卖冰淇淋的摊子前默默算了一笔账：假使每卖一个冰淇淋都少给一点，很快就能从中赚一笔钱。

在苏联，贫富差距不但存在，而且极其严重。陈修良晚上去莫斯科红场走了走，看到许多走来走去的漂亮女人。一打听，她万万没想到：居然都是妓女，其中很多都是出来搞“副业”的女工。苏联的确看不见乞丐，但有小偷。不仅偷私人财产，还偷公家财产。连公园里的花子儿都会被偷。

仍旧是这种东西

访苏四个月，陈修良反而更糊涂了。苏联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呢？

这个国家远不像她想象中的强大、富足、民主。反而还带着几分不友好的色彩。

中国考察团在苏联，正好赶上五一劳动节大游行，都很兴奋，想到街上去看，多拍几张照片。结果他们走到旅馆门口，统统被苏联警察赶回来，说：你们不许出去，要待在旅馆里面，谁也不能出去。到某个特定的时间，中国考察团才能排着队出去参观，手里还不准拿皮包，必须空手去。手里只能拿代表证。至于照片，由新闻记者拍，考察团不许拍。警察甚至直接动手抢他们手里的照相机。人人都像被当头浇了一桶冰水。

考察团在苏联的行动也是不自由的。旅馆周围被苏方安排了很多保卫人员，不能随便乱走，要出去或者干什么都要汇报，到哪里去必须要有人陪同，说是保护，也可以说是监视。更有甚者，一些中国留学生听说中共考察团来了，想来旅馆探望，都必须经过苏共中央批准。“对我们这些贵宾尚且这样不讲道理，态度很不好。比如把我们的照相机抢走，这给我的印象非常不好。”

这些从苏联带回来的思考，陈修良一直持续到生命尽头。

她已饱经沧桑。丈夫被开除党籍，含冤早逝；她自己被政治运动摧残了二十二年，几次死里逃生。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才有社会主义。苏联十月革命时还是一个半农奴国家，我国也是这个情况，车臣是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最落后的国家，怎么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呢？”

“对苏联的很多情况我都怀疑，这样子的东西叫作社会主义？这叫作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实质上没有当家做主。用人权是没有的，工厂里面管理权也是没有的。”

“二十年代我看到是这个现象。现在去呢，还没有改变，仍旧是这种东西，贫困仍旧蛮贫困，恐怖仍旧蛮恐怖。”

考察团找到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详细汇报。王却非常肯定苏联，说：苏联的工作非常有次序，从来没有发生问题，非常有计划，非常有条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的命运，从此更彻底地与苏联捆在一起。四年后，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发言：“……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而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

（作者为《南方周末》记者）

（责任编辑　冯立三）

昔日清华不唯权

○ 金富军

清华学校时期，校长由外交部任命。据现有资料看，外交部任命下达后，校长来校就职，并无隆重仪式。1928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南京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兼任，这比北京政府时期显得更为郑重。同时，与政府高级官员类似，校长就职典礼开始举行隆重仪式，并由政府代表监誓。仪式作为象征性、表演性、由传统文化规定的行为方式，在特定群体和文化中沟通、过渡，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正是通过一系列类似形式，南京政府得以构建国民党、新政府的权威，也意味着南京政府努力将大学管理逐渐嵌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之中，政治主动地、有意识地逐渐影响于教育。

罗家伦（1897—1969）

1928年9月18日，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就任时，革命元老周震麟监誓，北平政治分会、平津卫戍总司令、北平特别市党部、北平市政府、外交部北平档案处、清华董事会以及美国公使馆均派代表参加。罗家伦挟北伐胜利余威而来，初期颇受师生欢迎，就职典礼自然开得隆重而成功。

1929年开始，中原大战爆发，北方政局动荡，罗家伦校长与教授、学生矛盾逐渐激化，清华先是爆发驱赶校长风潮，罗家伦校长离开学校，后清华师生又拒绝阎锡山任命的乔万选当校长。直到1931年3月17日，国民政府第16次国务会议上，通过了罗家伦辞职及吴南轩的任命案。4月3日，兼理教育部部长蒋介石签署教育部第550号令，正式任命吴南轩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注1

1931年4月20日，吴南轩到校，在大礼堂宣誓就职，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褚民谊，北平市党部、北平市政府、外交部、燕京大学等代表出席。正是在这次典礼上，党国元老张继倚恃资深经历，罔顾学府尊严，受到了清华学生的批评。

张继（1882—1947），字溥泉，河北沧州人。国民党元老、民国政要。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参议院议长。后参加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国史馆馆长等职。1947年12月15日病逝于南京。

4月20日的就职仪式，原定10点开会，张继等人迟至10点45分才到。如此重要、隆重的集会，政府代表居然迟到45分钟，这让师生深为不满，学生嘘声不断。张继非但不为自己姗姗来迟道歉，反而因学生的嘘声大为生气。

吴南轩宣誓完毕，监誓人张继发言。或许高居庙堂的日子久了，或许被气昏了头，张继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与发言场合，发言中多处指责清华，诸如学生多属纨绔子弟，飞扬浮躁，缺乏读书风气，清华并没有培养出人才，等等。

这些批评，并无新意。早在1908年，章太炎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撰文批评美国"退款"办学倡议，认为"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清政府"妄遣十百少年，雉兔相随"，游学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注2 进入20年代，国内民族主义思潮高涨，清华受到更加猛烈的抨击。社会上部分舆论指责清华培养的学生是"感化受美最深"，"未'出'而先'洋'"注3，"预备'留美'，而未尝预备'回国'，可耻孰甚"。注4 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肖楚女甚至认为帝国主义"通过退回庚款办清华这样的买办学校，一天一天地陆续制造出这种卖国的买办"。注5 因此，张继的这些批评不过拾早先某些社会舆论牙慧而已。发言完毕，张继还公然挑衅："在座各位如有勇气者，请起来与兄弟讨论。"注6

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

此时的清华，已非五四运动前“不得与闻政治”的清华，此时的清华学生也早已从以前接受严格管束的乖学生变成了校园中的“老虎”。[注7]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尤其刚成功进行了驱逐罗家伦拒绝乔万选运动的清华学生，对张继傲慢、无理的指责自然不会接受。

果然，张继话音未落，即有中文系学生王香毓（五级）站起来，大声质问张继：“（一）本校定10时行礼，何以张委员10时45分才到？（二）清华人才虽少，然在国内亦算不弱，最近最著者，如孙总理陵墓图案，亦出自清华毕业生设计，其他如教育闻人胡适以及南开燕京两校教授，多为清华毕业者，不过清华尚少政客，或因此而招张委员之轻视。（三）张委员亦是人，何以和他谈话须具勇气？岂张委员有特殊之点耳？”[注8]

王香毓的质问，犀利尖刻，句句击中要害，令张继异常尴尬。好在张继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随机应变、能屈能伸的能力自不一般。张继连忙向清华师生道歉，自认应邀演讲，交通堵塞以致迟到；至于中山陵之设计者，尽人皆知出自清华校友吕彦直之手云云。[注9]张继道歉后，“宾主始欢洽如初。”邹韬奋评论“当时张氏之受窘情形，可以想见，他能跳出窘境，还幸亏他的坦白道歉，总算漂亮”。[注10]

清华学子不唯上、不唯权、只唯理，舌战张继的情形，被许多校友津津乐道，陈岱孙、钱端升、许振德、黄开禄等校友回忆中均有提及此事。在当时，即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被邹韬奋以《清华学生与张继之舌战》为题，在《生活》第6卷第20期上发表。邹韬奋指出：“反抗与服从虽是两极端或至少是相反的东西，但反抗与服从可成美德，亦可成劣根性，重要之区别就在是否合理。有理由的反抗和有理由的服从都是美德；无理由的反抗和无理由的服从都是劣根性。”邹韬奋批评张继，称赞了清华学生有理的反抗：“我国人之不守时间，久成一种通病，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还可说是无知无识，聊以解嘲，受过教育的人连这种千该万该改革的恶习惯尚未能改革，教育改造社会便是一句空话；张氏这一天负监誓责任，新校长非恭候到他的大驾光临，不敢按时开会，固意中事，累着全体师生久候，已有敢怒而不敢言之烦恼，张氏到后‘训’得有不合分际，倘清华学生竟无一人敢起来质问，这种无理由的服从便是奴性，合理的服从是美德，奴性的服从却是最要不得的劣根性，是我们绝对不要我们国民有的东西。我们一方面要提倡合理的服从，一方面也要提倡合理的反抗。”[注11]邹韬奋的评论可谓深刻到位。

注释：

注1 《教育部令第550号（1931年4月3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注2 《清美同盟之利病》，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75～476页。

注3 黄仲苏：《海行五日记》，《少年世界》第1卷第10期。转引自胡竟铭：《驳少年世界黄仲苏〈海行五日记〉：八月廿七日记清华游美生一段》，《清华周刊》第196期，1920年10月29日，第11页。

注4 邱椿：《改良清华刍议》，《清华周刊》第273期，1923年3月16日，第8页。

注5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1924年6月14日）》，《肖楚女文存》，第96～99页。

注6、注8、注10、注11 邹韬奋：《清华学生与张继之舌战》，《生活》第6卷第20期，1931年5月9日，第405页。

注7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种议论，说清华有3种人物：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

注9 关于此事，陈岱孙、钱端升、许振德、黄开禄等校友回忆中均有提及此事，由于均属多年以后回忆，对此事回忆稍有出入。■

（作者为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 冯立三）

宪法学者张君劢

○　智效民

1946年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会议期间，恰逢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兼中国民主同盟常委张君劢六十大寿，各界人士纷纷祝贺。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献了一块写有“民主之寿”的匾额以示敬意。这一年12月2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了由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因此这次大会被称为“制宪国大”。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43名战犯名单，张君劢列最后一位。张君劢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中共对他的态度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一、清朝末年的“洋翰林”

张君劢名张嘉森，字君劢，1887年出生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一个“不为名相，即为名医”的大家庭。

张君劢自少年时代即对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并且学会撰写“策论”。此外，他还阅读了《资治通鉴》《日知录》《曾文正公全集》和大量西方名著，这对他了解中外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关心政治的传统，有很大帮助。

1902年，张君劢考取秀才，当时他15周岁。同年11月初，上海南洋公学因为“墨水瓶事件”引发学潮，导致200多名学生集体退学。为了收容这些失学青年，著名学者马相伯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震旦学院。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将该校的招生启事登在他主持的《新民丛报》上，还撰写《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其中有“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等语。张君劢看到这篇文章后深受刺激，便主动报考了这所学校，并选择了马先生开设的拉丁文课程。

时隔不久，张君劢因学费问题而辍学，遂转入南京高等学堂继续求学。后来，他又因为参加拒俄运动被迫退学。退学之后，经友人介绍他曾经去湖南长沙当了一名中学教员。

1906年，张君劢与四弟张嘉璈一同考取官费留学资格，然后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专业。第二年，梁启超在日本成立“政闻社”，提出了“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等四大纲领，张君劢也参与其事。除此之外，他还在《新民丛报》上翻译发表了穆勒名著《代议制政府》的部分内容，有人认为穆勒的影响在张君劢思想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10年，张君劢在早稻田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随后他起程回国，参加了清政府组织的留学生考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当时人们把留学生称为“洋学生”，因此张君劢就成了投身于清末立宪运动的“洋翰林”。

二、民国初年的立宪派

但是，突然爆发的辛亥革命中断了张君劢的“翰林梦”，于是他回到上海开始从事政治活动。起初他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与著名立宪派人士汤化龙组织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后来该会与共和统一党、共和促进会等党派合并，成立了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民主党。该党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赋自由，建设强国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为宗旨，与共和党、国民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后，中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继续与国民党相抗衡。

民国初年出现的这种政党林立、分分合合的局面看似复杂，但仔细分析则可以分为改良和革命两大派：前者继承了清末立宪派的传统，主张用和平、民主、渐进的改良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后者脱胎于清末革命派，企图用暗杀、暴动、战争等革命手段，创造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对于革命派的做法，梁启超深感忧虑。因此当国民党因宋教仁遇刺而发动二次革命时，他便指出：这种暴民政治之祸，更甚

张君劢与《中华民国宪法》

于洪水猛兽。如果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那就只能是“国事日非”“生灵涂炭”。

1913年，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迫害，张君劢在梁启超的安排下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15年，他获得柏林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他曾经担任过浙江省交涉署署长、《时事新报》总编辑、段祺瑞内阁的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冯国璋总统府的秘书长等职务。1917年，他辞去所有职务，致力于唯心论哲学和教育问题研究。

1918年，为了进一步研究宪政制度与政治哲学，张君劢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考察结束后，他留在德国，师从著名哲学家倭铿进一步深造。1921年年底，他陪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来华讲学并担任翻译。第二年，他参与聂云台、黄炎培共同发起的“国是会议”，并起草《国是会议宪法草案》，其中提出“中华民国是联省共和国”的主张。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他不仅与黄炎培共同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创办了许多著名纺织企业，并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等职务。

1923年，张君劢与杜里舒到达北京，在清华园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由此引发了他与丁文江的“科玄论战”。这场论战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成为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不久他返回上海，出任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并在吴淞创办了国立自治学院。1925年，国立自治学院改为国立政治大学，刚从海外归来的闻一多曾在该校担任训导长。随后，张君劢还与中国青年党负责人李璜合办《新路》杂志。1927年，国立政治大学被国民党勒令停办，第二年《新路》又被国民党查封，张君劢也被逮捕。1929年，张君劢再次去了德国，在一所大学任教。

三、国共两党的批评者

1930年张君劢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1932年，张君劢与张东荪在北平成立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为民主社会党，并出版《再生》月刊，继续致力于宪政运动。关于国家社会党的缘起，《中国国家社会党简史》这样介绍：“本党的先进，在清末早已从事于宪政运动，至于海外部分，更具有一种浓厚的悠久的民族革命思想。所以假使追溯本党的历史渊源，恐怕比同盟会还要早些，也可以说是中国讲宪政最早的一个政党。研究系、进步党，虽然在名字上、内容上和今日的国社党并不完全有关联，但未尝不可说是一脉相承。任何一个政党，其酝酿似乎都没有我们这样长久，因为我们大概经过了三十个年头，才有正式的组织。”（《中国民主社会党》第2～3页，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版）由此可见，国家社会党以“中国讲宪政最早”的党派自居，一直把推动中国的宪政运动当作最主要的任务。

张君劢在国社党成立伊始就指出：“国民革命军以全胜之势，统一全国于青天白日之旗帜下，举昔日若有若无之国会与宪法而推翻之，而另行其一党专政或曰以党治国之制，人民之言论结社自由，概剥夺之，以之隶于党部监督之下，全国之治权，独中央党部得行使之，选举总司令与重要行政官员之权属诸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政治会议，简单言之，皆俄共产国之制度，稍变其形而移之于吾国者也。”（同上，第14页）

他还说：“自国民党柄政，年年内战，国事托诸枪头之上，政府惟以搜刮为能事，虽青天白日旗满布全国，仍未见有所谓统一编制之国防军，

与夫全国军人一致服从之司令长官。历次内战，中央非不胜利，然去一冯玉祥，来一韩复榘，去一阎锡山，来一商震，广东之隶于国民党至十余年，财政行政之紊乱，仍与他省同。今则又演海空军司令与陈济棠之私斗，是全国之内惟知有赤裸的武力行使而已，法律议会云何哉？此宪政之决难于实现者之一。”（同上，第16页）

张君劢不仅批评执政的国民党，而且规劝共产党。比如1938年，他曾经以公开信的方式向毛泽东提出三条意见：一是军队国家化，二是行政一体化，三是放弃阶级斗争理论。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刚刚开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特殊时期。为了团结抗日，共御外侮，张君劢在信中指出：近代国家的最大特征就是统一，在诸多统一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军权统一。也就是说，“军队的教练与使命，必须出于一源，而后行动乃能一致。”如果军队不是属于国家而是属于政党，那么军队就会成为某种主义的工具。这样一来，国军就会变成党军，国家就会因为政党之间的分歧而发生战乱。基于这一认识，他劝毛泽东把八路军的训练、任命和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张君劢还说：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应该是同一种法律，同一个行政系统。如果一个政党拥有一块特区，自立官制、自办学校，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天地，那就必然会形成封建割据。因此，他希望毛泽东主动取消边区、主动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以便增进全国团结，有利于持久抗战（同上，第83～85页）。他的意见，毛泽东当然不会接受。

四、起草中华民国宪法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重庆谈判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实施宪政。为此，国共双方代表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有如下表述：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第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于是，当1946年政协会议开幕之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周恩来为张君劢祝寿的那一幕。

当时张君劢刚从海外回来，就承担了起草《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简称《政协宪草》）的重任。因为他多年来致力于宪政研究，并事先写成一稿，所以当此稿付诸讨论时，获得各方面好评。有人认为张君劢匠心独运，在这部宪草中以五权之名行三权分立之实，弥补了《五五宪草》的局限性。也有人说张君劢的这种设计，使在野的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面对这个问题，周恩来在政协闭幕会上致辞说：“政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在这些协议中，我们愿意指出：和平建国纲领和宪草原则，是使中国走上政治民主化的准绳，军事协议，是使中国军队走上国家化的根据。”他还说：“我们一致地同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我们要组成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合作的举国一致的国民政府，来结束训政，筹备宪政。有了这些协议，有了民主宪草的原则，于是国大问题就能用政治方法得到合理的解决。”（同上，第89页）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共两党的关系好像达到最佳状态。但是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4月，苏联红军撤出东北，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关系迅速恶化。不久，战火蔓延到关内，山西、河北、江苏等地的军事冲突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国共两党的谈判也濒于破裂。蒋介石认为中共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以便积蓄力量发动内战；共产党则宣称因为国民党毫无诚意，所以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为了让这次大会成为国民党的独角戏，中共竭力劝导各民主党派抵制国民大会的召开。民盟接受了中共的意见，但是以曾琦为首的中国青年党和以张君劢为首的中国民社党却参加了这次大会。中共认为，参加不参加这次大会，乃是能否“站在人民一边的试金石”，这恐怕就是曾琦和张君劢在1948年被中共列为战争罪犯的原因。

在国民大会期间，国民党部分代表对《政协宪草》表示不满，企图重新回到党国一体、总统集权的《五五宪草》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民社党副主席蒋匀田表示要率领本党代表退出会场以示抗议。为此，蒋介石劝诫国民党代表要尊重民主党派的意见，这才在《政协宪草》的基础之上，通过了由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正因为如此，张君劢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

有意思的是，在大会开幕式上，蒋匀田发现会场上悬挂着国民党党旗，便在发言中表示：今天的大会是国民大会，并不是国民党大会，因此不应该悬挂国民党党旗。如果一定要挂，也应该加挂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党旗。于是大会主席团采纳了他的意见，将国民党党旗撤下。

五、宣讲宪法的演说家

张君劢深知，中国不仅需要一部宪法，更需要维护与执行宪法的广大民众，否则宪法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国家就会出现有宪法无宪政的不正常局面。因此张君劢在政协会议结束以后，立刻在上海愚园路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央总部发表系列演讲，对有关宪法的许多问题做了详细解释。商务印书馆把这些演讲集中起来，以《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为名正式出版，成为普及宪政的一种读物。

这本书的第一讲是“国家为什么需要宪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张君劢首先对国家做了界定。他说国家是为了维持人民生存、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一个机构。

紧接着张君劢分析说：没有国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没有国家，人民就失去了保护，就会成为亡国之民，与此同时社会也会陷入混乱。但是，有了国家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国家有兵权，有警察，有法院。如果不能限制国家的权力，它不仅可以随便逮捕人民，还会以国家的名义征收人民的财产，夺取人们的性命。正因为如此，就需要一部法律来限制国家的权力，并且规定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而宪法就是这样一部法律。换句话说，宪法是“规定政府权力如何分配于各机关，以达到保护人民安全与人民自由”的法律。

在这一讲结束的时候，张君劢还强调说：为了使宪法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在制定宪法之后，还要使全体国民养成遵守宪法的习惯，不断提高维护宪法的警觉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三条措施：第一，如果有人被政府非法逮捕，人民一定要设法让政府放人，并使政府再也不敢随便捉人。第二，如果政府随便查封一家报纸，人民一定要诉诸舆论或法律，使言论自由真正得到保障。第三，如果政府不能公开每年的预算，或者只是表面公开而暗藏玄机，人民也要通过舆论和法律来主张自己的知情权。相反，如果大家对自己的权利和政府的违法行为熟视无睹，淡然处之，那就会出现有宪法无宪政的局面。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人民对政府权力的警觉性，乃是宪政的第一块基石。除此之外，张君劢还就当时的局势对国共两党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国共两党之所以对立，是因为一个以三民主义为出发点，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出发点。国民党融合十九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于一炉，因此有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思想来自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又以列宁、斯大林为革命榜样。如今双方为了争夺政权便滥用武力，置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于不顾，归根结蒂是为了他们的主义。

该书的第二讲是“吾国宪政何以至今没有确立?”张君劢在这一讲中首先回顾说：民国自成立以来，已经颁布过好几部宪法，但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于是有人产生怀疑，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实行真正的宪政。为此，张君劢从心态和心习两方面做了分析，从而找出阻碍中国实行宪政的七大病根。这七大病根是：帝王思想、割据一方、越轨为能、舞文弄法、治乱循环、人民愚昧、举棋不定。从表面上看，除了人民愚昧之外，其他病根都是统治者的问题。但如果分析一下，所谓“人民愚昧”也完全是统治者造成的。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宪政始终未能确立，完全是统治者的罪过。

张君劢还指出：民主政治的要害是重在参与。参与的好处，不仅是可以行使公民的权利，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政治所采取的袖手旁观的习惯。因此他认为对于人民来说，仅仅是摆脱愚昧远远不够，还要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参与政治的机会，其中包括参与竞选、批评政府、组织反对党、提出不同政见等内容。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养成大家的政治责任心，否则就会引来不负责任的批评或捣乱。

除此之外，该书还有“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国民大会问题”“行政权(总统与行政院)”“立法权(立法院等)”“司法独立”“民主国政党”“立宪国家财政”“朝野上下之大责任”“新宪法施行及培植之关键”等内容。因篇幅关系，这里只能介绍一下第十讲对战争与和平的议论。

张君劢说：制定这部宪法，是希望(下转第41页)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求解

○ 秦 晓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确立了国企和国企体制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实施这一改革需要厘清它的涵义和内在逻辑，并在几个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

一、什么是"混合所有制"

所谓"混合所有制"，在微观层面讲即是"股份制"。在当下中国的政策含义应是开放民企进入国企控制的一些领域或扩大国企民营化的成分。之所以将之视为所有制的改革是因为中国的国企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在计划体制下国企作为全民所有制单位，人民公社作为集体所有制单位是公有制的两种形态。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在宏观层面上已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建立起了市场体制，微观基础已形成多元结构，国家经济体制也已经不是马克思经典理论所说的公有制。当前中国市场上存在的国企，其属性同世界上有些国家一样，是国家财政投资形成的经营性资产。

基于这个认识，国企和国企体制的改革要超越所有制的羁绊，否则会陷入无谓的意识形态的争议中。

二、为什么要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

1. 首先，它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企业横向的规模扩张和纵向的一体化的延伸，可以获取更合理的资源配置和更大的市场空间。而传统的业主既缺乏资本，也没有管理的专业知识，由此选择了股份制的模式，与此同时，专业化的职业经理取代了业主，企业的治理和管理发生了重大变革，现代企业由此诞生。钱德勒在他的《看得见的手》一书中对这一过程做了考证。

中国国企的股东是政府财政，虽然财大气粗，但其主要支出责任是提供公共产品，所以不应该也难以支撑国企长期发展所需的资金注入，国企通过"股份化"在资本市场获取所需资金是其长期发展的必由之路。

2. 从社会财富的分配讲，发达国家企业股份化的过程也是资本社会化的过程。中产阶级、民众（养老保险基金）通过企业股份化在资本市场上得到了财产的所有权和资本性收入。这一变化改变了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关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和生产的社会性这一基本矛盾的论断。

中国国企股份化的社会意义也是资本的社会化，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财产不是从少数资本家而是从国家扩散到中产阶级和民众，这一扩散过程是改善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个重要途径。

3. 既然国企的属性是政府财政投资形成的资产（截至2013年底国企权益总额约30万亿人民币，年度利润总额约2.5万亿人民币），那么接下来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财政支出的职能和如何合理配置支出结构。财政支出的主要职能是通过转移支付进行二次分配和提供公共产品，以促进社会公平。尽管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 20%以上，且保持高于GDP的增速，但公共产品的提供，包括社保、医保、教育、环境、廉租房、治安等依然是短缺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或"股份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应是政府财政支出的合理配置，即通过减持或划拨给社保基金从国企中抽出部分资金或股权投入到公共产品中。

4. 在当下的中国，国企的存在还带来一些经济、社会的弊端，如：财务软约束、公司治理制衡不力等，垄断、一些领域对民企准入的限制、获取银行信贷和土地的不平等的问题。这不仅使国企竞争力受到损害，还扼制了民企发展的活力，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加剧了社会不公，

评《王力反思录》

○ 阎长贵 王广宇

王力1960年开始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1—1964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1964年晋升为中联部副部长，1964年开始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文革中，从1966年4月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到1967年8月底被打倒，王力作为文化大革命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不仅是文革的亲历者、当事人，而且是一个领导者——陶铸倒台后，主管宣传的领导者，因此他关于文革的回忆录理应是很值得重视的，也确实值得重视。

一、披露了若干重要史实和情节

1. 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代替中央书记处。现在关于文革的书上，包括最权威的党史书，在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书记处的关系时，不是说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地”代替了书记处，就是说，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代替了中央书记处。按照实际情况，这两个副词即“逐渐地”和“实际上”缺乏根据。实话实说，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要代替中央书记处。不错，中央书记处是毛泽东在八大时建议成立的，并极力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但他决定搞文革的时候，他判定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成了“独立王国”，就决心不要中央书记处了，不再搞中央书记处了，认为他原来即八大时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是一种“失策”，造成“大权旁落”。因而，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陶铸代替彭真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为八届十一中全会追认后，陶铸不止一次地提议“健全中央书记处”，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意愿，实际上，陶铸也没正式地召开过一次书记处会议。王力在他的《王力反思录》中反复说明了这个问题。关于毛泽东要用中央文革代替书记处，他是直言不讳地说过的。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6月以来（按：中央文革小组是1966年5月28日宣告成立的，正好和该年6月相衔接——笔者），**代替了中央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0～1481页，着重点为笔者加）九大、十大、十一大都没设书记处，就是毛泽东不要书记处思想的结果和具体表现。

2. 林彪主持批判邓小平。这不仅是影响文革进程而且是影响文革后一些重大事情的会议，但对这次会议，历来的文革史书和党史书都付之阙如，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虽然提到了这次会议，也是语焉不详。《王力反思录》比较详实地记述了这次会议。王力说：“十一中

这也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所要改善的问题。

三、怎样实现“混合所有制”

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形成以前，股份制主要通过私募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企业直接融资提供了更便捷、更有效、更公平的渠道。便捷表现为可以免去寻找投资者及谈判的交易费用；有效表现为庞大的资本市场有充足的资金和流动性；公平表现为市场定价，进退自由。

中国资本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已完全具备承担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础。■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现任博源基金会理事长，曾任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董事长）

（责任编辑 冯立三）

全会后开了政治局扩大会(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也叫'生活会',新常委都到了,陈云没到。文革小组中部队的几个人没参加,包括刘志坚、谢镗忠。加了肖华、杨成武、叶群。这个会本来没有说批邓。可是江青发起,林彪响应,说主要危险不是刘,刘已被毛主席一张大字报打倒了,现在主要危险是邓。因此这个会变成了刘邓并列。据我了解,这同毛主席原来的设想不一样。会上对刘少奇进行了批评,刘少奇做了检讨。林彪对刘少奇的批评也不那么尖锐,除一般的话外,只是说历史上在苏区你眼里就根本没有我们这些人。(那时刘在苏区具体岗位不高,是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林是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对刘少奇的批评不怎么尖锐,但对邓就讲得很重,特别是把邓同吴晗、彭真、北京市委联系起来,说你一天到晚同吴晗打扑克,打的是政治扑克。吴晗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你的问题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政治性的。意思就是敌我矛盾。总之说得很凶。而且林彪公然提到野战军问题,说你吹嘘你的二野,你搞四卷毛选的注释时没有把各个野战军摆平,突出你的二野。……这次会毛主席要批刘少奇,江青要把刘邓并列,以邓为重点,在江青看来,邓是掌握军队的,是她掌权的障碍。这点江青同林彪一致,林彪并不怎么怕刘少奇,林彪认为能同他争权的不是刘而是邓。邓是淮海战役前委总书记,是指挥两个野战军的。毛主席派抗美援朝的指挥员时,第一考虑是林彪,林彪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去,第二考虑邓小平,但邓小平国内工作离不开,第三才考虑彭德怀。指挥大规模作战,指挥百万大军的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在毛主席看来,这两个人政治上也都很强。我觉得在毛主席心目中,一直是刘邓要分开。毛主席不止一次反复地讲资反路线由刘少奇负责。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常委排次序时把刘往下压了,而邓是往上提的。……刘早就不好分配工作了,只是国家主席的职务没有撤。邓在常委还是有分工的,他管中联部、中调部,还有一个重要的分工是"彭、罗、陆、杨案"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可是这个会上林彪把邓骂成那样,邓没法工作了。邓当场对康生说,我现在没法工作了,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

"这个会前,叶群跟肖华、杨成武谈话,江青、张春桥跟王任重、王力谈话,动员批邓。江青说刘少奇没什么,一篇大字报就打倒了,最危险的是邓。他在十一中全会上得了全票,在党内还很有影响。这次会要批邓。可是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对邓都不熟悉。江青说,王任重、王力是党的优秀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要发言。张春桥还对我说,主席起初不同意你为文革小组组员,说你是彭真的人,他说这个话是压我批邓。但会上我还是没有发言。为此江青一直恨我。王任重发了言,我认为他是很勉强的,是应付之辞,不痛不痒,他发言时满头大汗,说明他不是出自内心的。肖华、杨成武根据林彪的指示,讲邓讲得多。从邓讲到李井泉,讲到西南局,讲到贺龙,这样毛主席就把这个会停了。"(《王力反思录》,第619~621页。下文只注页码,不注书名)

3. 1966年国庆节时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目标指向谁?人们会认为,既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断定是刘少奇提出来的,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指向他了。实际上这样认识并不对。刘少奇也认为,1966年国庆节时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目标不是指向他。1967年4月,刘少奇在回答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批判文章中提出的第八个为什么即"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做了这样的回答:"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完全能够说清楚我为什么犯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说,刘少奇认为1966年国庆节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向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犯这样性质错误的人。那是指向谁呢?对这个问题,王力做了明确的回答。他说:"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已经靠边站,工作组也撤了,为什么还要彻底批判资反路线?这是因为,以前批判资反路线,主要是批十一中全会以前的五十天,就是刘少奇同志主持

工作的五十天发生的问题,这问题在十一中全会算是解决了。而这次批资反路线,实际上已经不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而是解决八、九两个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主要是总理、陶铸)以及各省市委领导人的问题。毛主席认为他们在这两个月中对路线斗争是不明确的,不坚定的,不彻底的。”又说:“毛主席同陶铸的分歧是九月就已经开始了,九月毛主席就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铸同志不满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刘邓,而‘批判不彻底’,主要是指总理同陶铸。在毛主席看来总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陶铸。‘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第625、639、656页)我认为,王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

4. 关于谷牧十五条。所谓谷牧十五条是1966年11月谷牧在陶铸主持召开的全国工交座谈会上所起草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我们看看王力关于“十五条”的说法。他说:安亭事件之前,毛泽东就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化大革命,认为光学生不行。他要陈伯达起草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陈伯达和王力搞了一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这个“十二条”提出了工厂要搞文革,认为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其中明白地写道:“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等,但在安亭事件后,这个“十二条”还是显得落后了。该“十二条”交周恩来、陶铸指示余秋里、谷牧召开工交座谈会征求意见。谈了20天,普遍认为“十二条”“左”,他们说“十二条”总的精神不对:第一,对工交系统没有正确估计。他们说:“工交战线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第二,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全面铺开,只能分批分期进行。第三,一定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工厂中不能建立群众组织。禁止学生到工厂串联。工厂要集中力量搞好生产。(第657~658页)在这种情况下和这种基础上,座谈会对“十二条”进行了大量修改,实际上基本否定了,他们又搞了与之相对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对这个“十五条”,中央文革小组不满意,毛泽东“不同意”,要求“重写”(第661页)。他叫陈伯达、王力重搞。陈伯达、王力搞出了一个新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

5. 陶铸是被谁打倒的?我们看看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怎么说的。陶铸“1966年年底被打倒”。2月6日条目中说:“……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指陈伯达、江青)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按:1967年1月4日,陈伯达、江青在公共场合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笔者),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2月10日条目中说:“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陶铸到底是谁打倒的?在政治局常委中,陶铸位列第四,陈伯达位列第五,一个第五号的常委能打倒第四号的常委吗?江青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怎么能打倒一个政治局常委?即便江青和陈伯达联合起来也不行吧。应该说,这是共产党组织原则的一个常识。既然《毛泽东年谱1949—1976》作者已经认定陶铸“1966年年底被打倒”,又记录1967年2月6日和10日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两个人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人们恐怕要问:“1966年年底”陶铸是被谁打倒的?这件事说白了:陶铸1966年年底已被打倒,这是党内机密,而在1967年年初(1月4日)陈伯达、江青二人把这个党内机密向群众公开了——陈伯达、江青犯了“泄露党内机密”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也非同小可,吓得陈伯达要自杀,江青倒跟没事人一样。(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2页注3,第47、50页)这就是《毛泽东年谱1949—1976》关于打倒陶铸的一些说法,把责任完全推在陈伯达、江青身上。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直到现在(按:指1991年——笔者),谷牧的回忆录还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好像毛主席还支持他们似的(按:指毛主席对他起草的“十五条”的态度——笔者),他们到现在还认为陶铸不是毛主席打倒的。(第658页,着重点为笔者加)

——1967年1月8日，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毛主席说陶铸问题很严重，这个人很不老实。“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第678页）

——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我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第696~697页）

——刘、邓已经不能容忍了，陶铸也不能容忍，在毛主席心目中陶铸和彭真一样。（第714页）

——陶铸实际上被打倒，不是（1967年）1月4日，而是1966年12月中央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铸是不是违背毛主席的意图呢？不违背，也是他的意见。（第778页）

6. 关于“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真相。《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说：第二次“大闹怀仁堂”的当夜，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会议》的记录，抢先向毛主席做了汇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89页）这样说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请看王力的说法。他说：“从（1967年）2月下旬到3月下旬，总理主持，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地抽空开批评会。到会人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王力（这是2月16日到会者），新参加者有江青、叶群、关锋、戚本禹、谷牧、肖华、杨成武、汪东兴。因为许多人新到会，总理叫王力整理一个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清样由总理和康生审定修改（有档案可查）。总理叫王力先在会上读一遍，核对情况。只有陈老总提出，有一句话他没有讲，要求删掉。总理说，讲是讲了，不要删了。这样就定稿印发了。……这才是现在档案中的《记录》。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第244~245、988页）很显然，这份记录不可能是2月16日“大闹怀仁堂”的“当夜”整理的。

7. 关于1967年8月4日毛泽东致江青信。这是一封毛泽东以“润之”名义致江青的信（其内容：武装左派，给左派发枪……），这份文件（或档案及其复印件）很多与党史有关的权威部门不少人看了，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年一生前告诉我，他那里有这封信的复印件，可以去看。我没当回事，一直到他逝世我都没去看，很遗憾。这封极其重要的信《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不收录，有点令人不解。王力说，1967年8月4日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是错误的。其中有两个最大的错误：一是武装左派好像军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没有这封信就没有后来给群众发枪的事。二是群众专政。这两条后患无穷。……更严重的是，主席8月4日的信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要群众搞公检法，私设公堂成了群众专政。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的开头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叫我们都抄下来，贯彻执行。信中还提到夺枪的问题（即群众夺解放军的枪），主席信上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这句话是针对林彪说的，因为林彪刚给他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主席在给江青信的开头说，他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但是对于林彪提的实质性的问题，如夺枪问题，他就不同意了。主席的这个指示后果太严重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的武斗。（第1012~1013页）

一个是所谓反右派扩大化。王力说：反右派，有一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吗？党内搞了那么多右派，文化大革命以后在特殊条件下才彻底平反。最后一个都没有了，只有三个头子，后来，这三个头子也不是了。《开国大典》电影中还有他们，打得那么凶，时间那么长。最后一个都没有了，还说基本正确，只是扩大化的问题。如果基数是九十五，扩大到一百，这叫扩大化，如果基数是零，怎么叫扩大化呢？（第825页）王力20多年前批评反右派“扩大化”的观点，而我们现在还这样宣传，按诸反右派历史事实，这种观点能说得通、站得住吗？

再一个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问题。至今没有看到全国公开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平反，来落实邓小平的指示。（第194~195页）

我们列举了9条事实认为需要引起人们注意，实际上《王力反思录》有意义的内容很多，难以枚举，请广大读者自己努力去发掘吧！

二、若干错讹（包括记忆错误）和值得商榷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也只是举例：

1.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机构建立是1967年7月，而不是8月，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穆欣，而不是王力。

2. 关于江青回京时间，不是先于毛泽东，而是后于毛泽东，毛泽东是1966年7月18日，江青是7月20日。（第609页）

3. 王力认为他是被江青打倒的。他说，毛主席之所以同意江青打倒他，主要是因为主席相信了江青告他的状："王力以为'七二〇'事件后天下不是毛泽东的了，是他王力的了。"（第207、214、280、1019页）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江青能够说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而是他的了吗？聪明和精明的毛泽东能相信江青这种拙劣的状告词吗？毛主席（一）认为王力宣传"揪军内一小撮"搞乱了军队，为了安抚军队；（二）认为王力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的"八七讲话"，搞乱了外交部，影响了国际关系，所以被毛主席作为"替罪羊""牺牲品"抛了出来。

4.王力说，"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同他无关。（第291页）这不是事实。1967年1月10日，关锋会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唐平铸、胡痴，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当晚，江青将这个文件送林彪批阅。林彪第二天批示"完全同意"，使这一口号合法化。（参见《百年潮》2005年第2期余焕椿文）

5. 王力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这句话来源于刘少奇。"（第612页）这样说，缺乏根据。

6. 王力不止一次这样说："毛主席真心要打倒的，我看一个也没有。"（第681、965页）又说：（毛泽东）"对刘少奇没有看错。"（第724页）这话都是什么意思？按照文革实际，这样说符合历史事实吗？

7. 王力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我从来没听他（指毛泽东）说过。"（第696页）这恐怕是王力记忆有误。关锋生前，有一次跟阎长贵说："毛主席当时（按：指在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家宴上）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徐景贤在《十年一梦》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他说，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给他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接着，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应该怎么做？"（参见《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8页）看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确实说了"全国全面内战"。唯当时在场并参加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王力说，我从来没听毛主席这样说过。（参见《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注2）

8. 王力说："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第991页）为这件事，2008年戚本禹来北京，我询问了他，他说：我这篇文章不仅毛主席亲自看过、改过，并有批语，周恩来还亲自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我这篇文章逐段地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哪些人的名，怎样点，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对邓小平也没有直接点名，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

代。陆定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被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了周扬的名——其实在姚文元的文章中也早点过了。陈伯达主张点胡乔木的名，康生不同意，陈伯达很坚持，江青支持陈伯达，我听江青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只点姓不点名即写成胡××，这叫半点名。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讨论。我提议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周恩来说，在外国社论或编辑部文章一类，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我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我一眼，我觉得江青认为我有害怕的意思，我就收回了这个意见——因为文章是我写的，周恩来决定由我署名。还有一点，在这篇文章中质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8个问题，原来没有8个，是我在同林杰、《红旗》杂志责任编辑等共同讨论后增加的。

这就是戚本禹那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写作和发表的大致情况。王力说：“四月一日（按：指戚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时间——笔者），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这不是事实。当我就这件事情直接询问戚本禹时，他惊奇而又有点气愤地说：“王力怎么能够说他不知道呢?！……总理主持讨论这篇文章的会议他是参加了的。真不知道王力为什么这样乱说，这样欺骗人。难道他真的忘记了?！”

9. 王力说：“邓小平就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参见宋永毅光盘所载陈伯达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王力表白他经常在毛主席面前说邓小平的好话，没有说过什么邓小平的坏话。事实果真是这样吗？1967年4月12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刘邓路线问题时，讲到刘少奇“要把我们党变成俱乐部”，王力插话说：“邓小平就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天天晚上就干。”——他这样说邓，他又表白替邓说话——说好话的事能令人相信吗？我们认为他这是讨好邓小平。邓小平对王力确实也有很高的评价，他1981年12月26日指出，王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写的东西：“立场是正确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第4、224、385页）

10. 王力说：“我同毛主席天天见面，他天天都有指示，我都传达得很快。”“我天天见到毛主席……”（第917、925页）还说他“经常提醒毛主席”（第211、723页）。——关锋和戚本禹都认为这是王力自吹自擂。

我们就举这几个例子吧。只要认真读《王力反思录》，这类例子还可以发现一些。《王力反思录》虽然有一些这类瑕疵，但我们认为瑕不掩瑜，即不影响《王力反思录》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作者为《求是》杂志编审）

（责任编辑　冯立三）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　机：13611159388
电　话：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支付宝汇款账号：13611159388

有奖征集民间抗战实物档案

为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更好地保护散存于民间的抗战档案，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专门新建了民间抗战档案纪念馆，并决定面向全国征集有关抗战的实物档案，包括抗战时期的书信、日记、文件、书籍报刊、照片、奖章、证书以及其他实物等。

我局实行有偿有奖征集。对凡征集入馆的抗战实物档案捐献人均给予一定的征集费，并颁发证书；组织专家对征集到的抗战档案进行评奖，并给予奖励；对征集到的实物档案分类结集编印成书公开出版。

联系方式：023—68863589
张先生、王女士
13996376236　高先生
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
2014年10月10日

郭小川致吴庆彤信

○ 郭小川

《郭小川全集》在2000年出版以后，我们又发现了一封父亲写给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的信的草稿，信尾未写日期，我们推断应写于1975年10月的北京，信是否发出或对方是否收到均不知。现在这里刊出的是依据父亲的手写钢笔原件：该信提供者郭晓惠（注：郭小川之女，政治学博士，郭小川研究者，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退休副教授）

庆彤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我现在做出您要我做出的回答。那天已经当面表示过，如果组织上对我的工作岗位已经做出决定，我一定服从（我如有不同意见，也只提出保留而已）。现在，我还要说一下（那天说得不够分量），登奎同志对我的工作问题的指示，王震同志的批语以及您及时找我谈话，我认为都是党对一个党员干部的亲切关怀，我深为感激。下面，是我的回答：

一、在几个月之内，我不希望离开北京。其原因，主要不是个人生活问题（镶牙、检查身体等等），而是因为党内有问题，党的文艺工作有问题。我自己呢，第一，是一个有将近三十八年党龄的党员；第二，是一个在我国少有的、以后也不可多得的、有作为的革命作家（我知道，这样说，很不谦虚，但是，因为我的女儿在给纪、王副总理的信中，对我做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居然说我“没有一点警惕性，没有一点头脑”，这在我女儿，部分地出于天真，部分地由于伟大列宁所深恶痛绝的“庸人”的影响，是无须计较的，问题是：这样的错误判断，可能造成一定的不正确的印象，这逼得我不得不用明确的语言说明实际情况）。因此，我不能规避责任，放弃斗争。据我判断，党内的问题和党的文艺工作的问题（我所说“党内的问题”是党的文艺工作以外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尽管从种种迹象看来，党内问题是很大的；因为我无法确知详情，我不准备说什么话。文艺工作方面的问题就不同了。我自己有过二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我可以看到文化部门用假名发表于报刊上的大量文章，这些文章目前还没有找全，但我已经看到并研究了一些，发现了其中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了严重的修正。这种修正，是铁案如山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早就感到，由于文化部门的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发生了一些完全不正常的、窒息革命精神和糟蹋革命文化的现象，因此，1973年我写了几篇诗文，主要目的就是向这种现象挑战，斗一斗，争一争，而且当时我就准备付出代价。后来，文化部门的错误越来越严重，我明确地估计到，早晚有一天，毛主席和党中央会加以纠正，又因为我被剥夺了发言权，使我不能不并且觉得也可以暂时地停止这种斗争。现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有了发言权只不过□天（供者注：原信此处就是这样空一字）（从9月6日起），但已做了一些准备，我决心在“安定团结”所允许的范围内，采用各种适当的方式，继续进行必要的斗争。我相信，这种斗争不会是毫无作用的。至少，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那样：“我已经拯救了我的灵魂”。为了这些事情，大概需要四五月的时间。

二、对今后的工作，我的主要意见是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并在工农兵群众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便更好地为党工作。但是，由于那天向您当面汇报的、那些生活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工作上的考虑，我希望把我的组织关系留在北京，随便在哪一个单位都行（只有两个例外，我同意你所提示的“不必到文化部，也不必到人民日报”）；我首先到林县住一年（同时也让我的女儿继续在大队党支部和生产队工作一年，她的身体大概还可勉强），然后，不断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抽出一定的时间，从事创作。我也考虑了这样做的实际可能性。我想，像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样的单位，

德意志大学的兴衰

○ 丁 东

武汉大学李工真教授是研究德国历史的专家。他的3部著作《德意志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文化的流亡》(人民出版社2010年)和《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包含了对德国大学兴衰史的深入研究,本文撮其要点做一评述。

人们现在谈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想到美国哈佛、耶鲁和英国牛津、剑桥等名校。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大学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以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3项诺贝尔奖为例,截至1933年,德国的大学里已经产生32名获奖者,是英法两国之和,而当时美国只有5名获奖者。

德意志大学的崛起要追溯到200年前。当时,德意志小邦林立,尚未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其中最大的普鲁士王国在1806年战败于法国皇帝拿破仑,被迫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割地赔款,稍微像样一点儿的哈勒大学也被拿破仑占领。国王威廉三世对逃出来的教授们说:“这个国家必须通过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由于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国防大臣沙恩霍斯特也说:“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有在教育与科学上的世界领先地位。”这时教育家洪堡出任内政部教育文化司司长。他认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1810年9月29日,由他主持建立的柏林大学诞生。洪堡提出了大学三原则,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提出了“为科学而生活”的校训。同时,他还提出了“科学五原则”:

一、科学是某种还没有完全得出结论,没有被完全发现、找到的东西,它取决于对真理和知识的永无止境的探求过程,取决于研究、创造性,以及自我行动原则上的不断反思。

二、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都是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行为准则的反思。唯有通过研究、综合与反思,科学才能与苍白的手工业区别开来。

三、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仅仅是第二位的。当然,对真理进行的自由探求,恰恰能导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实用性知识,并能服务于社会。

四、科学是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学术研究,科学交流以及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生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才能形成他独立的判断力以及他的个性,然后,他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力量的境界。

五、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与自由,这就是

对我是很适合的。我经常生活在基层,既可完成调查研究工作的任务,又可从事创作,完全可以做到两不误。我之所以不希望离开北京,决不是留恋城市,而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所需要,需要学习社会,需要了解一切人、一切阶级,需要接触整个时代的脉搏,需要知道全局,否则,也是写不出高水平的作品来的。

以上,是否妥当?望指示。至于如何向登奎同志转陈,由您决定。

顺致

革命敬礼

郭小川■

(郭晓惠提供)

(责任编辑 冯立三)

"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

大学三原则和科学五原则送到威廉三世案头,他做出了这样的批示:"大学是科学工作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

从1810年开始,普鲁士国家取代教会成为大学的财政提供者。大学成为完全世俗化的机构,自我决定教学科研等内部事务。大学校长由教授们轮流坐庄,只需国家认可。教授有任意的开课权,工资由国家支付,享受社会中上层的生活待遇。同时实行严格的退休制度,不管是谁,到了65岁,都得让位,但退休后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绝不允许大学教授办公司。企业家资助教授的研究课题,经教授与校长联名签字,就可到税务局申请减税。为教授的科研项目出资,或资助创新性课题,还能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这使德国教授再不缺乏科学经费。

柏林大学的出现,成为现代化大学诞生的标志。此后,这种模式被德意志30多个邦国竞相效仿,发展趋势如雨后春笋。它们都是综合型大学,与工科或实用学科的专门学院有严格区别。大学成了对世界进行新解释的中心,人文科学摆脱了神学的束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新体系也确立了真正的独立地位。教授们不再像神学院时代那样,只能在一种思想体系中思考。研究不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新规律,增长人类的新知识,成了最高的存在形式。只有作为优秀的研究者,才能成为大学教师;照本宣科,拾人牙慧,只能下课。大学成为研究者的共同体。人事的选择,不考虑个人好恶,社会地位,也不是口才、写作能力和教学技巧,而是研究的独立性、独创性和成果。教授是国家公职人员。国家为年轻人设立专门的研究基金。大学设有编外讲师和额外教授,需经严格考试获取资格。他们先拿较少的工资。要想得到教授的位置,必须献身于科学研究,向已形成的舆论挑战,冒着与他人在学术上冲突的危险,实现科学研究上的真正突破。教师不允许在同一所大学里升格。不存在某一所大学毕业出来的人占优势的近亲繁殖现象,扫除了门户之见和裙带关系。大学对于有才能的人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吸引力。大学生的学习有充分自由,可以到任何一所大学里去学习,只要那所大学还有名额可以注册。大学里没有什么教学大纲,也没有什么必修课和选修课,对什么感兴趣就可以学什么。这种流动性和选择自由,使得任何一名大学生都有机会与最优秀的科学家讨论问题。同学之间可以进行结伴式的自由讨论,也可以独立工作,自由进入任何图书馆,查阅已公开的任何资料,绝不存在任何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级别限制。科学自由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校正力量。大学教授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例如社会保险制,福利国家方案,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等,都是为克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弊端所做的努力。

科学与教育的崛起,有力地推动了普鲁士王国的现代化进程。普法之间1870年再度爆发战争,这次法国大败。排除了法国干扰,德意志各邦完成统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法国科学家帕舍尔当时就发出感慨:"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是科学上竞争的失败!"

的确,德意志人在普法战争前,已经居于世界科学领先地位。以当时的重大科学发现而论,生理学方面1864年德意志人有156项,世界其他民族只有57项;到1869年,德意志人又取得了89项,世界其他民族只有11项。在热力学、电学、电磁学、光学方面,1836年至1855年,德意志人为231项,英法为201项;到1870年德意志人又取得了136项,英法只有91项。在医学领域,到1869年,德意志人为33项,英法总和为29项。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前期,德意志已经成为世界科学中心。这里出现的科学家可谓群星灿烂,如数学家高斯、黎曼、闵科夫斯基、希尔伯特、哥德巴赫;物理学家弗劳霍荷、赫茨、哈伯、洛伦兹、普朗克、爱因斯坦、波恩、玛依尔、赫姆霍尔茨、伦琴;化学家李比锡、奥斯瓦尔德、哈维尔、威尔斯塔特、瓦尔堡,可以开出一个很长的名单。美国虽然在迈入20世纪门槛时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科学、教育方面,只是德国的学生。

在这方面,中国也是德国的学生。蔡元培对于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作用已经得到公认。他从1907年起,曾几度留学德国。他主政北京大

学,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文理兼修、教授治校,主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皆受益于德国,甚至他给女儿取名威廉,都可见他从德国受到的影响。

德国大学和科学的领先地位,葬送于纳粹之手。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得种族主义思潮兴起。希特勒抓住了德国人渴望翻身的民族情绪,趁机上台,出任总理,掌握了国家机器,使得德意志大学奉行了123年的科学、理性、自由的原则被断然抛弃。1933年4月7日,希特勒刚刚上台两个多月,就颁布了《重设公职人员法》,宣布解聘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公职人员:"一、凡属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辅助性组织的成员;二、凡在未来有可能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活动的人;三、凡在迄今为止的活动中不能证明自身会随时、无保留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的人;四、凡属非雅利安血统者,这样的公职人员都将解聘。"由于德国大学教师属于公职人员,因此,这场运动在大学校园里,就成为驱逐有犹太血统的、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大量科学家因此遭到解聘,德国大学界在4月22日发出了让自己蒙羞的《德意志大学对阿道夫·希特勒以及纳粹主义国家的表白书》,其中写到:"这个民族的阳光再度照亮了自己。我们将建设和扩展伟大的元首所开创的事业,并全心全意地追随这个新的国家。……这场纳粹主义革命不仅体现为一个不断成长起来的政党对现存权力的接管,而且这场革命将给我们德意志的存在带来全面的、翻天覆地的彻底变革!"

1933年5月10日夜晚,在柏林歌剧院广场上,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主持了一场焚书运动。狂热的大学生将大批"非雅利安精神"的书籍扔进火堆。作者从海涅、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卡夫卡到雷马克、黑塞、托马斯·曼等等,近3000种书籍被列为禁书,从全国所有的公共图书馆中清除。接着,戏剧、造型艺术、音乐、出版、广播、电影、新闻领域里的"非雅利安人"也遭到驱逐。1935年9月15日颁布的《纽伦堡法》,彻底剥夺了所有犹太人的公民权,并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

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劳尔曾勇敢地站出来,抗议这场清洗运动给德国科学造成的损害。希特勒回答:"即使是为了科学,我们的民族政策也不会因此而撤销或改变。如果驱逐犹太科学家意味着现代德国科学的毁灭,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没有科学的状况下,推行我们的民族政策吧!"

德国的大学先后发生了3波解聘潮。第一波是1933年至1934年冬季学期以前,共解聘了1145名大学教师。第二波是1935年9月15日《纽伦堡法》颁布后的一年间,又有494名科学家遭到解聘。第三波是1937年1月26日颁布《德意志公职人员法》之后,到1938年年初,又解聘了160多名拥有非德意志配偶或非同种族配偶的教师,至此,德意志高校教师队伍的损失达到了39%,其中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损失达到47%。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后,同样的厄运也降临到400多名有犹太血统或有犹太配偶的奥地利科学家头上。到1939年,德国大学45%的教师岗位,已被不学无术的纳粹党棍占据。

在1938年11月9日帝国水晶之夜后,这些被解聘的教授学者,除了逃离德国,没有别的选择。同样的威胁也摆在非犹太裔的、坚持民主思想的、过去积极参与政治并遭到解聘的人文、社会科学家面前,纳粹同样将他们视为敌人。要想求生,只有流亡,否则前面就是集中营与死亡。

这些知识难民为了活命,流亡地多达75个国家,但最后只有美国接收最多,让他们落地生根,并结出科学文化硕果。美国因此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

知识难民最初首选的流亡目的地是路程较近,文化差异较小的欧洲国家。美国毕竟遥远,中间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欧洲流亡美国并非易事。但某些欧洲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善待知识难民,包括其中的科学文化精英。比如永久中立国瑞士,德语是主要语言,本是犹太知识难民十分愿意选择的避难所。但瑞士当时失业严重,人们害怕知识难民竞争就业岗位,于是政府规定入境的外国人不得从事任何获利的职业,法律禁止雇佣任何外来难民,这就使流亡科学家到瑞士找不到施展的舞台,只能把瑞士当作流亡的中转地。

比如加拿大，地广人稀，原来并不拒绝欧洲移民前来谋生，但对移民的选择有自己的偏好，他们愿意接收的是矿山、森林和血汗工厂需要的廉价劳力，而不是知识精英，这就拒绝了大批科学家、艺术家、银行家、教授、律师、医生的避难申请。他们甚至害怕政策有了弹性，加拿大所有的大学会被难民塞满。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兹伯格因为妻子是犹太人，遭到驱逐，到加拿大一所大学任教。因为由美国的基金发工资，移民局才允许他入境两年。两年后，又要赶他走，校方千方百计和政府交涉，方获准留下。10年后，赫兹伯格才取得加拿大国籍，1971年成为加拿大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相比之下，美国对犹太知识难民最具吸引力和包容性，给他们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最宽广的舞台。美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些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远见，他们敏锐地看到了接收来自欧洲的知识难民，会对美国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作用。他们不止于对犹太人受迫害表示同情，而是努力化解本国人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和反犹主义情绪。尤要指出的是，让犹太知识难民得以安居，施展才能的主要力量并非美国政府，而是美国的公民社会。李工真说："真正有功的绝非罗斯福政府，而是那些目光远大的知识界领袖、私人性质的基金会以及各类民间的援助组织。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美国成为接收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成为接收犹太知识难民最多的国家。"其中有1090名科学家、811名法律工作者、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作家以及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被德、奥两国驱逐的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被美国接收，其中约1400名科学家中，至少77％为美国接收。当时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知识精英中有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现代宇航之父"冯·卡门，"原子弹之父"西拉德，"氢弹之父"特勒，物理学家玻尔、费米，数学家库朗，现代建筑家米斯·范·德·罗，音乐家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社会学家拉萨斯菲尔德，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等各领域的翘楚。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包容性较强的自由竞争环境，当时又处于科学、教育和文化的上升期，有了这些世界一流精英的加盟，可谓如虎添翼，迅速地登上了全球科学和文化的制高点。很快，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发生了一次洲际大转移，从欧洲转到了北美洲，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德国的3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世者只剩14名，而美国已经有25名。难民知识精英把德国学术体系中最先进的方法论和最严谨的学风带到了美国，奠定了美国在全世界科学教育上的领先地位。吸纳欧洲知识难民的成功经验让美国尝到了甜头，从此，美国形成了更加自觉的开放机制，面向全球的知识精英，敞开交流之门，移民之门，面向全球的青年才俊，敞开留学之门，就业之门。这正是美国在二战以来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重要秘诀。德国在二战结束之后，虽然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有痛切的反思，但在全球科学和教育上的领军地位，却一去不复返了。

李工真教授认为，国家和大学有3种关系。像美国那样由社会自主发展大学教育，导致国家振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模式，可称"科教兴国"；像威廉三世这样，集中国家财力投入大学，但充分尊重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模式，可称"国兴科教"；像希特勒纳粹党这样，掌握国家机器，干预大学独立，扼杀学术自由，摧残知识分子的模式，可称"国衰科教"。3种模式的得失，国人都可引为镜鉴。■

（责任编辑　冯立三）

编读窗

向李延明先生致歉

本刊2015年第3期发表的李延明的《从古希腊的专政与民主谈起》一文，标题为编者所改。但李先生的文章并未涉及古希腊，标题应为《从古罗马的专政与民主谈起》。这是编者的疏忽，特此向李先生并读者致歉。

"新四军"番号何时才有？

《炎黄春秋》2015年第1期《鄂豫皖白雀园大"肃反"》一文，"1937年4月，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员、江南行署主任兼江南挺进第一纵队司令的冷欣，在与我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会面"语，时间不对，语义糊涂。按，共产党于1937年10月将赣、闽、粤、湘、鄂、豫、浙、皖等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由此可见，前述这段话中1937年4月便出现"新四军"称谓，与史实不符；对当时陈毅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职衔不当。所以说，"冷陈会面"时间当在此后，不可能是1937年4月。

宁波　竺涨根

读者来信摘登

王智仁:答《柴山保往事之谬》

贵刊2014年第9期上发表了我父亲起草、本人整理的《柴山保往事》(简称《柴》文)。2015年第1期发表了夏宇立先生批评《柴》文的《柴山保往事之谬》(简称"夏文"),现回答如下:

一、"夏文"3次提到作者父亲入伙易本应民团,说作者在易本应部中一干就是5年。这是对《柴文》的误读。

《柴》文没有说父亲曾经入伙易本应民团。父亲逃难离家后是靠3个不到14岁的孩子养活的,1931年九月初二病死于荒郊野外。成为孤儿的三兄弟在易本应民团那里只混了几个月就离开了,从此再没有回民团。

二、"夏文"说"就我所知,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叫'王功在'的'红四军十师政委',也没有叫'王自昌(王谋臣)'的'红四军总后勤处主任'"。

王功在比作者晚一辈,作者是他的私塾先生,王谋臣是作者的七叔。他们的名字载于《新县革命史》,他们在红军中担任的高级职务抄自王氏家谱:《王南泗公家志》。

三、"夏文"说《柴》文"在指责红军'滥杀无辜'的重大问题上……将其归结为红军'筹款'……。而王家湾600人的被杀……竟然断言全系红军和群众所为,与国民党当局没有关系"。这也是对《柴》文的误读。

《柴》文说"王家湾的人很多是被王成赞、王成盛杀害的","传说杀害我四弟的王成盛也是我的族兄",没有说王成赞、王成盛是红军。但不能否定红军曾滥杀无辜《王南泗公家志》记载:"自1927年至1934年,张国焘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屠杀了无数的革命的优秀儿女,以至于近千人口的王家湾幸存者不足300余人。"史料表明,此屠杀确实"与国民党当局没有关系"。

"夏文"否认红军曾用"写条子"方式筹粮、筹款。史料证明陈毅的"红军筹款秘诀"就是"贴条子"。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第135页披露"陶铸带人用小手枪绑了一个地主的孩子,获赎金三千多元"。夏先生自己的作品《乘马顺河革命史》也有红军"绑票"。

四、《柴》文说到戴季英在柴山保制造冤案,"夏文"有意回避。戴季英从鄂豫皖到川陕,枉杀无数。如果不是毛主席喊"刀下留人",习仲勋早就成为他的"刀下鬼"了(《习仲勋传》第207页)。戴季英领导柴山保时滥杀无辜并不奇怪。

游雁凌:《南方周末停刊风波》一文纠谬

《炎黄春秋》2014年第10期刊登的署名左方的《南方周末停刊风波》一文,有太多与事实不符的内容,当时我是《南方周末》第一副主编,又是这场"停刊风波"的主要当事人,了解这个过程。该文称:"分管《南方周末》的副社长(实为副总编)李孟昱和《南方周末》副主编游雁凌上北京摸底,他们找了龚心瀚征求意见,他是分管新闻的副部长,他说你们的报纸办得不错,我每期都带回家里,家里人都爱看,我有时候忘记带,家里人还追着要。后来去向新闻局长徐心华征求意见,他也认为报纸办得不错,只是发表敏感人物文章太集中了一些,可以分开发。"该文还称"游雁凌到南宁出席会议时,龚心瀚和徐心华问他:'你怎么来了?左方呢?'";以及"龚心瀚对游雁凌说:'你回去告诉老左,你们是百万大报'……"等等。

事实是,1993年6月我和李孟昱上京那次,并没见到龚心瀚副部长,所以他不可能而且也从来都没有对我们讲过那样的话。而徐心华局长对我们的报纸总体上是给予鼓励的,但并无讲过什么对敏感人物的文章,"可以分开发"这样的话。我是在1994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才认识龚部长的。龚部长并没有对我讲过什么"你回去告诉老左",以及"你们好大的胆子,我们杀你不死,你们倒要我们给你们庆生日"之类的话。据我所知,左方从来都没见过徐惟诚、龚心瀚,当时也未见过徐心华。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美]格雷弗·弗著 马维先译	89.00	9.00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	张聿温	68.00	9.00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光 李晓江译	88.00	10.00
一本书的历史 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金冲及	38.00	7.00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	邓　野	38.00	7.00
任仲夷与广东改革开放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48.00	8.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9.00
潜规则	吴　思	28.00	7.00
我们忏悔	王克明　宋小明	48.00	8.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于光远	36.00	7.00
牛棚杂忆	季羡林	38.00	7.00
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	张　化	39.00	7.00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邵燕祥	38.00	7.00
叶　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美　周锡瑞	58.00	8.00
一片冰心在玉壶 叶笃庄回忆录	叶笃庄	68.00	8.00
“四人帮”兴亡(全四卷)	叶永烈	198.00	20.00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李敦白口述 徐秀丽撰写	38.00	7.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苏采青	98.00	10.00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38.00	7.00
独裁者手册	[美]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著	42.00	7.00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 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德]齐格弗里德·洛卡斯特　英格里德·宗塔格 著	59.00	9.00
大元帅斯大林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198.00	17.00
王明年谱	郭德宏	98.00	11.00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68.00	9.00
古拉格群岛第一岛	伍宇星编译	39.80	7.00
苏联的最后一年	罗伊·麦德维杰夫	39.00	7.00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吴庆彤	36.00	6.00
民国人物过眼录	杨奎松	58.00	9.00
改革都有红利吗	雪　珥	38.00	7.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25.00	7.00
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杨银禄	46.00	7.00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杨　瀚	35.00	6.00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徒手	32.00	6.00
勃列日涅夫时代	[俄]列·姆列钦	56.00	9.00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冯筱才	38.00	7.00
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	[美]撒迪厄斯·拉赛尔	39.00	7.00
思痛录	韦君宜	35.00	7.00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128.00	11.00
斯大林的战争	杰弗里·罗伯茨	69.00	10.00
国史札记(人物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我的朝鲜战争 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张泽石	23.50	6.00
回忆与研究(上下)	李维汉	75.00	12.00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合战:1945–1949	蒋永敬　刘维开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　晖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黄道炫	48.00	8.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48.00	8.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十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314.00	43.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Ⅰ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Ⅱ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图书介绍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上台后召开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的当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赫鲁晓夫这个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苏共二十大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反响。无论在苏联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堪称划时代的事件。

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格雷弗·弗博士,通过对大量文献证据、历史事实,特别是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的研究,在本书中奉献给读者一个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结论:这个“秘密报告”是由谎言拼凑而成的。

“20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竟是欺世之作?本书重新解读这份“秘密报告”。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林彪之子林立果,借林彪的光环,短时间内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自命不凡的他在自己周围拉起一伙人马“小舰队”,自命“康曼德”。

在林彪和毛泽东发生严重分歧和尖锐矛盾,林彪接班人地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林立果欲和毛泽东拼个你死我活。他策划的谋杀毛泽东、发动政变的阴谋因南巡的毛泽东突然返京而化为泡影。他继而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又因周恩来的查问、封存林彪专机而胎死腹中。情急之下,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这次出逃,林彪是被欺骗绑架?还是共商同谋呢?

本书直面争议,首次完整揭底真相。

《大元帅斯大林》:斯大林是二十世纪有影响也最具争议的人物,生前他的功绩被过分渲染和夸大,被视为“神”一样的伟大英明领袖;死后,与他有关的一切又变得“声名狼籍”和“威信扫地”。一些著作中斯大林是伟大的领袖、各族人民的父亲、英明的国务活动家,而另一些著作中他是嗜血成性的恶棍、有妄想狂心理的罪犯。对斯大林的这些评论,都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党性立场和派别信念。作为斯大林的同时代人,作者在收集、分析和研究了大量有关斯大林资料的基础上,以全面、客观公正的视角,阐述了斯大林生前几十年的政治和军事活动。该书曾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历史文学奖”。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人人出版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代理出版：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1. 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3000元，300页印刷100本4000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2. 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000元，300页印刷100本6000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 “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出版热线：010-58426176　57223540　57273435
传　　真：010—58608407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录网址: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　自费出版网：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　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A类出版作品展示

B类出版作品展示

家族一棵树 人生一本书

——五十本起定制出版文集、自传、回忆录，家史、家谱、纪念册

四月是清明 出书祭先贤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 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6252 5116

地址： 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楼”

单位：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文化网》www.jzwhw.net

《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回顾

2003年2月17日 羊年新春联谊会

2004年2月6日 新春联谊及组稿座谈会

2012年2月8日《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

2014年2月18日《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

致　歉

《炎黄春秋》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会已经延续了23年，今年也一如既往，邀请本刊编委和作者欢聚一堂，畅叙友谊，切磋得失，谋划未来。我们原计划联谊会于3月11日举行，邀请240人参加。主管单位转述有关部门建议我们将时间推迟到两会结束以后，压缩与会人数。我们尊重主管单位的意见，将时间推迟到3月18日，人数也压缩到130人。会场选在中国科技会堂，已经安排就绪。请柬发出后，科技会堂却告知不能承接这次会议，取消原来的承诺。我们无奈，再联系其他会场，也做好了一切准备。时隔一天，新的会场又接到另外部门的通告，也不允许接待《炎黄春秋》在此召开新春联谊会。考虑到突然停止联谊会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我们于3月16日向主管主办单位报告，请求疏通，按期开会，17日答复仍然是“根据有关方面意见，此会不宜召开”。

应邀与会者都是关心支持本刊多年的朋友，不少人已过耄耋之年。年年聚会，都不免要送走几位，所以他们对见面的机会倍感珍惜。有的准备了发言稿，有的为参加此会从外地匆匆返京，有的准备坐轮椅来和老朋友见面。聚会取消自然令他们十分伤感。本刊一向拥护中央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举办联谊会本是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权利。个别部门权力的任性导致宪法赋予的权利缩水，实在令人心痛。

联谊会受阻后，我们尽最大努力告知受邀者，仍有部分朋友没有联系上。我们向已经受邀不能与会的全体朋友致以诚恳的歉意！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15年3月17日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2015年第4期

华国锋谈史传写作

从《邓小平论文艺》到《邓小平论文学艺术》

有关鲁迅争论我见

上海档案里的“反革命”

宪法学者张君劢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求解

ISSN 1003-1170
04>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10.00 元